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李方舟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永久的纪念

朱邦薇

眼前的这本《李方舟传》，能和读者见面是十分意外的，它是我的祖父朱东润先生，二十多年前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独居斗室，于悲愤中为纪念含冤去世的祖母而写下的文字，原本没有考虑出版。今年春天，陈思和先生向我约稿，说他多年来敬仰祖父的人品与学问，听说祖父身后留有这样一部稿子，希望能收入“火凤凰文库”予以出版。

祖母邹莲舫女士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离开这个世界的，距今已有二十七年，祖父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去世，而明年恰好是他的百年诞辰。多年来，我对祖父母的思念从未随岁月流逝而淡薄，一直希望以一种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愿。陈先生的提议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现在我将祖父的这部遗稿稍加整理，交给陈先生，愿以它的出版，作为对我亲爱的祖父母永久的纪念。

陈先生还希望我写一篇后记，介绍祖父撰写《李方舟传》前后的情况，以及他在祖母去世后的生活和学术活动。我学力浅薄，深知自己写不好，但是没有理由推辞，只有勉力为之。

祖父生于一八九六年，祖母比他小四岁，生于一九 年。他们是在一九一九年结缡，开始共同生活的。祖父一生以教书为业，在旧时代，长年单身在外，仅寒暑假得以回故乡泰兴与家人团聚，抗战时更是饱受八年骨肉分离之苦。一九五二年，祖父来复旦工作，以后众多子女也大都成人独立，祖母方才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与祖父一起生活。我出生不久，未离襁褓，便由祖父母抚养于膝下。此后长大成人，陪伴着老人度过他们的晚年。无论从精神世界的形成，还是从感情生活的依恋上说，祖父母都远胜于我的父母。祖母去世时，我虽只有十六岁，但它给我带来的创痛，迄今不能平复。二十多年来，我把这段往事深深地埋在心底，对于人们的同情与关切，执拗地以沉默相对。我怕见中秋的月亮，怕闻除夕的爆竹，每逢人们庆贺团圆的日子，我却只有滚滚而下的泪水。女儿常为此不解。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女儿听到老奶奶的死事，回家向我询问原委。看着女儿清澈明亮的眸子，我感到一切都无从说起，我不愿十二年来生活在一片光明中的女儿，幼小的心灵便蒙上往事的阴影。

祖母是一位家庭妇女，在漫长的岁月中相夫教子，与祖父同患难，共命运，有着坚强的个性与贤淑的品格。祖父对于祖母，终其一生爱而且敬，感情之深厚执著，非常入所能想见。他在完成于抗日烽火中的力作《张居正大传》的自序中曾写道：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

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

一点点，但是我在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一九六六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身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祖父，是首批被抛出来的名教授之一，大学门口宣传栏上贴满了措辞激烈几近谩骂的大字报。一夜之间，祖父从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紧接着，是无休止的批斗和抄家。有时候祖父下班回家，衣服上满是墨水和浆糊，胸前还挂着一个马粪纸牌子，上面写着用红笔打了叉的“反动学术权威 XXX”。祖父这一年照旧历算是七十一岁了，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仪容整洁，却被迫挂着牌子上下班。他平日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在那些天，祖父每日挂着牌子往返于学校与宿舍，竟仍高昂着头颅。为了生性倔强，祖父多吃了不少苦头。祖母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长夜惊恐，忧心若焚。她曾约祖父一同赴死，以拒绝继续受辱，祖父却坚认自己无罪，并劝祖母忍耐，坚持到世事恢复正常的那一天。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他们不讲道理，要把我打死，那也没有办法，但要我自己承认有罪而死，绝对办不到！”

灾祸不久又波及到了祖母。一九六八年，里弄里也开始了运动，因为祖父的牵连，祖母也成了审查对象。祖母原来就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曾两次昏倒在外被人送回家。两年来的惊恐和焦虑，使她更加衰弱，不堪一击。祖父则须每日到校参加学习劳动，接受批斗，不能多照顾她，只能不断说一些宽慰的话。而刚满十六岁的我，除帮助祖母多做一点家务，并陪她前往她所害怕的会场外，也不知怎样才能让她安心，心底里总暗暗以为祖母是舍不下家人去走绝路的。与此同时，我正面临着分配下乡的命运。“文革”开始时我初中尚未读完，天真地以为无论发生什么事，书总是要读下去的，买好了学几何的三角尺和量角器，准备复课开学，却未想到等待我的是更为艰难的命运。

我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底去长江日外的一个小岛插队落户的。临走前数日，祖母形容憔悴、神色黯然，每日扫完宿舍大院，便回家卧床不起，终日无语。而不懂事的我，下乡半月后回家探望时，竟未察觉祖母的异常，还把穿破的纱袜带回来让祖母缝补。一周后我又返岛了，离家的那天清晨，祖母早早起来，把一瓶亲手熬制的辣酱放进我的背包，站立在门灯下目送我离去。深秋的清晨，天色灰蒙蒙的，我了步一回首地离家而去，心里空空的，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祖母的诀别。

回到岛上没有几天，我便得到祖母的噩耗，因为当时通讯不便，那已是祖母去世后两天了。我立刻又乘船回到上海，中午到家时，只见宿舍里的人们用异样、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可我却还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是传错话了。进得家门，屋子里空荡荡的，寂无人声，祖父面色枯黄，躺在书房的藤椅里，也不知吃过午饭没有，瘦得失去了人形。他看见我进屋，目光茫然呆滞，伤心地说：“你奶奶扔下我们走了！”我扑上前去，祖父用他枯瘦的手臂，抱住我颤抖不已的肩膀，我们祖孙俩无声地哭泣着，哭泣着。悲痛过后，祖父站起身来，擦干泪水，低低地对我说：“孩子，我现在要到系里去，下午还要斗我。你如在家害怕，可以和我一起去。”我几乎出生以来就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决不害怕，我告诉祖父我不害怕，他放心地走了。可祖父一出门，我便后悔了。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那天，我是应当陪祖父到系里去的，可我却因迟疑退缩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

在老伴惨死之后，不能送她到火葬场，不能留下骨灰，不能有一天半日的休息，却还要天天承受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天下有比这更悖情乖理的事吗？我由于自己的胆怯，不能给老祖父一点心灵上的慰藉，而祖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不忘照顾和护卫他的小孙女。

傍晚，四叔君迈回来了，他哭着告诉我祖母不幸去世的经过。他说当晚祖母的遗体停放在卧室的大床上，祖父执意要与祖母共眠最后一夜。叔叔害怕祖父再出意外，哭着硬拉他到小卧室休息。我们叔侄俩哭得几乎忘记了世界的存在。祖父回来后，把祖母为我补好的袜子和留给我的五元钱交到我的手里，我的泪水又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直泻而下。这时天下起了大雨，哗哗地下了一夜。雨声淹没了老少三代的哭声。

第二天，我被那位负责里弄清队运动的大学生叫去谈话，谈话当然是没有结果的。我认为祖母是身体衰弱，精神受刺激，害怕受凌辱而寻短见；而他坚持说祖母是畏罪自杀，并硬给祖母安上“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还要我正确对待。我想，他那样说或许是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心理负担吧。他还一脸严肃、语气肯定地对我说：“你祖父是阶级敌人，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我反驳说：“专案组尚未定案，你凭什么这么说？”他说：“这已毋需定案不定案！”此人并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更不是祖父专案组的成员，不知他当时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他还警告说，我的叔叔也态度不好。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回岛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了家里的变故，支书说：“老太太胆小寻了短见，以后会弄清楚的，不会有事。你倒是要当心好自己的祖父，可以回去多陪陪他。”支书的通情达理和关切，使我凄苦的心感到几分温暖。我又返回复旦家中陪伴祖父，直到春节以后。

这是我们祖孙俩第一次自己过春节，前后只用去了五元钱。我学着往年祖母的样子，去粮店买了一点糯米，用小磨子磨米粉，磨了筛，筛了磨，搞得手忙脚乱。祖父来帮我，我们轮换着磨。好歹凑和着做了点菜，捏了几个圆子，味道实在不怎么样，祖父却说好吃。

一天早上我去买菜，菜场里人很多，我只好耐心地站着队。因心情很黯淡，自认还是个孩子，也无人认得，便低头站在队伍里机械地向前挪。只听后面一个阿姨叫我的名字，她容貌端正，高高的个子，关切地问我钱够不够，并执意从皮夹中取钱给我。我认出她是中文系的一位老师，过去很活跃，我曾看过她演的话剧。我虽然没有接受她递过来的钱，但直到今天，仍从心底里感激她当时的那份好意。听说，这位老师后来去北京工作了。

在此期间，我还作为家属，去参加了一次学校的“万人严惩从宽大会”。会前先到中文系集合，家属大多年龄较长，有几位还年轻，只有我尚是孩子。我当时很惊讶，没想到那几位年纪不大的老师，居然也成了审查对象。工宣队与家属们逐个谈话，说是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要帮助家人端正态度，接受批判，争取从宽处理。一位模样像头头的师傅对我说：“你祖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是态度不好，犟头倔脑，回去要帮他改正，争取‘解放’。”我听了似懂非懂，连连点头。谈完话，便整队步行去江湾体育场，祖父和其他审查对象也被带着前往。会场很大，人多极了，众人以系为单位，环绕着主席台，席地而坐。会议气氛严肃，记不清是什么人先发表讲话，猛听得高音喇叭里一声大喝，一位哲学系的教授被反剪双手押了上来，示众一圈，然后又押下去，据说是直接送入牢里去了。这是从严。又听一声大喝，一位中

文系的教授被押上来，却是宣布从宽，押解的人随即退下，要这位教授自己在场子中向四面亮相。只见他双腿瑟瑟发抖，艰难地完成了指定的动作，然后退回中文系的队伍里。这两位教授的女儿与我都是小学同班同学，她们的母亲那天也都在场。这时我又难过又害怕，心“咚咚”地狂跳着，生怕接着有什么厄运落到祖父头上，急急从大人们背影中寻找祖父。只见他正坐在离我不远的前面，左右的人大都低头佝偻，唯有祖父挺着身子，昂首直视前方。望着祖父挺直的背影，我感到一股凛然不可辱的气概，一时竟也忘记了恐惧。幸好会议很快结束了，人们又结队回到复旦。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祖父被差遣与学生一起下乡劳动，这是第二次去罗店了，以前还去过长兴岛。祖母去世后，一向硬朗的祖父，健康开始出现问题，常感胸闷气急，心脏不适。不得已去保健科就医，却横遭折辱。可怜他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得抱病下乡。后来，还是当军医的大姑清於设法替他检查，才确诊是得了冠心病。祖父在劳动中，时时挂念着我，他写道：

生活是艰苦的。我一近学习，一边劳动。一次在罗店劳动中，由带队的工人宣布可以回家了，我连忙去信横沙，约邦薇回来。可是罗店的劳动队伍的行期临时推迟一天，邦薇高高兴兴地背了背包回家，想不到扑了一个空。孩子还小，怎么办呢？幸而清於在上海有个家，邦薇只能到那里去，第二天才见到我。记得祖父这阶段的信是很凄惨的，总说是见一面是一面，其他的就不管了。后来我们约定，每次由我先回来，将房间收拾收拾，让家中有点生气。和祖父团聚数日后，再送祖父下乡。那时祖父穿着一件破旧的呢大衣，用一方蓝底白花土布包着几件替换衣服，背在肩上，到大学门口集合。这方蓝花土布虽然很粗糙，我将它完好地保存着，直至今日。每当见到它，祖父背着布包走在寒风里的身影，恍如就在眼前。送走祖父后，我也就黯然地到吴淞口渡江，返回岛上，等候下一次与祖父的重逢。

我的大姑母清於是位军医，其时行动不便，自己处境也很艰难，连祖母去世都未能回来。我曾求她回复旦看看祖父，大姑流着泪说：“要正确对待。”终未能回复旦一看。

在乡下，祖父和学生、社员们一起劳动，有时半夜还要紧急集合，参加急行军。祖父写道：

在乡间劳动的当中，我们也分小队和大队。大队长姓袁，工人出身，三十多岁，但是身体很结实，经常能走二三十里。他主张坚持锻炼，要中宵集合，黑夜行军。东

束里复旦小队队长王伯杏，盐城人，对我特别照顾，总说是年龄大了，夜晚起来不便，不要去了。但是不久，他因眼病回到市区看病。继任的是一位福建人，他坚持了黑夜锻炼的原则。原则嘛，本来不只一个，照顾的时候有照顾的原则，锻炼的时候有锻炼的原则。

寒冬的深夜，叫笛响了。嘘嘘嘘！东束里的狗吠了，邻村的狗也吠了。

小队长带头，大家都起来了，我也起来了，好在事前都准备好的，衣帽鞋袜都有一定的位置，顺手就是，深夜集合是不容许开灯的。

排队集合，报名数，向右转，成纵队，开步走。一阵的沙沙声，一、二——一、二。

我也快步走！沙、沙、沙，一阵急一阵了。我在那里直喘气，七十四

岁了，真不经用，但是我还是快步走，没有掉队。

两三里以后，实在不行了，脚步没有放慢，气有些喘不过来。怎么办呢？是锻炼，是改造，能掉队吗？不能，哪能不锻炼呢？我用顽强的意志克服连续的喘气。锻炼再锻炼，顽强再顽强。但是究竟有顽强不了的时候。气喘得更粗了，更急了。人要倒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旁边的人也不能沙沙沙了。这是一位少年人，叫许道明，他气喘得很厉害，捂住肚皮，说痛得很厉害，不能沙沙沙了。

这一来，我有了伴，也停了下来。

前面快步走的速度也放慢了，没有人沙沙沙了。我终于和许道明赶上了队伍。到达目的地，袁大队长宣布散队。天有些发白了，我们慢慢地回到东束里桥。祖父多年来睡眠不好，每日临睡前要服两片“安定”才能入睡。可是在乡间，他被剥夺了服药的权利。事后，他告诉我，开始担心换了环境，又没有药，会更加睡不着，设想到夜里睡在铺了稻草的地铺上，居然也能入睡。最近我和章培恒先生谈到此事，章先生说：“在乡间日里很是劳累辛苦，老人身体吃不消，夜里反而容易入睡。”

祖父在乡间割稻、拔草、拣棉花，对此他总不愿多说，却常告诉我农村里人们的纯朴与善良，并不因他的处境而欺侮他，有机会还照顾他。有一次，祖父被派去帮忙替大家烧饭。烧饭的农村姑娘能干麻利，一个人又淘米洗菜，又烧火做饭。她不支使祖父做任何事，却搬张小竹椅让祖父坐在一边看她做事，说反正没有人在旁边，老人家正好可以歇一歇。走笔至此，泪珠潸然而下。我不知这位大姐的姓名，更不知她的模样，二十多年来，脑际里却常出现她的形象：高挑身材，扎着围裙，转过被灶火映红的年轻而健康的脸庞，给老人以善意宽慰的微笑。乡间一些老人见祖父年纪大了，又戴着眼镜，便认为他懂医道，要他搭脉看病。祖父的祖父是个医生，父亲也懂点医道，可他本人只知道一些中药的药名，却并不会行医。祖父后来时常对我说起，农村的人们很好，自己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心里很觉抱歉。

下乡劳动结束，回到复旦以后，祖父的失眠加剧了。白天的紧张和夜里的孤独，使他彻夜难眠。两片“安定”已不能使他入睡。夜间睡不好，日里便没有精力应付那些无休无止的学习和批斗。有一夜，烦躁的祖父加大剂量，多服了几片“安定”。第二天是星期天，每日来替他烧午饭的阿姨直至中午仍不见祖父起床，很害怕，便去叫门房的老王来敲祖父的房门，听听里面没有动静，他们硬把门撬开，见祖父仍在蒙头大睡，便使劲推醒他。祖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口齿不清地问是什么事，身体却好久不能动弹。事后我从岛上回来，阿姨随即告诉我这件事，说会不会是想不开，有意多服药。我吓得紧紧抱住祖父，求他不要也像祖母一样离开我。祖父轻轻抚摸着我的脊背说：“傻丫头，不要怕。我只是睡不着，乡吃了两片药。祖父不畏那么容易死的。你已经没有了祖母，我不会放弃对你的责任。我们约定：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失去对祖父的信任。”祖母摔死以后，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至此方才略略放下。

对于生死，早在祖母去世之前，第一次去罗店劳动时，祖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写道：

在西束里生产队进行生产的当中，一天天晚了，我从场地回来，一轮明月当头，天上没有一点尘滓，下面是一潭清水，澄净极了，水波荡漾，只看到水中皓月来往的波动，四日寂静。偶然也有人过，但是一阵脚步声去后，

一切的一切仍然是沉静到空寂的妙境。月色水光，浑然一片。

不知是谁打破了这个寂境。

只听得一声：“焦启源在吴淞投水死了。”

焦启源是研究植物的生物系教授，对于芳香植物钻研得比较深，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什么要投水呢，我陷入沉思，但是始终不能理解。月亮依然的皎洁，池水依然的沉静，村声依然的遥远，我依然的枯坐。

多么诱人的池水啊！但是令我想起的不仅是焦启源教授，还有国家的前途。

知识分子是应当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的。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倘使这个错误不是不可救药的，国家会给他改正的机会。他没有权利切断自己和国家的联系，不再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

一切服从国家的安排吧，个人的得失太微细了，不值得做出太多的计较。

月色依然的皎洁，池水依然的沉静，村声依然的遥远，但是我不再枯坐了。我挺着腰杆，踏着坚定的步伐，回到宿处。

据祖父后来告诉我，那次的独自临水枯坐，原是因为不让他参加集体会议，一人被驱之门外。

不久，祖父的经济待遇有所改善，他赶快写信叫我回上海，带我去市区吃了一顿饭，还给我买了一条混纺毛毯。我下乡时，因祖父工资被扣，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无钱置办行装，一切都很简陋。大姑给我五十元钱，我用以维持了半年的生活。从这时起，便仍由祖父照顾我了。这条毛毯伴我度过多年插队生活，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一九七二年，关于祖母的死，有了一个不是结果的结果。祖父写道：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国权路里弄委员会约我座谈。那天邦蔽在家，因此我和邦蔽同去。坐了一会儿，第二宿舍的老杨也到了。里弄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说起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复旦大学员工家属邹莲舫、傅曼芸等人的事故进行处理。

他们宣读邹莲舫在解放前合伙开店，附有作坊，后来参加过缝纫社，在清队运动中经过审查，她一会说没有剥削，一会又说有剥削，写过交代，群众曾经问过，没有批判，没有斗争。她不理解党的政策，因此本案不作处理。

这一件案子在“不作处理”的决定下不予处理了。

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我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同意了。一切都按照一定时期的一定政治情况作出决定的，我们没有权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祖母是个家庭妇女，闹不清什么是剥削，什么不是剥削。她曾被逼着在领袖像前发誓，她发誓了，于是就被安上了“欺骗伟大领袖”的罪名。在这个可怕的罪名面前，祖母崩溃了，再加上健康上的原因，她无力再支撑下去，发生了悲剧。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是那么荒诞，可这一切在当时却是真的。人已经死了，又说“不作处理”，说她不理解党的政策，当时执行政策的人自己又是如何理解、如何执行政策的呢？祖母因参加公益工作而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状，被她当作荣誉，一直挂在门厅的墙上。抄家的红卫兵一进门，就将它揭下来撕得粉碎。对于一位从旧时代过来的妇女，从那一刻起，她的信念就破碎了。祖父写道：

莲舫死了，她对社会尽了最大的责任，她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人的生存是为社会工作的，在他做工作以后或是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他的死亡无论是自然的还

是被迫的，都指明工作的结束。至于结束以后的结论，这不是对于他的考验，而是对于时代的考验。

祖母与祖父共同生活了四十九年，经历了多次战乱，直至解放后迁居复旦，才开始了较为安稳的生活。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她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了一生；作为一名好强能干的女子，她从小县城到大城市，一直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尽了本分。祖父对祖母的感情执著深厚，爱她的温柔贤淑，敬她的刚强果断。如今人去楼空，抚今追昔，头顶的灾难虽尚未结束，倔强而孤独的祖父为怀念亡妻，寄托幽思和孤愤，开始撰写祖母的传记。迫于时势，只能采用托名的形式。祖母去世后，祖父的住房被缩减到一间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卧床外，堆满了书籍和杂物。每当夜阑人静之时，老人在孤灯之下，展纸染毫，透过细细密密的文字，与亡妻相会，一同追溯他们往日的人生足迹，倾诉郁结的悲哀和思念。祖父曾对我说，祖母把他生命里的春天带走了。

祖父写这本传记时，我是很担心的。长夜漫漫，前途莫测之中，此事一旦被发现，不知要加上怎样的罪名。因为此书的内容与文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距离实在太远了，很难为人理解。当时祖父的住处随时都有不速之客，我就曾经碰到有人闯进来，当着祖父的面拆阅放在书桌上的信件。那是一封姑姑写来的家信。那人看得无味，也就扔下了。我至今仍不理解，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会有这种极不文明的举动。还有一次，不知为了何事，大字报竟贴到了祖父的房门上。祖父一生襟怀坦荡，不懂得防范别人，我没有把握祖父的这些稿纸不被发现。天幸一切都安然无恙，直至此书完成，无人知晓。

祖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从四十年代起，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传记文学的研究与写作。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家人千里阻隔，在重庆教书，写下了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张居正大传》。祖父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况时写道：

记得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庐里正在伏案的当中，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待得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伏案。

祖父撰写《张居正大传》，在继承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传统的同时，借鉴并运用了西方传记文学的创作理论和方法。写作这本传记，在当时还有一层考虑，就是通过表彰爱国志士和实干家，唤醒拯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全书激荡着救国存亡的热情，他在此书的结尾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也许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将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解放后，祖父在大跃进中完成了《陆游传》及其系列作品《陆游研究》、《陆游选集》。后来又写了《梅尧臣传》和《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祖父笔下的传主虽多为古人，但他一直想为现代人作传。他在罗店劳动时，曾见到一位女生产队长。关于这位女性，祖父写道：

韦娘四十多岁，额角有些灰白，两颊也开始缩进，一口的广西官话。原来她不是本地人，出生在广西金城江边，和罗店去的铁路工人结了婚，回到罗店，现在是东束里生产队的政治队长。……

韦娘把她的过去淡起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中国妇女的贤淑，以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和现代女性的勇敢，这三种特征很自然地调和在一处，塑造了这位乡村妇女。

我是热爱传记文学的，韦娘的身世也确实是一部传记文学的素材。但是要写好这样的作品，第一，至少要在一年中经常接触这位典型人物的生活；第二，要到金城江和川黔、成渝、宝成三条铁路走一遍，接触当地的风光，特别是宝成铁路的沿线。第一项我还能办到，但是学校方面未必同意；第二项我已经没有这样的体力，因此也无法写。

祖父以为，上自伟人、政治家、文学家，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可作为传记文学的传主。一个普通百姓的命运，同样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品格。他曾多次与人谈起韦娘的故事，以不能为她作传为憾事。

现在为了对至死不肯放弃的良知与信念的坚持，祖父将他深沉的爱与忧患，都溶进了为祖母所写的这部传记中。二十余年后重读这部传记，我仍不能不为书中所表现的执著和睿智而感动。

不久，宣布祖父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的问题”。他的“罪行”，据说是在讨论《海瑞罢官》的问题上有反对言论。对此，祖父既搞不清楚，也不想去搞清楚。从一九七一年起，祖父开始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和校勘工作。他每日上午从复旦乘公交车去位于市中心四川南路上的上海新华书店大楼上班，下午工作结束后再乘车回来。一次我从岛上回来，中午到家后，便按照祖父在信中给我的地址去找他。进了大楼，找到祖父所在的办公室，看见许多人围着一张长桌在工作。记得其中有徐鹏先生和叶盼云老师。徐先生示意我先别作声，原来祖父坐在靠窗口的软椅上，以手托腮睡着了。我感激这些老师让祖父坐在光线最好的窗口，并坐着全室唯一的一张软椅。祖父醒了，看到我很高兴，大家都笑了，叫我们先走。我和祖父便下了楼，一路上牵着手，穿过南京路，折向外滩，乘55路公共汽车回家。

林彪自我爆炸事件之后，又开展了批林批孔、尊法反儒的运动。听一位近邻说，学校里批判祖父的大字报很多，事情好像很严重。然而祖父在经历了滔天洪水般的灾难之后，已无力去关心外界的毁誉了。

到了一九七五年，又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时人们对频繁的政治运动已生厌倦，祖父也因年近八十，不再被要求每日到学校上班，只是每日在家读书练字。家里也开始有客人了。其实在此之前，逢年过节，尽管有所不便，祖父以前的学生和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已陆续来看望他了，由此祖父孤寂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有一位朱雪皓老师，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在市区的一所中学任教，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来复旦看望祖父。祖父外出时，不时会遇到人们善意的问候。

祖父一生爱清洁，有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秋冬季节，家里没有条件洗澡，他就每周到复旦附近的五角场浴室去洗澡。有一次我从乡下回来，祖父留下字条说是去浴室了，可是等了很久还不见回来，我着急了，出去迎他，走到中途才碰到他。原来祖父经常去洗澡，浴室的两个老工人都认识他了。他们同情祖父，热情地照料祖父。每次洗完了澡，他们让祖父在藤椅上休息一会儿，还给他泡杯热茶，陪他聊聊。这两个老工人是苏北籍，祖父便

用家乡话与他们交谈，人与人之间不计利害的淳朴的情感交流，和着浓浓的乡音，使祖父倍感亲切和温暖，他留恋五角场浴室那简陋的一隅，那里吸引着他定期而往。他和那两位老工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结束。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祖父写道：

一九七六年到了，这是我这八十年中最后的一年，是充满悲痛而又富于希望的一年。我的一家，亲爱的人死了，子女分散了，我抚有的孙女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去长江口的一个沙洲七八年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住的房屋现在缩小到十七平方米，书籍都搁不下，有时客人来了，简直无法安身。但是我还是要工作，我希望在这仅余的几年里，写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祖父便着手写作《杜甫叙论》，此书的前期准备和研究工作，早在文革中就已开始。他的学生，复旦中文系的骆玉明先生评价此书说：

“叙传”是评传的意思，但又不像一般的评传，以大切八块分项论述的方法，而仍以传主生平行事为主线，以时代风云为背景。在一九七六年那个混乱的逻辑和混乱的语言尚未来得及洗刷的时间点上，看，《叙论》的雄健切实，直非当代之物。这反映出先生的思想不仅格

格不入于十年的荒诞，而且由十年荒诞的体验，超出了五、六十年代的拘局。……书中提出大唐帝国与李姓王朝非同一概念，分析大唐帝国的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李姓王朝与其他诸王朝的关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见解。关于杜甫由其地位升降而造成的对人民态度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变化，关于杜诗在乾元二年和寓居夔州时期达到两个高峰的论点，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一九七八年，祖父终于得到平反，推翻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辞，并恢复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的工作。他在指导青年教师和唐宋文学研究生的同时，开始修订有关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研究之三部著作——《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和《梅尧臣诗选》。这三部倾注了祖父巨大心血的著作手稿，在文革初期抄家时被没收，文革后期发还。发还那天，祖父以年迈之躯，抱着几大包沉甸甸的手稿从学校走回来，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一天，他是很高兴的，就像一位孤独的父亲，终于找到了离乱中失散多年的孩子。这三部书分别由北京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一年出版。

这期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我结束了十年的插队生活，得以回上海念书，我和祖父终于团聚了。入学那天，八十三岁的祖父为我提着放着生活用品的网兜，送我到复旦车站。他执意要送我去学校，而我说服了他到车站即回家。到了学校，其他同学都有家人甚至男友相送，帮忙张罗，我只是一个人办注册，入寝室。事后同寝室的同学说起，那天见我瘦瘦弱弱的孤单一人，都觉得心中不解，因为初次见面，又不便多问。我只是微微一笑，以示感谢。她们不知道，当时我的心是很充实的，有我的老祖父的关爱和牵挂，我还缺什么呢？每周当中我回来看祖父一次，然后又和祖父一起度周末。有时和祖父同去市区看开禁复映的优秀影片，散场后，我和祖父挽着手漫步在

骆玉明：《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朱东润先生和他的著作》，收入《中西学术》（一），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宽阔的林荫道上，天早已黑了，路上行人不多，飘落的梧桐树叶撒满路面，在我们的脚下沙沙作响，一阵微微的秋风吹过，梧桐叶子便跳起舞来。那时候市区还没有这么多的霓虹灯和餐馆酒吧，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的喇叭声。我靠着祖父宽大结实的肩膀，和他并排走着，心中满溢快乐，我又回到祖父身边，有了一个虽不完整但是真正意义的家了。

一九七九年元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里弄委员会为祖母召开平反昭雪大会，来参加的人很多，原中文系副主任致了悼词，校领导和里委都送了花圈。祖父的子女们也都从各地赶回来。金家人团聚在一起，不知是喜是悲。祖父原本不多的头发，此时已全白了。哀乐声起，我们都哭了，祖父只是肃然，没有流泪。逝者已往，祖父终于替祖母等到了讨还公道的这一天。经过十多年的沉痛与思索，祖父没有颓唐和沮丧，他说：“中国的前途是远大的，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已经活了八十多年，但是还要活下去，还要努力，我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为祖国、为自己选择的工作而努力。活着就要战斗，永远战斗，永不松懈。”

这年五月，祖父在组织的引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一年，年迈的祖父卸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任名誉系主任。秋天，赴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任文科评议组成员，被确定为第一批文科博士导师。回上海后，即着手准备《陈子龙及其时代》的写作。这一年，祖父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了。

一九八二年，祖父开始撰写他的晚年力作《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九八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于这部作品，祖父倾注了他晚年的热情和精力。祖父对我说：“别人都认为《张居正大传》写得最好，我自己认为还是这部《陈子龙及其时代》写得最成功。”书名本该是《陈子龙大传》，因体例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记，后被出版社方面改为今名。此书的脉络，不是仅以传主的事迹为线索，而是以传主生平与时代大事两条线交错地组成。明末的各股政治力量，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许许多多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活动，在祖父笔下组成一幅宏伟的明末历史画卷。而传主陈子龙，就在这历史波澜中，由一名汲汲于功名的文士，成长为忧国忧民的志士，直至拯救危亡、以身殉国的斗士。骆玉明先生评论此书说：

朱先生对历史表现了他的尊重和认识。比如，书中明白指出：农民起义是被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激起的，而由于明朝军队无力在两线作战，终于导致清人入关的结局。这不是一个吴三桂可以造成的事实。历史常常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个人无力挽回的厄运。但并不是说，个人可以由此而放弃他的责任。那就是全书最后所说的：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在写作方法上，陈子龙传也与先生以前各种传记不同。陈子龙传一改以往引证多而繁重的特点，除了传主本人的诗文，很少引证、考订，把大量的材料融为直

接的叙述和描绘，文气格外奔畅。与宏大的背景、敏锐而发人深省的思考、热烈的感情和现实气息相结合，全，书便出现高屋建瓴、恢宏雄放的风格，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这确与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条件有直接关系。

祖父因工作劳累，冠心病症状加重了，并出现了早搏，不得不住院治疗。此时我已工作，并成了家，每日下班回家，即往长海医院探望祖父。我与外子从未有过花前月下、公园影院，只是从校园到校园，再到祖父的病榻旁。婚后，我们和祖父生活在一起，家里还请了一位帮着照料祖父的宁波阿婆。这年深秋，我的父亲在无锡病逝。紧接着冬至那天，我们的女儿诞生了，这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代成员了。孩子的出生，使祖父稍稍忘却了晚年丧子之痛，他将自己名字中的“东”字给了孩子，加上原定排行，于是这小小的人儿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东。出院那天，我和外子抱着孩子回家，祖父早已等在门口，他接过襁褓，长久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孩子，初生的孩子也瞪着黑亮的眸子，朦朦胧胧地注视着她的太爷爷。从此我们这个家平添了许多童趣和生机，屋子里经常传出婴儿的啼哭咿呀声和祖父逗弄孩子的开怀大笑。这年夏天，祖父委托三叔君道和三姑惠如前往老家泰兴，将他与祖母经多年搏节于抗战前夕建造的房屋和四千余册书籍，正式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地县政府为此举行了捐赠交接仪式，并将房屋开辟为县青少年图书馆。这是祖父母多年的愿望了，五十年代以来曾多次提出，直至此时，方得实现。

进入八十年代，祖父的健康大不如前，可是往往在生病治疗告一段落后，他又开始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开始酝酿新的作品。有一次，祖父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出现了很危险的奔马律，我们怕在送医院的路途中出危险，便请复旦的韩老医生治疗。韩医生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戴着金丝边眼镜，服装整洁气派，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心血管疾病很有研究。韩医生胆大心细，不断地来测试观察祖父的心律和整体情况；夜里还数次打电话来询问，并指导我给祖父服药。祖父度过危险期后，韩医生仍定期前来随访。与他同来的还有王医生，她容貌端正，工作细致认真，与韩医生配合默契。在韩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祖父的病情得到控制，转危为安。韩医生也是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工作的，他说祖父劫后余生不容易，一定要让他多活几年，做他想做的事。韩医生后来去加拿大参加国际心血管研讨会，不想回国后竟一病不起，不久即去世了。祖父闻讯后痛心不已，说这样的人不多了，太可惜了。

一九八六年，祖父开始撰写《元好问传》，虽然疾病迫使他一次次放下手中的笔，但只要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他便又重新开始工作，与疾病与衰老作最后的赛跑。十二月六日，是祖父九千诞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泰兴县委及政府假上海作协礼堂，联合举办庆祝祖父执教七十年及九十诞辰纪念会。那天到会的人很多，大病初愈的祖父非常高兴，他腰杆挺直，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地致答辞：“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人，有幸活到九十岁。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教育事业而工作。今后，我仍然要照样努力下去，为了国家，为了复旦中文系而奋斗，我是否能够做到，在座诸位可以看到，我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

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孩子长得天庭饱满，眉目疏朗，且健康结实，活泼好动，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从幼儿园回来，她便和老爷爷下跳棋，猜谜语，到院子里看蚂蚁搬家。有时也不免胡闹。有一次，孩子抓破了祖父手里线装书的封面，连阿婆都急了，说：“撕书要打手手的！”祖父却搂着孩子说：“没事没事，只是封面而已，宝宝要书是好事。”在玩耍中，不知不觉

地祖父还教孩子认了不少汉字，他把这些汉字用粉笔写在卧室的房门上，看了让人好笑。祖父生病时，我们给他另做了可口宜消化的饭菜，让他在卧室安静用饭，不再下楼。调皮的孩子常常跑上楼去，坐在老爷爷的怀里和他一块儿吃。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祖父断断续续撰写的《元好问传》脱稿了，可是还有很多后期工作没有完成。紧接着是博士生李祥年的毕业论文答辩会。那几天，我发现祖父的脸色不好，眼结膜有点发黄，很是担心，但祖父坚持要参加李祥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十八日，答辩会如期在家里二楼的北房举行，顺利通过。次日，祖父全身出现黄疸。二十日，我送祖父又往长海医院门诊，医院当即留祖父住院检查，我原定此间去深圳大学参加国际汉学研讨班的学习，这时便很犹豫。医生说看样子不会有大问题，祖父也一再说机会难得，坚持让我前往。我便牵肠挂肚地走了。在深圳，我除了上课听报告外，无心多入市游览，经常设法往家里挂电话。深圳大学远离市区，通讯颇不方便，其时尚无直拨电话，挂一次长途，往往要等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甚至更久。通话时，线那头的外子总是安慰我，说医生仍在检查，祖父除了黄疸未退，其他情况尚可。夜里，尽管招待所的条件很好，可我却辗转难眠，盥洗室的水箱彻夜的漏水声，更是搅得我心烦意乱。

好不容易学习结束，我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夜回到上海。下了火车，在刚启用的上海新客站见到来接我的外子和五岁的女儿，看到他们自然的神情和笑容，我心里略觉宽松了几分。在回家的路上，外子告诉我，医院认为祖父因胆结石而致胆管阻塞，决定近日手术。其间，调往南京军区总院的大姑和姑父赶来上海，与长海医院的医生商量确定了治疗方案，现已回南京。而前几年已调往北京铁道科学院工作的四叔君迈，这时正回沪探亲。

第二天，我一早便赶往医院，见到了分别二十日的祖父。祖父明显地消瘦了，全身皮肤黄黄的。我忍着心中的不安，和祖父述说在南国的见闻。手术决定在十五日上午进行，祖父表示可以接受，积极配合治疗，便可以争取康复的希望。直到这时，我们都没有想到问题的另一面。这几年，祖父多次入院，病魔一次次将他缠住，他每次都顽强地站起来。

十五日清晨，祖父被送进了手术室。我和叔叔在手术室门外的走廊上等候，中文系总支书记高老师也来了，他和我们一起等待手术的结果。主刀的是长海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吴孟超教授，他是国内外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我祈祷着手术的顺利。意外的是，手术仅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便结束了。护士出来告诉我们，祖父患的是晚期胃癌，肝门淋巴结转移，并发阻塞性黄疸。医生从胆囊中取出几块结石，做了一些处理，便结束了手术。我惊呆了，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数年前，祖父住院时，医生给他做过胃镜检查，也曾有过胃癌的诊断，后与在病理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的大姑共同分析，重做切片，又推翻了这个结论。祖父出院后，又如常生活、工作了两年。然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情的事实；

祖父被送到术后监护室，大家约好不告诉他真相。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而在当时，却很难做出另一种选择。祖父醒了，我们告诉他手术很成功，医生已将结石取出，接下来要紧的是好好休养，配合治疗。我和叔叔轮班日夜守护在祖父身边，度过手术后艰难的最初几日。祖父时而昏睡，时而又被伤口痛醒，他烦躁地要拔去缠在身上的种种管子，迷迷糊糊地问我为什么要让人把他捆在这儿，为什么不让他回家。病痛和文革中留下

的阴影交织在一起，使祖父痛苦不安。数日后，危险期过去了，祖父被达到住院大楼的单身病房。

祖父的神志开始清醒了，精神也略有好转，一周后，伤口竟神奇地开始愈合。我每日去医院陪伴祖父，看着一日日好起来的祖父，心想也许真的会有奇迹出现，祖父还会像以往一样康复，并跟我一起回家。祖父对我说，他希望能活下去，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家中的几部稿子还等待着进一步的考订和修改，他想亲眼看见中文系的前进与发展。提到他心爱的小重孙女时，祖父的眼光是那样柔和，他说：“我从心底里爱这个孩子，我要亲眼看到她上学，开学那天，我要牵着她的小手，送她去学校。”我答应着，扭过头，拭去大颗大颗滚落的泪珠。此时，我的母亲和叔叔、姑姑们都从各地赶回来。对于病情，祖父似有所觉察，但他从不提起，也不询问，他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工作和中文系的发展，对于生命和事业，祖父直到最后都不愿放弃。

祖父的病情开始恶化，他自知不起，遂坦然地与前来探望他的人们话别。二月八日清晨，祖父开始神志不清，已不能辨认在一边守护的亲人。我扑到病床边，大声说：“祖父，我是小微，我在你的身边！”当时守在一边的系主任陈允吉老师也说：“朱先生，小微在叫你。”祖父用他最后的力量从被单下伸出右手，我赶紧用双手紧紧握住，抱在胸前。祖父在枕上微微点头示意，便进入深昏迷状态，就此再也没有醒来。十日下午四时四十九分，祖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残冬的斜阳穿过病房窗子的玻璃，温柔地抚摸着祖父安详的遗容。

次年（一九八九年）春四月，我们送祖父的骨灰回故乡安葬，遗憾的是祖母当年未能留下骨灰，只好将他们纪念结婚四十周年的合影置入骨灰盒，完成祖父生前的嘱咐，让二老永久地相聚，不再分离。

《李方舟传》记祖母生平，止于一九六五年深秋祖父与祖母同游南翔古漪园，屈指算来，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祖父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学研究的严谨学者，又是一位节操高尚、感情丰富的长者。他在苦难中所写成的这部传记，记载的不仅是祖母的生平及他和祖母的共同生活，它所包含的内容，相信将由人们重新解读。三十年后的今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人类的命运也不会总是重复昨日。虽然没有人希望再重蹈前人的苦难与艰辛，但前人的执著和努力，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却是永远不失其意义的。

感谢陈思和先生的美意，使本书得以出版问世，也感谢章培恒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使本书更具纪念意义。

记于一九九五年盛夏

序

这部作品所写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她有她的崇高理想，也曾为社会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她失败了，可是她的失败并不能掩盖她的努力。人是应当有理想的，但是他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一位寻常妇女是不是可以立传呢？按照中国的史家，是不能立传的，清代的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的资格。至于一般人民，如种树郭橐驼之类，只能由文人当作一种文字的游戏。但是在西方文学史中，是完全不同的，鼎鼎大名的约翰逊博士只是一位乖僻的文人，至于附带出现的如约翰逊夫人、威廉夫人等，更加是寻常人物，对此中国的旧式文人是不会提到的。

这本薄薄的小传，就这样写出了。传中的人名、地名、机关名，由于是在特殊的年代写作的，因此都经过一些转化，关心的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古漪园中的秋游是实写。那一天方舟夫妇正在领略温馨的秋阳，灿烂的秋色。勤劳壮健的劳动人民，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时代。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路平坦地走下去，历史已经作出结论。

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一九八 年三月东润自序

“火凤凰文库”内容简介

再思录（火凤凰文库之一）

巴金 著 12.00元

《再思录》是《随想录》的继续。

八年前，作者完成了《随想录》这部讲真话的大书。其时，老人曾宣布向读者告别，搁笔小憩。可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人类炽热的爱，使老人无法真正放下手中的笔。在这八年中，他一如既往地辛勤劳动着，编读了自己的全集，写下了一系列总结自己创作道路的代跋，还创作了《怀念从文》等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散文，怀念亲友，抒发暮年之志……在“没有神”的宣言之下，一个无畏的无神论者继续着自己的“再思”。《再思录》汇集了作者在《随想录》之后写作的文章（部分未发表过），是老人人生逢九十大寿时贡献给当代读者的一份珍贵礼物。

狱里狱外（火凤凰文库之二）

贾植芳 著 12.00元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监狱是一个非常的所在，而本书的作者恰恰与监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同的历史时期，他都作为政治犯进过监狱。狱里狱外的交错更替，构成他漫长的人生历程。为了真正活得像个人，他认真地付出过生命的代价。

这部凝聚着作者一生重大经历的回忆录便以狱里狱外为分，前者“狱外记”从作者一九四八年自国民党监狱出来，到一九五五年因胡风冤案被关进另一个监狱为止，后者“狱中记”则自入狱至文革前夕的正式判决。全书以后半生的经历为主线，穿插追述前半生传奇式的人生坎坷经历，汇成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一个真正的人的生命轨迹。

文革中的我（火凤凰文库之三）

于光远 著 12.00元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昔日惊天动地，今朝灰飞烟灭”，并非耸人听闻之辞。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应该淡忘的。出于此，著名经济学家、理论家于光远写下了个人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这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注重个人亲历，内容翔实，尤其是作者“文革”后期复出后参加邓小平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与起草几个“纲要”的重要经历，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真实地展现了那个荒诞年月中的人生浮沉、世事动荡，令人深省。

龙卷风（火凤凰文库之四）

蓝翎 著 13.00元

在自然界，龙卷风的发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人世中的一些现象，就其不可预料性而言，颇似自然界的龙卷风——突然一阵风起，便改变了被卷入者的生命轨迹。作为当年被卷入龙卷风中的“小人物”，本书作者前几十年的命运即如是。本书系作者首次出版的回忆录，完整地展示了自一九五四年投身《红楼梦》研究批判起个人数十年的真实经历，内容丰富，堪为那段特定的历史之存照。

留一点谈话给你猜（火凤凰文库之五）

朱正 著 13.00元

单看书名，很难猜到这是一本杂文集，似乎杂文与谜语了不相干；然而，在作者笔下，杂文确是一个丰富多采的世界。他善于用笔尖挑开种种表象，于一般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中，发现应当抨击的种种不正常，发现一个个应当有解而一时又难以解开的谜。随手拈来的话题，渗透着敏锐的思考；古今中外的天地，镌刻着求索的足迹。一旦读完这本书，你也许可以明白，作者留给你猜的究竟是什么。

人生扫描（火凤凰文库之六） 李辉 著 13.00元

作者偏爱历史的追寻。他不愿手中的笔，只是匆匆掠过事物的表层。他注重的不是一时一事的出现，而是广袤的人生风景线，是不同性格在历史风雨中的呈现。本书汇集了作者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印象记、访谈录、随感、漫笔等，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富于变化的语言，活现出巴金、沈从文、周扬、丁玲、梁漱溟、萧乾、施蛰存等一个个真实的人。他写自己心灵的感受，写自己的独到理解，这样的人生扫描，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穿透力。

刺丛里的求索（火凤凰文库之七） 王晓明 著 13.00元

本书首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前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是不是陷入了困境？倘是，该怎么办？

作者笃信鲁迅的名言，即使前面无路，也要“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或是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或是检讨文学批评面临的学术难题；或是记述若干师辈与友辈的精神面貌，以映照当下文化人的心理病态；或是返观先秦诸子，追寻中国文人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源头；或是慷慨激昂，针砭流行的文艺现象；或是小心翼翼，重梳新文学的复杂历史——凡此种种，都汇聚成为“刺丛”中的顽强求索，凸现出作者的独特见解。

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火凤凰文库之八）

海德格尔著 郜元宝译 张汝伦校 12.00元

当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思想博大精深，邈无涯际，令不少青年学子心向往之。然目前国内海氏著作的中译本太少，给相当一批急于了解海氏思想而又可能通读原著的爱好者造成了巨大困难。本书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中精选出一百六十余年语段，以“存在的真理”、“思想的任务”、“语言是存在的家”、“人诗意地安居”、“技术和人的命运”为题分为五大章，大致勾勒出海氏思想的轮廓与话题中心。这种较为浅近的形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接近原著，进入海德格尔极富魅力的精神王国。

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火凤凰文库之九）

沈从文 张兆和 著 沈虎雏编选 18.50元

沈从文先生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与张兆和结璃于三十年代，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沧桑。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战乱时的苦苦分离，还是三五日的短暂小别，鱼雁尺素始终连着心与心。这些历经战火动乱幸而留存的家书，真正是率性至情之作，弥足珍贵。尤其是由于沈从文先生后半生未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独特的生命体验、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过人的才情，都悄悄地渗透在这些写给亲人的书信中。

这些不是创作的创作，除少数曾经发表，余皆从未面世。此番由沈虎维先生精心编选，张兆和先生亲自一一审核，是为不可多得之本。

李方舟传（火凤凰文库之十） 朱东润 著 11.50 元

这部首次面世的传记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是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二十多年前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独居斗室，于悲愤中为纪念含冤去世的夫人而写下的追思之作。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此作只能将真名隐去，而托以化名，然透过细细密密的文字，透过风风雨雨的岁月，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位可敬可亲的女性的人生足迹，感受到人生的真实，情感的真挚。这样一个富有真性情的生命最终的不自然毁灭，总能使人憬悟一些什么。

沉沿（火凤凰文库之十一） 邵燕祥 著 13.50 元

这是一部人生实录，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

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场斗争早已经远去，那个时代的人生故事也已经说了许多，如今重提以往，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可是，这部作者写于十四年前的书仍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震撼力。作者并没有渲染人生的悲剧性，甚至没有常见的悲剧情节，一切可以强化效果的“戏眼”均轻轻放过，而是一笔一划地，写出了一个人是如何在时代的风浪中一步步“沉没”的，好像电影中的慢镜头，让你逼真地感受到这种“沉没”的过程。

黄昏人语（火凤凰文库之十二） 陈原 著 17.00 元

本书系著名学者陈原先生的随感集。

作者白云：“这本集子所收各篇，如过去的集子一样，说散文不像散文，说杂文不像杂文，说论文不像论文，三不像，全是些不三不四的随感文字。不过没说假话，所抒发的感情或见解，都出自心底，仿佛对着知己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无话不可谈，说得重了轻了斜了歪了，彼此会心一笑了事。”读着这样的文字，可见坦荡荡真性情；看这样的书，也许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潇洒。

无梦楼随笔（火凤凰文库之十三）

张中晓遗稿 路莘整理 12.00 元

如果没有那些写在发黄的、陈旧的纸张上的文字，如果那些文字没有那份激动人心的力量，那么，死去已快三十年的张中晓也许就不会在今天被重提。然而，他终于没有被忘记。这不是因为他在五十年代才二十多岁就写下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而显示出他的才华，也不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五年以后因胡风冤案的牵连而遭受了极其不幸的经历，而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在经历磨难艰苦备尝的逆境中，始终怀着一颗在知识中寻求力量的赤子之心，一笔一笔写下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这就是王元化先生为之作序的《无梦楼随笔》。

纯美的注视（火凤凰文库之十四） 张炜 著 19.50 元

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作者常常一个人面对窗外茫野景物：或闹市车流，或寂寂雪地，产生一些悟想和激动，遂将其记下来，收在手边。这是一些发自内心的话语，像是“自言自语”，更像是自鉴；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声音，

使人看到在一片逃避崇高的媚俗之风中，尚有人在坚守、坚守理想、信仰，坚守真善美，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格力量；这是心汁铸成的文字，质朴真诚，平易中蕴有震撼心灵的力量。这些散文随笔都是第一次结集，其中大部分文章从未发表过。

犬耕集（火凤凰文库之十五）

陈思和 著 15.50 元

当商品经济大潮呼啸而至时，人文学科陷入了价值失范的困境，知识分子自身的危机又一次暴露出来，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价值何在？……一系列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逼着人们作出回答。

本书正是作者直面危机的毫不含糊的回答。当然，在嘈杂的各种流行声音中，这声音显得微弱，但是，作者相信，只要意识到了，开始做了，就有意义，即便是以失败来证明一代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的悲剧，也实属亡羊补牢之举。

人，在历史漩涡中（火凤凰文库之十六）

王观泉 著 14.50 元

我们每天都在走过历史，历史之河于我们似乎很平和，不动声色，然而，个人一旦置身历史之漩涡，情景则迥然不同。本书所写的便是历史漩涡中的个人。虽说墨分五色，人各有别，但无论是大时代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郁达夫，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种种小人物，在历史漩涡中，都有着坎坷迭宕的经历，有的甚至长期被曲解。正因为如此，作者力求写出历史的真实，写出尘埃落定后凸现出的真实的人，写出历史漩涡中的生命轨迹。

“大跃进”亲历记（火凤凰文库之十七）

李锐 著 19.50 元

这是作者继《庐山会议实录》后的又一部纪实之作。

回顾历史的挫折，往往使人沉重，为着走过的弯路，我们毕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然而，回顾又往往能使人清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道理很浅，也很深。这一部《“大跃进”亲历记》，正是作者对于历史的追忆实录，自“讨论三峡问题”起，至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详尽地展示了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这位望八老人深感有一种责任，他希望这对于后世能有鉴戒的意义。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火凤凰文库之十八）

铃木正夫著

李振声 译 16.50 元

作为一个自小就很喜欢读郁达夫作品的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先生难以相信、也不愿相信郁达夫惨死于日本人之手。二十五年前，由于某个契机，他着手考证郁达夫避难苏门答腊的事迹，意想不到地得以窥见了郁达夫失踪的真相。为了彻底查清这一历史疑案，他沿着当年郁达夫活动的轨迹，苦苦追寻当事人与知情人，作了大量的调查，最后认定郁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值此郁达夫诞辰百年之际，铃木正大先生根据二十多年来的调查写成本书，详尽叙述了郁达夫由新加坡避难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一份正确的记录。

李方舟传

方舟的家史

淮南是一个大省，从大别山脉向东，一派丘陵地区，这里有黄山、霍山，重冈叠嶂，万水东注，造成巢湖、瓦埠湖，再东是洪泽湖、高宝湖，果然是天连水，水连天，无边无际。高宝湖的东边是运河，运河的北首是淮水，南首是大江，真个滔滔茫茫，一泻万里。运河以东是水网地区，中间一只脚盆，是兴化县的周围。无边的大水，有时造成特大的自然灾害，人民的流离痛苦，是数不尽的；但是大熟的年岁，秋天到了，一年的辛苦，结成丰硕的果实，黄熟的稻穗，更是一望无际。在封建时代，完了秋税以后，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因为地形的东西不同，因此自古把西边的丘陵地区称为淮南西路，东边的水网地区称为淮南东路。东西虽然不同，人情风俗，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尤其在南宋时代，淮水曾经是女真族和汉族的边界。那时女真族以入侵的姿态进入历史的纪录，汉民族在南宋王朝领导之下，正在这里作顽强的挣扎。南宋王朝是历史上一个软弱的王朝，但是人民是顽强的。女真的侵略军结队南下的当中，南宋的统治者早已屁滚尿流，逃过长江，甚至逃过钱塘江，准备渡海；这里的人民却结成山寨水寨，用自己的热血，保障自己的家乡。牺牲当然是巨大的，淮南省的户口，曾经猛降到四万余户，但是血泪的挥洒更锻炼了人民的坚强意志。在中国北部的女真族衰退以后，新来的异族更凶暴更旷野地南来的当中，淮南人民的斗争不是低落而是更坚强了。尽管入侵者的铁蹄曾经一度像风扫残叶一样，从东亚到西欧，在一刹那之间，蹂躏了一大批的国家和民族，但是淮南的人民却坚持了三十多年，直到南宋的统治者已经向敌人屈膝，要求这里的人民不再作无谓牺牲的时候，他们明知大势已去，还是拒绝放下武器。这些都是历史的故事了，但是历史的故事却证实了淮南东西两路人民的坚强。

人民的意志，不是无情的历史磨灭得了的，时代变了，封建统治者不知换过几个朝代，可是人民的意志却很少受到时代的磨折。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统治者斗，与地主恶霸斗。他们的生活是辛苦的，但是辛苦的生活只是更加地锻炼他们，使他们更勇敢，更机智。

如今却说淮南东路济川县的一户人家。济川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在祁江的东南，已经到了长江的边缘。浩荡的长江，从西直下，到济川县的柴墟镇，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经过几十里的光景，到骥诸县，再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滔滔的万顷大海，已经在望了。济川县被拥抱在这两个九十度的直角之中。县东南五十里有一个集镇，名叫李家集，原来是一座大镇，衰落下来，也还有几十户人家。因为镇南便是骥诸县，那里的老百姓在农闲的时候，都以织布为业，机声札札，辛苦了若干日以后，把土布收到李家集，再由集上的行家，转售给下河一带的布商。这些行家实际上是居间人，因为布商和机户之间没有中间的联系，在那个时代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担负了收购的任务，也还是需要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家集有一户李月记布行，老板李月波，用现在的话说，在场面上，各方面都兜得转，因此把这座月记布行，做到近悦远来。李月波有一个缺点，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随随便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只算是小小的风流罪过。当他到骥诸收布的时候，和一位大户人家的寡妇钩上。他已经成了家，这位寡妇是不肯轻易过门的，生了一个男孩，由月波抱

回来，居然长大了，后来叫做诚斋。月波在家里又和丫头钩搭上手，生了一个男孩。这以后他的妻子才生了第三个，最后索性把丫头收了房再生了一个男孩。诚、明、亮、达四弟兄慢慢长大了，亮斋因为是正室的孩子，人又聪明能干，兄弟们总得让他些，诚斋和明、达两位只算是三个配角。

月波去世的时候，亮斋和三位兄弟一商量，由明、达两位，带着庶母到乡下去种田，当然没有话说。诚斋虽然居长，事实上还是由亮斋指挥的。可是他有一种本领，不拘什么布，只要他眼睛一过，就能报出是用多少经线纬线织成的，连带布的重量质量，在这一眼之中，都能如实地报出来，因此在布庄收布的时候，他是一个最得力的人员。这些事亮斋都记在心里，因此他和诚斋一商量，由他们两位把父亲的铺子顶下来，牌号仍然是李月记，老板却是老大和老三。

到九十年代，诚斋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家累也重，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亮斋的鬼点子又来了，他想自己孩子少，犯不着替诚斋养活这一堆儿女。一个冬天他对诚斋说：“大哥，店里的事你是最清楚的，看来是进的少，出的多，如今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你划算一下，能不能再凑出些本钱来，我们还是把上人的事业维持下去？”诚斋和老三说话，一向是矮了半截的，虽然是哥哥，究竟不是胞兄弟。且说，自己凭什么再凑本钱呢？本来他不如亮斋能说会道，现在更是一言不发了。到了年终，亮斋拿出本钱来，牌号没有换记，老板只剩了亮斋一位。乡间的规矩，新年初五，要敬财神爷，平时总是首先由老大朝上恭恭敬敬地磕头，接着是亮斋，以后才是伙计们。这一天不同了，明晃晃的蜡烛点上以后，当中烧了一炉好香，亮斋也不客气一句，趴下去就磕起头来，磕过以后，他才让伙计们磕头，当然是由诚斋领班了。

诚斋是老实人，不过对于亮斋这一套办法和自己地位的变更，他是明白的，真想不到自己竟变成一个替老三干活的人了。他虽然不在店里管账，对于店内的盈亏，也还知个大概，怎能亏到这步田地呢！他憋了一肚子气，话也没有说，只是一天一天地捱下去。

祸不单行，正在诚斋降成伙计的当中，他的女人咽了气。痛苦是没有底的。孩子一共是四个，大的才不过十二三岁，虽然是女的，多少还能烧点煮点，可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到底能做些什么呢？还有，诚斋的任务是到驢渚收货，天不亮就得起来，到中午是不是能回家，自己也没有个数，这四个孩子怎么办呢？事情真真把一位老实人磨折到不成样子。

不过，困难总有个尽头，常到诚斋那儿去的一位季奶奶出来替他说媒。诚斋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五口还忙不过来，凭什么再去续弦呢？可是禁不住季奶奶的劝说，而且事实上自己也招呼不了这些儿女，只得点点头，由季奶奶去穿针引线了。

这位季奶奶的先生原先也在一家铺子里做伙计，因为一向无儿无女，自己又懒散，乐得跟季奶奶一同跑，东一位姑妈，西一位舅舅，不知他家哪里来的这些亲戚，好在季先生到处随和，奶奶又能说长道短，总不会没有他们夫妇插足的所在。眼前季奶奶正在想到一位远房侄女，柴墟镇的季家二姑娘。

柴墟镇是长江边的一个大码头，名义上属济川县，实际上这里距济川县、海陵县、邗江县都有四五十里，差不多是个三不管的所在。下河一带周围几百里的地面，都把柴墟镇作为一个出江的门口，所以显得特别重要和复杂。镇上的季家是一个大族，人丁极旺，在那个时代，特别显得气派。季家有一

位季大爷，是个著名的鱼贩子，别号“海里蹦”。由于柴墟镇是出江的口门，到淮南东路推销海货的宁波船都集中到这里。每年四月间，拢到港外的黄鱼船还不多，那时的规矩是不问什么人，只要第一个从小船蹦上海船的鱼贩子，这一批来船的黄鱼都由他一个人包下来。季大爷年青的时候，仗着一身的好武艺，技高人胆大，总是第一个蹦上宁波船，这一批货色就算是他的。年份久了，很少有人争夺，差不多他就操着第一批黄鱼的专卖权。由于时令还早，什么人都爱吃一个新鲜，利息当然就优厚了。季大爷挣了一份不小的家产，在柴墟镇出了名，谁都得尊他一声老太爷。

季大爷在营运上一帆风顺，可是只生了两位姑娘，不久就去世了。在大姑娘出嫁到海陵县栾姓以后，老婆婆不久也去世了，遗下一位二姑娘和一份可观的遗产。在封建社会里，姑娘们是不能承继家产的，便有一批堂房兄弟出来争夺遗产，这个说，“我最亲，家产应当由我继承！”那个说，“论远近我们也差不了许多，可是老太爷在世的时候，对我最好，我也尽心尽力地伺候过他老人家。”也有些死者的侄儿，道理虽然提不出来，也要出来争执，凭着嗓门高，拳头大，总不能看着这份家业落到别人手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知道大姑娘向来是个没嘴的葫芦，提不出主张来；可是二姑娘呢，虽然没有婆家，年龄已经二十四五，差不多是一位老姑娘了，懂的事也多，在争夺遗产的当中，只要她说一句，死者对哪个侄儿亲一些，或是哪个侄儿伺候得周到一些，那么在遗产的分配中，这个人的机会就多一些。因此二姊姊长，二姊姊短，大家都来向她讨好。争遗产的官司不知打了多久，最后由济川县的知县老爷公断，当然由出钱结交知县老爷的人掌握了一大半，其余大家都沾些光，总算不是空闹一场。到这时候，胜利者固然认为分所应得，失败者都把怨气搁在二姑娘的身上，见了面还是亲热地喊一声二姊姊，背地里却称她为“二垮子”。

季奶奶是一位远房嫂嫂，在和李诚斋谈话的当中，正想到这位姑娘。她从李家集回城，把家务料理了一下，叫着一部小车，叽叽咕咕地走了四十里，从济川县城赶到柴墟镇。车子一直推到二姑娘家里。二姑娘本来最热情，手头也还宽裕，见到这位多时不见的嫂嫂，连忙把她接下来。

“好久没见到了，这一会该在柴墟好好耽搁些时吧？”二姑娘说。

“是呀，”季奶奶说：“还是那回在城里打官司的时候看到的，现在差不多又是年把了，日子过得真快。”

这一晚，季奶奶和二姑娘躺在一个铺上，谈了不少的体己话儿，她谈到李家集的光景，慢慢地就说到李诚斋身上来。

“嫂嫂，这件事我们不说吧，散漫惯了，还是一个人生活自在些。”二姑娘说。

“妹妹，不是这样讲的，”季奶奶说：“落叶还得归根，人总得有个归宿。是的，这是续弦，可是妹妹，你也得想一下，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有几个不是给人家续弦的？续弦固然是续弦，可是上无公婆，又没有小姑姑挑眼搬是非的，到了人家，就由你当家，有什么可说的？李家集的李月记这布行，妹妹你不是没有听到过。诚斋的为人，厚道老实，做嫂嫂的还会在妹妹面前撒谎吗？就说他有一个女孩子，也已经十二三岁了，又忠厚，又能干。凭诚斋这个布行的大老板，也不至于辱没我们姓季的门户。”

话说到这里，打过三更，时间已经不早，二姑娘也疲倦，慢慢地睡实了。

做媒的都是有传授的，总免不得带个三句五句的谎话，要是完全不扯一

些谎，难道就不做亲，大家都去做和尚当姑子吗，像季奶奶这样的说媒，要算再诚实不过了。诚斋确实是当过老板的，就是现在他的地位已经变化以后，一般人口顺，还是这样称呼他。至于孩子，他可就多了，除了大妞以外，还有八九岁的二妞，四五岁的三妞。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儿子，年龄才得十岁，学名一个楫字，可是书生气十足，平时非常用功，常常获得老师的夸奖。这一切，在二姑娘从柴墟嫁到李家集以后，都看清楚了。

她现在已经不是二姑娘而是李奶奶了。李奶奶下了花轿，便遇上了一系列的问题。她看到诚斋已经无力支持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单凭她的嫁奁，她还担负得起，真算是下得花轿，进得厨房，里里外外，她的肩膀宽得很呢！问题出在亮斋的三奶奶身上。大奶奶依着孩子，称她一声三妈，当然三妈也得回敬一声大妈。可是尽管这样的称呼，三妈已经四十出外的人了，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妈，和她平吃平坐，已经从内心里感到不痛快，何况现在诚斋还是靠老三吃饭呢！这一切引起她的不舒服。她有她的办法，大妞、二妞、三妞都在她的影响之下，慢慢地和这位继母疏远起来。可是大奶奶尽管年轻，办法是有的，她首先是不和孩子们对立，家务事她抢着干，对孩子则尽量满足她们的要求。小孩子的心境是随时转变的，虽然认到这不是亲生的妈妈，可是亲生的妈妈能给的，她都充分地给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楫这孩子，李奶奶看清楚这是一个有心计的孩子，不像他爸爸那样的沉闷。那时科举还没有废，一件秀才的襦衫，正在那里诱惑每个男孩子。李楫一心一意看定这件襦衫，李奶奶明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很清楚即使自己生下一个小厮，有一个肯上进的哥哥作榜样，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道理想通了，李奶奶认定自己已经有力量闯过每一道难关。

李楫发愤苦读的情况被三叔看透了，他风言风语地说：“生意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学生意，一把算盘就够他吃一世。要说考秀才，莫问没有这本领，即使有了本领，李家从来没有考过县考，报考的时候就找不到廩保。”——那时报考的总得有一位在学的廩生保荐，否则算是开籍，这是廩生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件事把李楫搞苦了。

李奶奶看出这个问题，她和李楫说：“孩子，愁什么！柴墟镇季家的廩生多得很呢，将来他们陪你去报考，看哪个敢站出来说话！”这一句有力的话语，使李楫更加笃定地读书，至于读书是为了什么，考秀才又是为了什么？说来说去，还不是个人的名利，这种思想，李楫没有想到，连带他爸爸和妈妈都没有想到。

时间已经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受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北方的义和团一向是坚决反抗满清王朝的统治的。满洲族入关以后，在河北执行大量圈地圈房的政策，人民被迫得离乡背井。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他们曾经利用各种宗教形式，团结起来，和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现在帝国主义者又来了，他们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当然他们也会迫使中国的统治者成为他们的工具。统治者面临着双重的敌人，一边是中国人民，一边是帝国主义者，在这两者之中，尤其是后者使他们更感到不好受。可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花招是很多的，他们拉拢群众中的头头。在头头们进行拜佛拜祖等宗教仪式时，统治者也就跟着在后边磕头行礼。有时头头们来到的时候，统治者中的王爷们也是大师兄长，大师兄短；临到他们出门的时候，王爷还得送出大门，毕恭毕敬地把大师兄送上

八人大轿。这一着真是两面三刀，毒辣万分，群众的“反清灭洋”的大旗，慢慢地变为“扶清灭洋”。统治者一边借着帝国主义的屠刀屠杀人民，同时再在人民的背后勾结帝国主义者，棚上一刀，北方人民群众的鲜血染红了大地。但是血不是白白地流出的，帝国主义者看清楚中国人不是轻易可给他们欺侮的，同时统治者的根株也被掀动了，十年以后，满清王朝的统治从历史舞台上倒下去了。

这一场血腥的战斗在北方进行的当中，东南一带的人民是不很了解的。李家集照样地生活下去。李诚斋照样地替李月记收布。但有一件事他是关心的，在婚后的第四年，奶奶怀孕了，本来养家活口的事一半还得依靠女人，现在问题到了面前，添了一个孩子，生活的担子压得更重了。他正为这件事感到为难，九月下旬，小妞儿出世了。

方舟上学

小妞的出世，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大妞和李楫已经不小了，就是二妞、三妞也到十岁内外，因此婴儿的啼笑，常常引起一阵喜悦。可是诚斋的包袱更重了，李奶奶的细软也一件件地落到高利贷者的手中。不过诚斋和李奶奶的感情更深厚了。小妞还记得她跟着妈妈到海陵县大姨妈那里去过，在住了一两个月以后一个傍晚，一辆小车叽叽咕咕地送她们娘儿两个回家的时候，在李家集外的马路旁边，看到诚斋。他连忙把孩子抱过去，和她亲了一下，一边轻轻地说：

“我这几天老是到马路边上看着，谁知道你们今天才回来呀！”

“是呀，”李奶奶说，“在姊姊那里总是心挂两头的。”

诚斋把父亲的慈爱倾注在小妞身上。尽管手头不太宽裕，天晚由浴池回家，洗濯了一身汗垢，送走工作的辛苦以后，总得买个雪梨或是一包京枣带给小妞，答复这一个欢乐的笑脸。这一切小妞都还记得。

可是诚斋在辛苦的生活中病倒了。没有多时，在一个黄昏，紧紧握着小妞的小手，终于离开婚后不足八年的妻室和五个孩子而去世了。四五岁的小妞记得自己伏在棺材的前面，把一张张纸钱给爸爸烧化。

悲痛和贫苦摧残了李奶奶，可是就在这个死丧的悲痛还无法抑止的时候，她还准备给李楫办喜事。李奶奶办喜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一年大妞出嫁给一位姓宋的店伙，好在这是一家忠厚笃实的人家，事情也还顺手。目前李楫的问题却把她难倒了。李楫所定的亲事，是济川县的吴家，是表兄妹的婚姻。李楫的母舅姓吴，是一个小地主，因为有一位堂兄弟做过一任学台，便带来了三分官气。现在舅舅虽然死了，可是舅母却是一位刁钻入骨的妇人。她看到自己的女儿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便要求趁着诚斋的热丧办喜事，乡间人称为“冲喜”。

李奶奶约略知道一些情况，可是三奶奶的风言风语传出来了，说是到底是晚娘，没有把儿子的终身大事放在心上。李奶奶经不住三奶奶的挑拨，同时又因为舅奶奶的软骗硬逼，终于把一位弱不禁风的新娘子接回来。总算是体谅诚斋去世的悲哀，没有要求什么大吹大擂的排场，可是吴奶奶把问题提出了：总得给新娘子治病啊。骥渚县的四墩子有一位名医，吴奶奶要求陪同病人去四墩子看病。中医治疗的要求是反复看，仔细看，李奶奶只得雇船带同亲家奶奶、新娘子和小妞去了，家务交给二妞。医师的要求很高，参、耆、桂、朮一大堆，在冬天还得吃个西瓜。李奶奶只是三十开外的人，赢得了一头白发，连新娘子也看不下去了。她背着人和吴奶奶说：

“妈妈，我的病自己很清楚，眼看是好不了，不要再难为婆婆了。”

就这样，一叶扁舟把一位垂死的新娘送回李家集。直到新娘咽气，吴奶奶还在作最后的要求，在一切满足以后，她才在悲嚎声中回到济川县。

两年之中，经过诚斋、新娘子的两番丧事，和大妞、李楫两份婚嫁，李奶奶是憔悴了，她的金首饰和皮衣服都变卖了，可是她毕竟熬过这几关，没有被旧社会的旧风俗所吓倒。三年满眼以后，李楫到县城报名投考，通过县考，再搭帮到崇川州应州考，总算十年寒窗毕竟换来一件襦衫。在喜报送到李家集的那一天，不但李奶奶是心花大放，连带亮斋三叔，还有二叔和四叔都很高兴，因为李家出了一个秀才，从此可以免去许多啰唆。襦衫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毕竟可以消灾降福，旧社会对于科举的向往，不是没有具体

理由的。

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年了，科举的寿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喘息。崇川州的一位翰林公经过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这几个大事故，他的眼界已经大开了，从一个保守派变成维新派，在崇川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李楫在崇川州考以后，由于他的灵活，认识到即使自己沿着科举这条路走下去，最多只能考个翰林，现在翰林公正在办师范学校呢，不如就近再在师范学校报考一下。录取以后，他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师范生。在这个学校里，他确实受到这位翰林公的赏识，尤其是一位地理教师对他非常器重，认为他的那一套“山之脉络、水之源流、府州厅县之位置”的学问，唯有李楫能够接班。其实这只是旧时代的沿革地理，派不到什么用场。可是，不管这些，李楫在学校里还是刻苦地攻读，成为该校有名的学生。

在这几年，家中也起了一些变化，二妞、三妞不久都出嫁了。三妞嫁给奉雒县东来庵一家农户，总算夫唱妇随，生活上过得去。可是二妞却苦了，嫁到海陵县羊圈镇的一家杂货店，虽然少年夫妇关系还好，可是上面有个凶狠的婆婆，旁边还有一个挑是弄非的大姑子。这位姑子已经近三十岁了，自己总感到有些痛苦，因此看到弟弟和弟妇，更引起她的仇视。羊圈镇在一条大堤上，单是一天堤上堤下的提水，把小脚伶仃的二妞累坏了，可是她还得伺候婆婆，伺候大姑子，因为娘家远，又知道她不是李奶奶亲生的女儿，朝打暮骂，折磨得她寻了短见。

消息到了李家集，李奶奶和三奶奶一商量，三奶奶说：“那还有什么犹豫的。我们大家去捣毁这个荒货摊子。”这一来，左邻右舍，男女老少，一共二十八部小车，一部车上就是三四个，连带推车的，约摸八九十人，一直赶到羊圈镇，几乎塞破了这家杂货店。

店里店外，连带内宅上下，都是李家集的人，把这爿杂货铺搞了个稀巴烂。老婆婆和她的大女儿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留得这个二女婿，到处磕头讨饶，一直待到李家集的人搞了个心满意足，才结队回去。李奶奶并不想这样干，可是不这样干，三妈不会说她是晚娘心吗！

小妞六岁那一年，由于李楫的坚持，她也上学了。那时没有新式的学校，只有私塾，居然在男生以外，收了三五个小女孩。李奶奶请老师给小妞提一个学名，老师说：“就叫素琴吧。”素琴仗着是个女孩，老师是不会打手心的，因此功课也就疲疲沓沓，到了下午太阳渐西的时候，孩子们便把左手的大拇指顶着右手的二拇指，然后再换过来，用右手的大拇指顶着左手的二拇指，不断交替，这个办法叫做“扯太阳”。果然真灵，经过几个女孩不断的牵扯，太阳下去了。师母总会进来牵着素琴的小手，送她出门，她就连蹦带跳地回到妈妈的怀抱。

那时缠足的风气还没有革除，李奶奶也有些不忍心，可是一位远房的叔祖父叫做熙午的有时来看到了，回去和老婆婆一谈，老婆婆说：“这样她妈不就害了她一世吗？让我去替她裹。”她自告奋勇地来了。李奶奶看到素琴眼圈红了，泪珠子正在挂着，也不忍心，可是对于封建社会的最野蛮的压力，她眼看要让步了，何况熙午婆婆是叔婆，自己拮据难支的时候，有时还得向熙午公公借些利债呢？幸亏这时候李楫在家，他和素琴轻轻地说：“小妞，不要怕，她第一次替你裹的时候，就让她裹，她不会就下辣手的。白天她来裹，晚上你自己放掉了。一裹一放，你不会吃什么苦，经过几天以后，她不会再来了。”这个方法真灵，熙午婆婆来了几次，看不到一些成绩，灰了心，

不再来了。素琴总算度过了一次难关。

不过那时社会上的压力还是大的。在素琴跟着妈妈到海陵奕家去的时候，她姨嫂子真是三寸金莲，小得可怜，可是主持家务，有条有理，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女人。她和素琴说：

“小妞，嫂子我真替你担心，这不是一个卖猫儿鱼的姑娘吗？”

“你瞎说，我会到姨妈那里告你的。”素琴给她一个灵巧的答复。

李楫在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济川已经办起高等小学了。由于翰林公的推荐，他回济川当了地理教员，这是一个过渡。不久以后，县城里建立了劝学所，当然由李楫担任所长了。当地人尊称他一声济成。李济成已经不是一个师范生而是地方上的行政人员了。

吴氏死了以后，李奶奶替他定下了县城里王家的大姑娘。济成担任所长，结了婚，不久就把李奶奶和素琴接到城里，赁房居住，好在她们在李家集本来也是赁的几间厢屋，现在进城，乐得宽大一些，又省得两地开支。

济川城里那时有一座高等小学，这是当地的学府，是不收女生的，初级小学多少也还有几个女生，不过群众的思想没有搞通，对于女孩子读书的要求也不高，进不了高等小学，那就再回到私塾。好在素琴已经放弃了盼望放学的思想，在私塾读书是高高兴兴的。可是她不高兴她那个学名，要哥哥替她改一个。

济成说：“那就叫做李槎，和我都是木旁。”

“可是，”素琴说，“哥哥，大伙不是喊你李楫而是喊你济成呀。”

“那么你上学的时候叫做李槎，平时和小朋友一道就叫方舟，好不好？”

从此以后，素琴这个学名丢了，学名李槎，小姑娘们相处的时候，都喊方舟。在那时候，这算是一名一字，不过妈妈有时还喊小妞，连哥哥有时也这样喊。

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打响了第一枪，这一次和义和团不同，全国都响应了。济川城有一位从上海都督府派去的杨什么，带了两个手榴弹进城，县老爷随即把县印交出，济川算是光复了。接下去便是整个淮南省的光复，升州城经过一两次硬仗，也光复了。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到了南京，成立了政府，算是民国元年，民国固然是民国了，可是老百姓照旧完粮纳税，只是把满清王朝送下台，换了一块招牌。

南京成立了政府以后，随即由程德全组织省政府。程都督向崇川的那位翰林公请教，翰林公推荐黄炎培主持教育厅。济成也就在这个时期，由济川县劝学所长调任教育厅省视学。省视学是教育厅的特派员，凡是省立的师范学校、中学校和各县的劝学所，都由四位视学分区督察。济成本来是一个很用功的师范生，可是现在一步一步地向旧社会的小官僚转化。为了生活上更舒适一些，把家眷王氏也带去了。

李奶奶还是乡下奶奶的脾气，她带同方舟留在济川。本来从他们自李家集搬到济川的时候起，这个家庭是完全由济成支持的，因此济成嫂掌握了家庭的大权。李奶奶是何等的精明，她看到这情况，虽然济成是由她拖带大的，可是儿大不由爷，何况自己只是一位双手拮据的继母。正因为她精明，她眼看着大权旁落，没有说过一声。婆媳间不是没有矛盾，但是矛盾没有激化，免去了旁人的风言风语。现在好了，济成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杏伯到南京去了，李奶奶和方舟仍在济川，由济成按月汇寄一些家用。

方舟在杨家私塾读书，这时好了，全部都是女孩子，功课交了，各人打

些毛线，或是做些针线。好在杨老师高明得很，他懂得女孩子和男孩子是不同的，要求不高，升学的道路既然断了，那么大家还是清闲一些为妙。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但是道路总是人闯出来的。不久地方上又办起女子高等小学，校长是一位宋宇清先生。这位宇清先生生得四个女儿，大女儿在上海学医，久已结婚了，二女儿是一位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他对于女孩子读书，倒是很热心的，现在担任了校长，校务便交给二女儿掌握。三女儿还小，正待升学，小女儿更小了，读着初级小学。教师呢，也不难。济川县宋家是一个有名的大族，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人丁却是不少的。他便约了他的远房弟弟、妹妹、弟媳妇都来，除了搭配个别的外姓以外，几乎把这座女子高等小学办成宋氏宗祠。好在族大人多，大家讲个硬正，学校还办得不太坏。

女子高小的招牌挂出了，方舟也报名投考。录取以后，分配班次，算是三年级，校长的女儿莹沅正和她同班。那时学校办在孔庙后面，离家还远，因此留在校里搭中伙，物价便宜，花费也不多。

在封建社会里，管你是不是升学，女孩子到十七八岁差不多都有婆家，二十岁左右结婚不算太早。方舟正在上学的当中，海陵大姨妈来信，要李奶奶去商量。她们打算把方舟许给海陵一个于家，那孩子正在读中学，家里有几百亩田，吃穿是不用愁的。李奶奶想这件事总得征求济成的同意，恰巧济成到家，谈到以后，济成问起，他家既有三四百亩田，是谁当家呢？

“当然是他的爸爸了，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济成红着脸说：“那我还得有个长亲，称他伯伯吗？”

在南京的时期，济成学到些官气了，他想不到还要到人家去当晚亲。这天下午他在宋野桥家里打牌，野桥是宇清的从堂兄弟，和济成常来往，有时还要来个八圈。这天济成手气不好，打牌总不成局。

“你今天手气是怎样搞的？牌打得这个样。”野桥说。

济成把这个意外的牢骚和他谈了一遍。济成说：“难道要我真的去当晚辈吗？”

野桥笑着说：“你不能和老太说已经替妹妹找到人家，正在说着吗？”

“那么人呢？我总不能和奶奶说一句空话。”

“慢点，你要怎样的一个人？”

“中学生只是一个学生，谁知道他读得怎么样？总得要一个有了工作的人。至于家道如何，那倒是第二成，我李济成还不是穷出身！”

“既然如此，”野桥说：“人倒是有一个，我的远房弟弟敦容，人品也还过得去，现在广南当中学教师，可是家里是穷得很，你看怎样？”

“穷倒不怕，我也不是富的。这位敦容我听到过，有些书生气，可是广南太远了，一年难得回家几天。”济成正在沉思着。

野桥说：“我的那位叔父去世多年了，免得你当晚辈，至于远不远，那还不是由你吗？当了这多年的省视学，还不能调动一位中学教师？”

济成回家，和李奶奶一考虑，李奶奶也觉得太穷，有些为难。济成说：“不管穷不穷，妹妹的生活，你老人家放心吧，都包在我身上。”

李奶奶看到济成不愿到人家做晚辈，当然她也明白不能勉强他，只要方舟的生活有保障。好在宋家住在济川城里，自己随时见到面，因此也就同意了。一二月之内，说媒订婚，一切都按规矩办事。宋敦容的父亲久已去世了，由大哥宜申作主；李家呢，他们想起亮斋还在，把他从李家集接进城。亮斋

对于这个小侄女，一向是喜爱的，看来这是她的终身大事，也赶进城，到鹰扬巷住下。

那时宋家住在舒家巷，和李家隔了一条巷子，来往本来便当。待到大媒把“恭求”帖子送过来的时候，亮斋正准备在“敬允”帖子上签名，李奶奶却说：“济成呐，来签一下。”把亮斋丢在一旁，气得两手直颤。二十多年的怨恨，李奶奶到这一天作了一个结束。

订婚的事，宜申在信上和敦容谈到过。敦容因为家里的事一向都由妈妈和大哥作主，只要他们认为合式，自己没有什么意见。方舟也没有意见，可是在学校里遇到些意外的为难，由于教师们大都是宋家的，有时这一位喊妹妹，那一位喊婶婶，连和自己要好的同学宋苕沅也赶着她叫婶婶。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少女常遇到的烦恼。

一九一八年秋季，方舟正在准备进修三年级的时候，济成自升州来信要她到升州去上学。那时学制比较散漫，当她把成绩单交给哥哥的当中，济成说：

“论程度，妹妹可以进女子师范了，凭我和吕碧诚校长的交情，进预科也不难。可是杏伯已到入学年龄，把他一个人送到小学，我也不放心。就这样吧，你且读预科，顺便照应一下杏伯。”这句话可把方舟愣住了。要坚持进师范吧，显然要和哥哥抬杠，而且能否进得去，还得依靠哥哥的面子，否则事情是办不通的。要陪着杏伯这孩子吧，自己赶到升州是为的什么？何况这个孩子是不好招架的。方舟看看哥哥，又看看王氏嫂嫂，经过一番察言观色的功夫，终于把这任务接下了。

秋季开学了，报名以后，方舟带着侄儿进校，好在那座女师附属小学是和师范预科并在一起的，可以好好地照应。当她把杏伯送到初小一年级的教室以后，自己刚刚踏进教室，杏伯已经哭着来了。教师吩咐她把这孩子送出，可是越是送他，他奔跑得越着急，哭得越厉害。经过两次以后，教师发脾气了，叫她把孩子送回去。时间已经很迟了，方舟只好雇辆人力车，抱着杏伯回去。一到家，王氏嫂嫂的脾气发作了，要方舟还把孩子带回小学。就这样一天、两天不断的反复，方舟的一点可怜的零用钱用光了，杏伯和她自己都没有读到书。王氏嫂嫂一边打着孩子，一边还得该该拮拮地说着：“好一个不上进的孩子，耽误了人家女状元呢！”

方舟本来不是很结实的，经过半个月的烦恼，人也瘦了，接连吐两口血。这个消息传到济川，李奶奶来信，要她离开升州，立即回到济川城里。那边宋家也透过信来，明年寒假要结婚了。这就迫得方舟放弃求学，准备嫁妆。在那个封建时代，嫁妆是一件大事，李奶奶和济成商量，她说着，就托出竹筒粗的两卷当票交给济成，指明单凭这些，她尽可以给女儿准备婚事，用不着济成化钱。这些当票全是李奶奶在支持家务中化费的，论票面，久已过期，东西是赎不回来了。济成完全明白，不但父亲身后，就是父亲生前，家庭的生活，很多亏着这位继母的自我牺牲。他一口气承认下来，说是方舟的妆奁，完全由他担负。他知道不久以后南京教育厅要派自己参加美国教育考察团，这一份妆奁，可以在那里打主意。前面不是说过吗，中华民国只是一块招牌，其实和满清的腐朽王朝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尽管济成到出国前夕，才向方舟学会了二十六个字母，但是出国的任务，还是落到头上。出国后第二年他带回了若干的金表，若干的西式用具，也带回了几大箱美国人办学的宣传品，留在济川喂蠹鱼。

方舟学刺绣是在一个孙寡妇家里。这位寡妇人缘是好的，又有一个能画的兄弟，因此常常有一些新图样。后来方舟的绣件，还曾送到南京展览，作为济川女子高等小学的成绩。在这里她也有好几位同学，都是为准备嫁妆来的。方舟中年以后经办缝纫社，在这时已经留下一条根子。

李奶奶正在家里忙着呢。她要找木工打一套大柜子、小橱、梳妆台、四仙桌。一句话，新房里的家具，除了大床以外，都由她一手承办。她请了裁缝工人做寒夏的衣服，还请了棉花店的工人弹棉花。

一天，方舟正在家里，弹棉花的工人问起：“姑娘，这是谁的嫁妆？”

“是我表姊的，”方舟故意说：“姑妈看来忙得很呢。”

“你这位姑妈，”工人说，“也太任性了。听说这里和舒家巷宋家结了亲，那家就住在我们隔壁，穷得只有几间房架子，这么多东西，送去了还不知道放得下放不下呢？”

方舟不免有些纳闷，究竟宋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自己又不便向妈妈和哥哥追问。怎么穷到这个地步？至于敦容，这个名字听得很熟，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自己一些也不知道。苕沅曾把敦容送给宇清校长的照片指给自己看，可是真不好意思看下去，只有扔给苕沅。她什么都不清楚。

结婚以后

一九一九年的冬季开始了，婚期决定在这年寒假中，实际上是一九二〇年一月了。这年秋天，由于济成的协助，敦容已经调到崇川师范。因为婚期决定在这年寒假之初，所以学期一经结束，他就回家了。那年冬雪特别大，漫天漫地都是白皑皑的。轮船到码头的时候已经很迟。怎样走法呢？他和客栈里一谈，天明后买了一双箬子草鞋，套在鞋上，开始十八里的步行。晌午的时候，居然到家。那时两家都唯恐他来不及时到家，耽误婚期，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下午，一抬抬的嫁妆送得来。好在这年秋天，宋家新盖了三间屋子，新娘的妆奁虽然塞满了一房，还不至于没有安顿之处。

两天以后，便是婚期，双方同意新娘在上午过来，下午即行回门，两件事并在一天办。方舟从这一天起，便要和一个从未见面的青年度过一生，这一天她心中的忐忑，是可以想象的。经过几番的爆竹和锣鼓的喧嚷，她坐着一顶花轿到了。进门以后，由敦容向着轿子作了三个揖，她下轿，再由伴娘送到新房，新郎新娘同照合欢镜，然后吃煮好的枣子和莲子。一切顺利进行，再由伴娘引出，随同敦容向婆婆磕头，向道喜的长辈磕头，再向哥哥嫂嫂敬礼，向一班的亲友敬礼，然后回房。新婚夫妇用饭完毕，下午两顶轿子再把他们送到李家，向李奶奶磕头，向道喜的长辈磕头。因为济成已经出国考察，只向嫂嫂敬礼，向一班的亲友敬礼。傍晚的时候，二人乘轿仍回宋家。晚饭的酒席开始，来人虽不算多，也就够热闹的了。接下便是闹新房了，由于来客之中，长辈居多，就是同辈，年龄都到了中年出外，晚辈是谈不上闹的，因此问题并不多。可是一天的跋涉和拜跪，敦容和方舟已经很累了。

从这一天起，他们都感到新的生活已经开始。问题也就一天一天提出了。敦容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对他，一向因为他是幼子，所以是比较体贴的，但是要求却很严格。敦容在母亲面前是不敢违拗的。哥哥呢，比敦容长了将近二十岁，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哥哥是封建社会的，始终不肯从那个社会的世界观退却一步；敦容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尽管并不富裕，却抱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何把这两个世界观的主要矛盾解决，方舟是不敢想的，但是却想回避矛盾。

其次，对于敦容的为人，方舟是不很理解的。那时的风俗，是在新婚的一个月内，出进都得坐轿的，但是结婚以后的第三天，敦容认为坐轿的把自己搁在别人肩上前进，实在是对于人的侮辱，因此建议步行。说实在的，两家只隔着一条巷子，没有坐轿的必要，方舟同意了，但是很不理解。在进进出出的当中，方舟看到门上写的对联，是敦容自己写的，迎门是：

三万六千日 东西南北人

二道门是：

旁人错比扬雄宅 日暮聊为梁甫吟

房门是：

见子真颜色 与君共 糜

这都很别致，和一般人家的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方舟也是很理解。她总觉得敦容有些与众不同。

他们的结合，本来完全是“母亲之命，媒的之言”。恋爱是从结婚开始的。方舟看到敦容对于自己是爱的，但是这爱也和一般小说书上所谈的恋爱有所不同。无疑的，尽管她对于敦容的过去很不熟悉，但是看出他的爱是初

恋，是没有任何其他女性所占领过的恋，但是也觉得他的恋和一般的有所不同。他对于女性的恋，好像是看到法书名画、秦砖晋帖，是一种人对于物的恋，但是对于女性的特点，女性的要求和爱好，完全不能体贴。当然，这是由于他对于女人，以前没有接触过，不要说没有什么浪漫故事，就连姊妹也没有，因此他不能理解。他们夫妇的关系是正常的，但是方舟总认为敦容不能理解自己。

寒假时间一霎就过去了。敦容到崇川去开课，同时按照和方舟原订的计划，到崇川找房子。由于同事的帮助，他找到了丁鼓角周家的一间屋，随即回济川把方舟接过来。周家也有些特别，房东是一个疯子，家务当然由女主人管了。房东是经常不出来的，偶尔出来，那就得看你的机会。方舟是很少见到的，有一次他偶然出来了，嘻嘻地笑了一阵，就到里屋去了。在大门的侧面，有两间小屋，看到三位老人，一位年龄最大的七八十岁了，其余都已经六十开外，据说都是周家的仆人，老了，不能干什么事，由于他们没有成家，就在这里呆着。有时不免受到女主人的呵斥，不是骂一声“老奴”，就是数一句“老东西”。敦容夫妇还不曾熟悉这样家庭，到这里才开了眼界。那时的学校任务不重，因此敦容、方舟常到五公园去闲逛。五个公园都很小，可是联在一处，却是不小了。绕城是一圈长壕，深虽不深，阔却有八九丈，五个公园占了长濠的一角，因此确有一些气派。

方舟在升州的时候停学了，但是结婚以后，复学的希望还在不断地吸引她，有时也和敦容谈起。说也奇怪，敦容虽然是教师，但是总认为学校里学不到东西，不如在家里自学。学校最多只能给你一张毕业证书，凭着证书，你可以到社会做一些领工资的工作，现在既然敦容的工资尽可敷用了，那么复学有什么意义呢？这当然是他的一偏之见，但是当时学校的成就大体是和他的话符合的。

新婚的甜蜜就是这样度过的。夏天以后，他们又回济川，房子也交出了。可是秋天开学，他们觉得还是到崇川好，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崇川比较安静些。到崇川当然要重找房子，结果后来仍然是到周家。原来在他们交出房子以后，有一家搬进，被疯主人看到，发了一顿脾气，说是你们为什么要住到我亲戚的屋里，连忙把他们赶走。当然，谁也没想到要和疯子吵架，所以他们自动搬出，仍把房子留给方舟。

这一年，济成从美国回来了。他不是到美国去考察教育吗？可是他的二十六字母究竟派不上什么用处。当然，南京教育厅早已和中国驻美公使——那时的军阀为了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在帝国主义的国家里都设有比大使低一级的公使——联系了。公使馆的一位什么参赞，再和美国人一联系。送上门的生意好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考察团的先生们带到四十八州去兜了一个圈子，然后再送他们回国。济成到崇川以后，顿时成为要人，各个学校都要请他去讲他的收获。敦容到旅馆去看他，济成显得非常高兴，经过一番寒暄以后，济成谈到各校请他讲演的事，和敦容说：

“讲演倒是件好事，太平洋的风光，四十八州的景象，摩天大楼，黄石公园都不难，可是真真落到教学方面就不简单了。美国有一种流行的教学方法，叫做巴尔札特，你看怎么讲呢！”

敦容虽然在师范学校当老师，对于这个新鲜的东西，没有经历过。他追问道，“究竟是个什么方法？”

济成一个一个音地说：“巴——尔——札——特。你是学外文的，总该

可以知道个大概。”

说老实话，没有看到文字，单凭这几个汉化了音调，敦容实在没有一个数，一时答不上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一九一一年以后，在中国派了大用场。那时把美国的一套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在社会上很吃得开。南京高等师范的教育系，在青年中的吸引力特别强大，所探讨的都是这一套。济成总算把这个巴尔札特，说得差不多，已经很难为他了。从美国回来后，教育厅给了三千元，济川劝学所送了四百元，作为旅行的津贴。济成藉此盖了一所不太差的宅子，这是这次美国教育考察团的收获。敦容想起满清王朝末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大致也是这回事，究竟也没有挽救满清王朝的命运。

一九二一年的暑假又到了，方舟怀了孕，决定秋后不再出来，在济川生产，靠着老家，究竟有个照应。她索性唤了一条木船，把崇川住房的坛坛罐罐从内河沿着奉雒县、海陵县搬回去。在船上她和敦容一路谈谈，倒也不甚寂寞。几天以后到海陵县，已经天黑了，敦容上岸，只看到一座高桥，也就下船了。第二天的上午，船开到十里铺，这是栾家的所在，方舟要上岸看姨妈，被姨妈留下来，索性把木船打发了，准备在十里铺住三五天。大姨妈是一个谦和的人，可是那位姨嫂子，看来是有些精明过分。姨丈气魄大，说话也响亮，地主阶级的气派确实与众不同，可惜这时稻子还在田里，没有看到那些剥削的情景。后来土地改革的时期，大姨妈已经死了，听说姨丈和姨嫂子都得到应有的惩处，偏偏姨兄倒是逍遥自在，当地贫下中农认为他不当家，因此把他免了。可见土地改革的进行，对于地主家庭的成员，确实是区别对待的。

由海陵回到济川以后，为了缓和一下兄弟间存在着的世界观的矛盾，方舟主张搬到鹰扬巷去住，那时济成的新宅子已经完成，他们久已搬出，原住的房屋虽然还是空着，房主却另拨了几间房子给方舟住下来。

一九二一年的冬初，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取名天民。孩子一般都是逗人喜爱的，何况这是他们的头生子。一九二三年秋后，方舟生了第二个男孩，依着哥哥的排行，取名天中。天民慢慢地大了，看来个性比较坚强，有些不屈不挠的意味。天中却比较软弱。方舟和敦容共同计算，一个中学教师的工资，除了敦容在崇川的用度以外，带到济川，一边要供给母亲和失业的大哥，一边要供给方舟和孩子的家用，最多只能供给一个孩子升学，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民身上，对于天中的要求便不是那么严格。

三年以后，第三个孩子来了，这是一个女的，取名文清。因为房东要收回房子，方舟们便搬到隆盛巷的一家。这位房东，是一爿当铺的店员。那时当铺是淮南的最大的营业，占的地面大，而且都有自备的武器，用现代的说法，他们是武装的高利贷者，在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是有强大力量的。这位店员，实际上是一个高利贷者进行剥削的工具。方舟们搬去以后，总算敷衍得法，没有发生什么摩擦。

次年的春初，敦容在家度过寒假以后，依然回到崇川。不久，惊人的消息来了。济川商会打电报给崇川告急：说是联军三万过境，县内罗掘俱空，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请求支援。这时国共合作，大军北伐，打下了湖南、湖北以后，再向江西进军，前锋直逼江南。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下，在江西还挣扎了一下，再后经过江南，更向淮南溃退。白宝山、郑俊彦、宋福田三部在宜兴吃了败仗以后，被大军撵过常州，眼看不能回到南京和孙传芳集合

了，就退到小河、阴沙，正是敌军在前，大江在后，造成了背水阵的局势。据说白宝山出了气力，打了一次小胜仗以后，再行封船，三万多人就这样一船一船地渡江。这就是济川的败军了。到了济川不久，白宝山、郑俊彦又走了，就剩了宋福田一支军队，号称一万多，实际上不足三团，可是济川城却给他们搅得个天翻地覆。大街上的店铺全部关门，居户也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平时这一家和那一家可能不相往来，这时都在偏僻的角落里挖墙开洞，准备逃窜。大家入夜不敢睡觉，只要听到一些不妥的声音，就立即设法逃命。这样紧张的生活，方舟支持不下去了，但是那时邮电不通，无法通知敦容。

敦容听到济川告急的消息，立即准备回家，轮船已经停航了，就决定步行回家。第二天一早，背着一个小包裹从崇川出发，一路有车搭车，没车步行，向晚的时候到达石庄。为了第二天可以早到一些，仍然继续前进，到东来庵一家铺子里歇脚。次日再向西行，到了李家集。这时方舟的大姊正住在这里，她的大姊夫叫宋伯纯。敦容看到伯纯，问起济川情况，他也不清楚，但是推测火烧济川是谣言，还不至如此吧。他留敦容吃过早饭，送了一包点心，雇车进城。车子把敦容送到五里墩，这里去城已不远了，因为怕拉夫，车上人和敦容道别。从这里到城，一条笔直的大道，平时往来的人，真是肩摩毂击，可是这一天却完全不同了，四周空荡荡的。敦容一路步行，只看到一位老婆婆，手上还拄着一根铁棍。敦容一直向前，近城时，看到城上几面大旗，欢迎这位那位军长，城门口站着宋福田部下的兵士。他们的制服和一般的北洋军阀的兵士差不多，帽子却很特别，像是半截五升米的口袋，上边扣春一个拳头大的布球，他们要查包袱，当然请查。查过以后，他们问纸包里是什么，敦容请他们尝尝李家集的点心。也许他们平时认为人和人的关系，是永远站在火线上的，所以看到敦容的坦率，倒反而出其不意，黄瘦的脸上，露出一丝丝的笑意。进城以后，还是一路的红旗，“欢迎，欢迎”，但是却看不到一般的居民。只有无数的兵士，骑着马，背着枪，也有步行的。此外只有卖烧烤肉的摊子，十步一处，二十步一处，把一条东门大街变成兵士们的临时食堂。

敦容这位步行一百多里的旅客，居然到家了，想着前门是好歹打不开的，绕了路去打后门。打着打着，一边还不断地报着自己的名字。好久以后，才听出搬家具，拖杂物，拉门闩的声音。敦容进门以后看到，原来大门和后门都堵塞了。一家差不多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围子里。济川城里差不多就有几千个小围子，大家都堵塞在小围子里，把一切的街道、公署、祠宇、学校都交给兵士们，还让无数的红旗挂在大街小巷去欢迎他们，但是人们轻易不和兵士见面。这样济川城里就有两种国度：兵士的国度和居民的国度。这两种国度里，一边是马蹄声，枪声、刀声、辱骂声、打架声，一切都有；一边是静寂寂的听不到人说话，好像是死去了一样。就是兵士的国度里，万分嘈杂之中，也只是一股杀气，什么生气都没有。整个的济川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里，直沉到坟墓里去。

到家以后，敦容看到妻，看到孩子们，但是一时想不出脱险的方法。方舟显然是病了，黄澄澄的面色流露着无穷尽的忧愁焦虑和烦闷。不时的呕吐，已经够使她精神异常了，何况加上这围城的威胁。敦容这次的归来，显然是她没有预想到的，因为中间已经多时失去了联系，但也不是完全出于意外，因为她明白，要是敦容知道家乡危急的消息，他一定会回来的。总之，敦容的归来，好像给了她一重保障，但是敦容有什么力量保障她呢？尤其是在这

种情况之下。

外边的情形是一天天地坏下去了。军阀的兵士们本来是一班穷朋友，全无出路以后才披上老虎皮。再加这一次宋福田的队伍，从江西跑安徽，从安徽跑江南，再从江南跑淮南，一路上受着革命军的威胁，他们气都透不上来，遑遑如丧家之犬。可是他们发的财，却真不小，有的把成串的金戒指当作腰带，有的手臂上套着好几副金手镯，有的把龙洋成排地钉在贴肉的背心上，有的钞票多得没法数，就只知道有几个卷儿。他们受了伤怕进医院，惟恐医生会把手臂割去，连带金镯也不得回来。他们中间的娱乐，自然是牌九喽。“朋友，你的庄，我押两卷票子！”就是这样地把日子闹过去，不一定要到外边，他们自己伙伴里也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争执。有时人们遥遥地听得他们中间嘭嘭的两下，就想到也许兵士们自相残杀了。里面如此，外面更可想而知。这样杀、杀、杀，就造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

敦容到家以后，方舟算是可以睡了。她衣不解带地躺在铺上，在多少天目不交睫之后，这是一种休息。可是连这样的休息，也不能保证。一个夜晚，在远远的枪声一响以后，屋上跳下一个人来。仔细一看，还好，原来是借住隔壁的帮审员，他在听到枪声以后，来不及从墙洞里进出，索性从屋上下来了。这是一位江西人，到济川做这项司法官的工作的。他谈锋很健，滔滔汨汨地谈了不少家乡的故事。连这样的官儿也落得个跳屋逃命的结果，地方上的秩序就可想而知了。

从一个旧秩序转向一个新秩序的时候，总要经过一番动乱。这一批北洋军阀的尾巴，套着半截布袋的朋友们把济川搅得天翻地覆，济川的人民也自动地组织起来，他们成立了自卫队，一团一团地建立起来。尽管人数不足，却号称一百几十团。在城外的便割电线，拆桥梁；在城内的则在角落里刻蜡纸、散传单。宋福田所以不敢出城，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怎么办呢？宋福田自己有数，总共只有三千多人，尽管向商会要给养时号称一万四千，其实都是些空额，连带一些伤亡。人民起来以后，那怎么办呢？从济川到白桥，从白桥到羊圈镇、江垛，是他的后方，现在后方的桥梁都不保稳，而革命军的前哨已经到达驢渚，倘使他们来一个急行军，向东北角斜插过去，自己还能呆得下去吗？他下令向羊圈镇撤退。

这一个消息传出以后，济川城里来一个大变化，几千个围子都打开了。老大爷、老奶奶，大婶、大叔，连带小弟弟、小妹妹，二十多天没有露面的人都出来了。

“怎么？宋福田已经退出了吗？多快呀！”

“咳，那还要说！年青人都到石桥、李家镇去欢迎革命军了。”

“真的？”

“现在还有空和你空口说白话，你看不到大伙大伙地都向南门城门口直钻吗？”

那一天下午，敦容也赶到李家镇，看看天已经黑下了，便同曹占奎、尚建栋等歇在一个姓张的朋友家。他们估计形势，认为孙传芳这一支十几万人的大军，可能还要反扑，那时还要准备应付这一个动荡的局面。第二天他们再向南前进，不久便迎上从驢渚开来的革命军。

果然，一营精悍的军队从驢渚开来了。带头的是一位夏营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进城以后，仿佛得着情报，随即指挥军队开出东门，一边出人意外地把城里挂出来的欢迎北伐大军的纸旗和标语，顺手地都毁掉。革命军人

到东门外三五里的地方，选择有利的地形，隐蔽下来。向晚，乡里的老百姓送去煎饼，稀粥，也有人送去棉被，让这些英勇的战士不致受到饥寒的袭击。城里的人打着灯笼到城头去瞭望，东门城楼是灯笼集中的地方，向西北延伸到北门，向西南延伸到南门、小西门，仿佛是一条火龙，护着济川城内的万家灯火。

敦容感觉到很累了，抱着灯笼慢慢下来。这一晚，他这一家和同宅的人家都得到安息。

天明以后，他出来一看，情形完全变了，据说夏营长带同部下仍回骥渚去了。在他临去的时候，多少人在那里挽留，在那里哀求，但是夏营长说这是命令，自己是不能作主的。原来他得到消息，宋福田部下正在准备卷土重来，不值得为死保一个空城，给敌人以一个可乘之机。事实上，要是宋部的战术更高明一些，只要向李家集斜切过去，夏营长部下的命运不是最保险的。

济川城几乎是一个空城了，不但几千个围子重新树立起来，连围子里的人也不多了。敦容从东门走到西门，再从南门走到北门，找不到一个办法。所幸傍晚的时候，不少人又从城外回来了。入夜以后，城头上依然是一条火龙，虽然还在那里蜷缩着，保卫着城里的居民，但是它的威势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济川的商会这时无形地成为领导机关，它是县政府，也是居民委员会，探听消息的都钻到这里来。今天来一个副官，说是革命军第几军要来了；明天又来一个副官，说是另外一个军要来了，这时已是四月初了。敦容听说海陵已经光复了，张中立的省警成立了一个独立师。他和方舟一谈，方舟说：

“我们还是走吧，让奶奶把天中带到海陵，奶妈把文清带到乡下，我们带同天民到柴墟希之舅舅家里去，你看怎样？”

说实话，敦容在许多问题上，是接受方舟的领导的，何况早一天，自己的好朋友、表兄张仁溥还曾经劝过要早一些离城呢？事情既经决定，就由李奶奶把天中带到海陵姨奶奶家里去，奶妈也把文清带走了。这两个孩子都小呢，他们什么也不懂，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四月五日一早起来，按照老规矩，在家里祭过祖，方舟、敦容带着天民就到柴墟去。这一次投奔的是希之舅舅，李奶奶的堂弟，在柴墟镇上颇有一些声望。从济川到柴墟，只有四十里，一路叽叽咕咕，小车子在太阳偏西的时候就到了。

希之舅舅接待很热情，但是神气上却有些恍惚。敦容由于半夜没有睡，路上又累，实在想好好休息一下，可是由于希之舅舅的热情，不得不打起精神应付这位长亲。天黑了，开夜饭，希之舅舅出去一打听，回来就说：“赶快吃罢，吃完还得上船。”事情是这样地突然，原来是海陵消息不稳定，还得早些上船，准备出江，出江到哪里去，敦容不明白，方舟也不很明白，好在希之舅舅是清楚的。他准备自己留在镇上，由舅母带领方舟、敦容去。

上船以后，不过一两小时，船还没有解缆，岸上喊着：“不要紧，今天不要开船。”方舟、敦容带着孩子，提着一个小包裹，跟着希之舅母重行上岸。

这一晚是不会睡得好的。天还没有亮，只听得外边叫嚷。出门一看，原来是海陵张中立的独立师，满装了几大船，由港河开下来。他们是起义了，但是孙传芳一反攻，海陵沦陷了。也就是五日的下午，宋福田的军队从北门、东门、南门猛扑过来，济川也陷落了。所幸敦容、方舟夫妇早走了半天，没有受到宋部进城时的糟踏。

情况已经很清楚，虽然海陵退却的军队在柴墟还能维持相当的秩序，但是这时人心惶惶，谁也不愿意多耽搁了。

希之还是决定让舅母带同方舟等上船出江。他们打算开到三鸾，据说那里的社家，和季家是亲戚，总可以暂时安顿下来。三鸾是一个新涨的沙滩，在柴墟的西北。可是那天是大西北风，无论船家怎样的出力，船开下去，只能在江边的芦滩上靠着，芦柴虽然还没有成长，可是这里已经离镇三五里，比镇上总安静些。

吃过带来的干粮，下午船又开了，西北风还是大，累得梢公汗流侠背，可是无论怎样的努力，船是断然开不出去。天又黑下来了，船上人开口道：“今天三鸾是去不成了。上岸就是葫芦洲，客家们上岸找亲戚过夜吧。”

船上客家本来有三五十人，现在大家上岸了。敦容对于情况不熟悉，只有靠着方舟，方舟也不清楚。问问舅母，舅母也茫然。没有办法，他们准备在船上过夜了。霎时间，岸上三五个灯笼来到面前，问起：“希之奶奶在船上吗？”希之舅母接着说：“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葫芦洲陈家的。舅奶奶那里一共有几个人？”

“有四个。”希之舅母说。

“那么就请一齐上岸吧。”

敦容抱着天民，方舟扶着舅母，和船家道别后就上岸了。幸亏灯笼火把照亮了道路，他们就一迳到陈家去。这是一家农户的大家庭。老兄弟三个，三老老、五老老，中间缺了一位四老老。四老老死了，寡妇原是柴墟季家的，和方舟的母亲是远房姊妹。这时这人家由三老老的儿子钧寿当家。乡里人最厚道，听说远亲到了，大家都出来款待。四奶奶更是热情，一边招呼希之奶奶，一边指着方舟、敦容道：

“这想必是二姨奶奶的姑娘和女婿了。好得很，还有一个孩子，也活泼得惹人喜欢。”又问方舟道：“几个孩子了？”

“姨妈，”方舟说，“一共三个了。这是大的，第二个跟着妈妈到大姨妈家去，小的是个女的，跟着妈妈下乡了。”

“说是海陵也不太平呢。不过二姨奶奶办法多，不会吃苦。今天这一阵西北风把你们送来，不然的话，真是难得见面的。”

钧寿真是好脾气，目下田里活又闲着，时常陪着敦容到田间去闲逛。他指出葫芦洲是一块新涨的沙滩，靠岸只有三张桥，只要把桥一拆，就不容过来，管他什么宋福田，他是来不了的。

钧寿还有一个远房叔叔，按照老排行，大家称他十老老。一天钧寿对敦容说：“横竖你也没有事，去看看十老老，喝一杯翠儿茶去。”

敦容随着钧寿，穿过一丘梨树田——这里人家爱种梨树，秋天梨子上市，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才到得十老老家。十老老大约是他这一辈中年龄最幼的，因此显得还没到中年，不过乡间总不免风风雨雨的，面色有些发暗。他的谈锋很健，谈到他和城里李挹香认识，就是那位教刺绣的孙寡妇的弟弟，能画些什么的。四面一兜拢，大家都有些亲戚关系。敦容这一首诗：

江边一迳是梨花，花底深深处士家；
莫怪朝来频叩户，呼君共试翠儿茶。

就是为这位十老老陈丽生写的。

在城里谈到吃河豚，总像有些神秘的，这里就不同了。上网的河豚，到手就下锅，吃了也没有多大的反应。据说吃河豚最好在清明前，过了清明，

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不久以后，方舟的妈妈李奶奶也从海陵赶来了，她谈起在海陵十里铺果然遇到军队，双方接仗，所幸只是小接触，老百姓躲在沟里，没有伤人。

当方舟一家在葫芦洲的当中，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叛变开始了。一九二六年的北伐，主要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合作而成功的。他们打倒了吴佩孚，打倒了孙传芳，占领了武汉、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和长江以南的土地，民主革命的事业很快就要成功了。但是蒋介石和英美帝国主义者，通过上海某些资本家的勾结，捞取政治资本，终于在四月十二日叛变革命，夺取了革命的果实，在南京成立了政府。这一次震动世界的大事，由于那时长江航运的封锁，一时还没有透到淮南来，更谈不上葫芦洲这个世外桃源了。

宋福田再一次开进济川以后，比以前灵活多了，他知道部队的生存全靠给养，而给养的来源出于地方的支持，要是仍然一味地压榨，事情是办不通的。因此他找了当地的两位地主出来担任县长和商会会长。这两位之中，一个是在河北当过县长的，又是陆军学校出身，可算得文武双方都有些联系；还有一个是老绅士，对于应付各方面，有一套老经验。他们要求把秩序稳定下来，倘使继续这样闹闹嚷嚷的，他们无法办事，只有敬谢不敏了。宋福田听他们的话，估量一下，接受这个提示，地方秩序，反而意外地安定下来。

消息到了葫芦洲，敦容心里活动了，和方舟谈谈，都觉得到底不能老住在陈家，还是设法回济川；但是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岂不是自投罗网？这才决走不急于进城，先在城附近的小村庄上住一下，待到十分稳定再回家。连同李奶奶在内，方舟夫妇还有两个孩子，先到柴墟镇。和陈家道别以后，在镇上又和希之舅舅道别，希之舅母先已回到柴墟镇，这时也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车子一直送到房家庄，这里离城三五里，恰好是一个落脚之地。没有亲戚，他们住的是农户的一间厢屋，虽然不远就是猪圈，倒也不很觉得肮脏。第二天敦容进城，城门口没有什么留难，比上次由李家集回家时大不相同。他一直到舒家巷，看到母亲，看到哥嫂，幸好没有什么损失。母亲曾住到城外三里庙金家，不久前才回来。

虽然宋福田的军队还在，城里已经有了一些生气，店铺三三五五的也开了门，街上的马蹄声、刀声、枪声不多了。张仁溥和尚建栋、曹占奎这些朋友也在城。军队常时在要给养，不过县里为了讨好军队和老百姓，总是拣几个土财主打主意，小市民在那里照常过活。

到了四月底，方舟等一家都回宅了，房东奶奶也在家，没有什么损失。李奶奶在方舟那里住了几天，看到奶妈和文清也来了，自己爱个清闲，仍回李家。这次总算大家渡过一次难关。不久便是宋福田退却，大约是有上级的命令。宋部一退，大家松了长长的一口气。崇川师范那边久已复课了，敦容看到轮船已通，仍乘了轮船到崇川去，暂时稳定下来。

在学校，还是照例的教学，一切仍然和旧时一样。这是说，尽管这时革命军已经进入淮南，但是这时的所谓革命军已经是四月十二日以后的“革命军”，实际上和孙传芳的北洋军队，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中间不是和平共处，没有斗争的。孙部由淮南向淮北退却，在山东的边境上暂时驻扎下来，整理内部，准备着卷土重来。

江南的形势暂时稳定了，地方当局为了收买人心，把一些教育界的人物

拉过去，松江的张师竹去了，上海的沈叔逵也去了。六月后，在得到学校的同意下，敦容也去看一下。他胡里胡涂地去了，但是一到升州便看到形势和旧时候没有什么不同。还是有那么一些人逛戏园，玩妓女，甚至抽鸦片的也来了，说是“工作”。“工作”以后，他们再跑衙门，打听哪一个县份空出来了，便削尖头皮朝里面钻。这是《官场现形记》的翻版，没有什么一丝一毫的革命气息。恰好得空，敦容抽便回济川二趟，和方舟谈起，他们意见统一了，找一个机会脱离升州。

这时已去秋季开学不远了，崇川师范负责人想约敦容回去，就是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托了教师贺篋庵询问方舟。方舟和他们谈起，一边打电报约敦容回校。真是太好了，就像大赦一样，敦容随即绕道上海回到崇川，重行担任起教书的工作。他很明白自己不是那个时代做官的料子，还是学校里的空气比较合适些。

十月初，方舟添了一个女孩，这时才搞清楚春天里她呕吐头昏的现象，原来是怀孕了。他们把这个孩子取名文简。因为孩子比较灵巧，更能引起父母的溺爱。这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了个孩子了，两男两女，负担重了，所以方舟决定自己带。家累是一天一天的重了，也带来了不小的思想负担。

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挡的。“四·一二”虽然带来一些意外的挫折，但是在青年的思想意识中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真正“如种出土”，这是时代的呼声。

崇川师范的学生中，固然有一些是颓废的，但是多数是向上的，能前进的。虽然没有很好的领导，出现了某种盲动的现象，他们还是愿意革命的。他们办夜校，把夜校作为基地，吸收群众参加。有的则到乡间去搞群众运动，对地主进行打击。

篋庵、敦容，还有当时的校长冯心斋，对于这些学生是优容的，但是总希望他们不扰及学校的安全。他们自信不是革命的绊脚石，但是又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不敢面向实际的。要革命首先就要造舆论，学校正是这些先进分子的宣传阵地。崇川师范不稳的空气已经透出去了，地方军警要来查。好在这个学校在地方上还是有一定的声望，军警也不能过于造次。在他们来查的当中，一边由冯心斋和他们打招呼，一边先由教师们一排一排地把教室和宿舍检查了一下，把一些碍眼的宣传品隐蔽起来，所以军警的搜查，往往是扑一个空。及至他们去了以后，宣传品又出现了，革命的要求是如此的。无论校长和教师们怎样地设法为学生打掩护，革命决不会因为一次搜查的扑空而停止的。

寒假到了，敦容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这一次回家，他把什么东西都带回去，准备从此不再来了。他不愿日后看到青年们受到打击，知难而退，自己无力为他们的安全而操心。到家以后，和方舟盘算，想开一爿小杂货店，地方上人称为夫妻店，就这样地度日了。他在家写信给心斋，请他另请高明，说自己不准备再去了。心斋立即去信白桥，要贺篋庵约同敦容回校。本来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友谊，何况敦容在崇川已经十年了，一下也不容易摆脱，但是一九二九年春间回校时，他只带了一只手提箱，把必不可少的衣服和书籍带去。到校以后，说清楚自己决心离校，请心斋早些另觅替人。

敦容这样的决绝，很使心斋感到不安，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到工作棘手，只有过一天是一天的了。在崇川师范，教师们对于学生的安全都感到一种严重的责任，他们感觉到要给学生以一定的保证，但是没有胆量给学生以应有

的领导。学生要革命，教师不敢领导他们，但也觉得不应当阻拦他们。那么、出了事故以后，由谁负责呢？这是心斋、箕庵、敦容还有其余的教师共同的感觉，因此，大家都有一走了事的想法。

四月的一个下午，箕庵拿着一封电报给敦容，他说：“电报是昨天来的，心斋和我商量后，都觉得自己也不会老呆在这里，你看看还是自己作主吧。”

电报是从华中大学打来的，发电人田伯通，是敦容在上海高等小学的同学，他们虽然是总角之交，但是久已不通信了，他不知道敦容的通信地址，还是问过陈长庚才打听来的。在小学里，长庚、伯通和敦容是比较亲近的，长庚年龄稍为大一些，对于伯通、敦容照顾多一些。他家住上海，在江海关任事，这次消息是由他传递的。内容是华中大学缺一位教师，要敦容去接手。在平时，敦容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他总觉得大学教师应当是一种特别的人材，自己不配，现在走投无路，也只能暂时借那里作一个脱身之计。

是四月的下旬，敦容去武汉了。也就在这一个夏天，箕庵离开崇川到江南南菁中学教书；心斋本来是学工的，到上海一家建筑公司当了绘图员，总算是各得其所。崇川师范自然有人接手办理，没有出什么事故。事前他们三人是过虑了。

敦容到武汉去的九年

敦容到武汉去，实际上只是离开崇川的一条出路。由于他在崇川久了，觉得自己对于学校负有一定的责任，既然自己完成不了责任，所以准备离开。他准备在失业后，自己搞一个小店，勉强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目前既然有过一条路，所以只有去试一下。

从方舟看，自己的担子更重了。当敦容在崇川的时候，来往隔天就到，学期中间总要抽空回家一次，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不是曾步行回家，共同支持吗？到武汉就不同了。来一回就得三天，开课期间更谈不上回来。一家的担子，自己不挑谁挑？她只有横着一条心，由敦容去闯。

华中大学才办了一两年，预科和一年级的公共课教师，就换去了五六个。学生不是对这个不满意，就是对那个不满意。伯通名义上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事实上却参与学校用人行政的大权。他想起既然这样，那就找一个教中等学校比较有经验的人来试一试，也许可以不出乱子。敦容是在这个情况下到华中大学的，倘使事前知道，他是不会来做这一个试销品的。大约是学生搞去了五六个教师以后，现在也有一些倦了，敦容才在华中大学安下身来。

那时，敦容对于大学教授有一些神秘的感觉，以为不是什么革命志士，一定也是什么儒林丈人之流。到了这里，才知道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大学教师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一位金华的教授，寒假期间回校，他带上一二十条火腿，再在武汉买一些凑凑数，央一个人挑到学校的权要家里，一家一家送礼。还有一位，带着个妹妹住校，看到班上学生中的一个头头，连忙央求一位同事出来做媒，把妹妹许给他，还答应给五十亩地作为奁资。后来头头倒了，这位教授准备赖婚。头头找媒人算账，并且声明如不照办，他就要到法院起诉。由于媒人的劝导，教授总算照数履行。为此，有人在他门上贴出了一张“嫁妹图”。

一九二九年暑假到了。临走的时候，文学院院长文多一交下了两个任务，都是刁钻古怪的，一件是英文国学论著，一件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英文国学论著是专门讲用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论著，这件事还简单，只要多读一些英文书就找到现成的材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困难了，那时市面上还很少这样的著作，要找材料，找论据，然后写出讲稿。敦容说：“英文国学论著不难，中国文学批评史能不能推迟一年，再行讲授？”文多一说：“好，那就推迟一年，因为这是四年级的课，明年秋天才用得着。”

暑假很早，从考毕起就可以动身，到上课时才到校，中间有八十天左右的时间，敦容就欣然地回家了。从四月起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两个月的时间真长呀，现在到家了，他看到全家都很健康，看到母亲和岳母李奶奶也都健康，真是很高兴。可是他这一年到过升州，现在又到武汉，这一切都引起房东奶奶的注意。她认为敦容发达了，因此探求他发达的原因。最后她得出结论：这完全是因为她家的一口井正对着敦容的堂屋。没有水哪里有来源，哪能把敦容送到大学去教书呢？既然找到原因，她就立即向方舟提出，要把房价提高一倍，并且说明要未接受这个条件，否则收回房子，请你们自己决定。

火辣辣的六月，不是搬家的时令，而且到哪里去找房子呀。敦容有些着急，但是也不便吵闹。方舟胸有成竹地说：“不要作急，我们现在按月交出十二元，让她满意。你还能指望和典当伙计的家庭有什么理讲吗？好在你今

年的聘书已经到手，房租也不是没有着落，孩子多了，三间屋也不够住，秋后再找一所大一些的住宅，把它典下来，你寒假回来时搬家，不就解决了？”

夏天长，敦容在一间小房里准备功课。真的他钻进洋框框和故纸堆了。还嫌书籍不够用，七月间他到上海买了两三百元书。从此成为定例，在准备功课中间，冬天有时去，有时不去，夏天则必然要去的。去时多半住在汉口路一家旅馆里，因为离书店近，出进比较方便些。

这一年的夏天方舟又病了，她在城里找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中医治病，没有效。有人推荐张医师看，这是一位名医，因为生肖属狗，乡间人都称他狗先生。狗先生看了还是无效，这就转过来请一位孙云锦看病。这是一位生意人，因为失业，同时也有一些家传，给人看病，倒是非常热切的。他搭了脉，随即两手一拱，说：

“这是喜脉，怎么说是血亏呢？你吃了这么些桃仁，没有闹出事故来，还算是侥幸。恭喜恭喜。”

家乡人的俗话，儿多母苦，眼看又要做第五个孩子的妈妈了，方舟也只能苦笑一下，一面还作着典房搬家的准备。

天民这孩子是肯用功的，在学校的成绩也不错，平时很少和人吵架，但是这一年秋天却和曹家的孩子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从隆盛巷家里出来，通过育婴巷、鹰扬巷到学校，是一条宜路。曹家住在育婴巷，那孩子十一二岁，比天民高半个头，在天民带着弟弟天中上学的道路上，他总得拦路，有时还得臭骂两句，这已经成为他的经常行为了。天民故意让他，但是让不了，要绕道又实在太远。一天下晚他带天中回家的当中，曹家的孩子又来了。天民把自己的书包一并挂在天中身上，吩咐他站远些。他抡着拳头和这一个大孩子打起来，痛痛快快地煞了他的威风，直到把曹家孩子打倒在地为止。从此以后，他们兄弟两个经过育婴巷是通行无阻了。

这一年秋后，敦容又去武汉了。他去后曾寄回二十首《古意》。

古意二十首录五

男儿可怜虫，出门即万里，
夜夜苦忆君，肠断讵能已。

出亦不欣欣，入亦不欣欣，
那能别离此，对案忽念君。

乘兴忽看山，湖光满山阿，
隔水盈盈语，谁人流眼波？

江波万白马，长鬣高腾骧，
一夜三千里，送我置汝傍。

中夜蹴我起，云是小儿啼，
披衣出门视，月白风凄凄。

那时从开学到放学，总共不足二十星期，因此敦容到校以后，总是盼望第十周，这算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一步向前一步，离放假更接近。考试

完毕就和放赦一样，可以早日和方舟见面了。这是一种痴心，但是除了方舟以外，这个痴心又贡献给谁呢？旧社会不是没有感情上的温暖。

一九二九年的冬天，他们搬家了，早先由方舟看好越街头上一所房子，前后三开间两进，外加一排六间厢屋，朝北头两间作为厨房，中间一间是走路，南头三间是书房，宽敞是宽敞多了，眼看第五个孩子就要出世，这样一所房子还是必要的。方舟把一切拾掇好，只待敦容到家就搬家了。天民、天中多少还懂得帮一些忙。文简还小，就是文清看着大人的忙碌，又像懂、又像不懂。向晚，看到大人都蹲在一个新宅子里，她还是不懂，牵着敦容的手说：“父亲，我要回家了。”

“傻孩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还回什么家？”方舟接着说。

新春是一个快乐的季节，也带来一些愁苦，敦容的表兄张仁溥得了腹水症。平时他是常来的，这年冬天，他腆着一个大肚子来了，大家在书房里谈着，此后尚建栋、冒淡如、亢耐安等这一批朋友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天，但是总为着仁溥担心。新春过了，敦容去武汉开学。不久，家信来了，说是仁溥到江阴医院治疗无效，回家病故。方舟知道敦容要感到痛苦，但是也只有通知他。敦容做了一篇祭文，派天民去致祭。天民已经十岁了，在校算是高材生，可是有许多字句读不上来，感到很懊恼。

不久以后，方舟生产了，这是第三个女孩，取名文昭。文昭圆圆的小脸，很像天民，因此天民特别高兴，指着这个小妹妹说：“这是小民呀！”

在文昭满月的前后，脑膜炎给天民一下重重的打击。他全身发硬·腰只顾向后弯。那时，地方的医疗机构还没有，全仗着私人开业的医师。医师也没有把握，说是要在脊椎里打针，可是针已经长久没用过，借也没处借，只得用锈针试试，天民痛得只说：“你也让我戳一下就知道了。”西医不济就请中医，中医孙霞仙，在城里也还有些名气，但是没有胆力，方子齐不出来。那时上海恽铁樵主张用犀角、羚羊这一些大凉药，亢耐安把药方抄好送过来，和霞仙商量，是不是可以用？霞仙只是搓手，说这样的凉药，不敢担这个风险。

方舟坐在床沿，托着孩子，已经两天了，一些没有起色。她一边打电报给敦容，一边下狠心地说：“谁把孩子的病治好，就送一千元。”但是没有一点办法。海陵有一位小儿科的名医纪小云，方舟派车子赶到他家，可是他已到远处出诊了。车子再赶上去，还是没有接到。

有人推荐一位中医张先生，张先生看到孙霞仙的处方都是清凉剂，他想这些总不是办法，便来一个暖药，服下以后，孩子就断送了。

待到敦容到家的时候，还没有进门，看到文简，问起：“大哥怎样了？”文简说：“哥哥死了。”进门以后，只见到方舟正在嚎陶大哭，敦容的眼泪也簌簌地下来。夫妇同到天民寄厝的地方，庆云寺的钟楼下边，平淡到一丝表情也没有的和尚正在撞钟。二人又尽情地哭了一场，然后回家。事后曹占奎和人谈起，他们校中死去了一位好教师，一个好学生，就是说的仁溥和天民。

事后，敦容看到张医师，问起情况，张医师坦然地说：“方子都是照书上开的，不信，你查医书看。”敦容觉得和他没有理讲，也就罢了。

济成这时也在家，他来看方舟，和敦容谈起。济成说：“北门戴家也有孩子生脑膜炎，到镇江找了专家来治，天民病重的时候，他正在济川，可是病不荐医，我说话也有些不便呀。”

北门戴家，敦容也知道，因为他家的老三凝之也在武汉教书，和敦容同事。到这时敦容才知道济成的为人，真是一个绝对的自私自利者，他忘去了天民是他的亲外甥，忘去了敦容不在济川，作为舅舅，不说什么其他的帮助，听到有治脑膜炎的专家，至少总应当捉起一声。自此，他和济成比较疏远了，直到一九四六年他从四川回来以后，那时济成已经处处失败，因此二人才算是言归于好。

这时还在学期中间，敦容不久就回校了，只剩得方舟在家，她的心绪不久安定下来，把希望寄托在天中身上。天中比天民差多了，对自己提不出高标准的要求，只是在学校里应付一些老师的作业。文清、文简也上学了。到一九三五年，天中在小学毕业。那时济川已经办了初级中学，但是方舟总觉得初办的学校，不及外路的好。敦容因为听说崇川的一所商办初级中学比较有名，提出是不是到崇川考一下。方舟同意以后，由敦容陪同天中到崇川应试。考试的前夕，敦容尽量让孩子睡好，得一些休息。外面正在乒乒乓乓闹着跳神的玩意，这一晚自己总是不能入睡。第二天，送孩子到考场。这个学校也特别，作文题由校长临时自己出，题目照例是刁钻古怪的，这一次考题是“报名处”。天中居然也应付过去了。两天以后出榜，天中考取了。

这次考取总算是出人意外，方舟特别地忙了，要为孩子准备衣服，从夏衣起一直到棉衣，厚棉以外，还得准备薄棉。衣服以外，就得置备杂件。方舟的意思，凡是敦容用过的东西，都给孩子带去。从网篮、帐钩、扇子、肥皂盒以及打铺盖的绳索，都在这个前提下给孩子先来了一度的继承。这当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的希望孩子踏着父亲的足迹向前的意思。敦容看到方舟这一种近乎稚气的行为，抱着不小的同情。

方舟家里除了天中以外，还有文清、文简、文昭三个女孩。在一九三二年添了一个男孩，取名天随；一九三四年添了一个女孩，取名文和，一共是六个孩子。天随的出世，在天民去世不久以后，因此方舟感到这是一种补偿，无形地添了些喜悦。文和出世，她感到出乎意外，好在文清、文简两个姊姊，对小妹特别关心，她倒不孤独。文清、文简听到哥哥就要离家到一个遥远的外地，她们决定要开一个送别会。这些主意多是文清的，主持会场的是她，演员主要是文简，文昭还小，也参加了演出。观众就是方舟、敦容和天随、文和了。她们唱了爱国歌、卖报歌、渔光曲、儿歌，演出“高高的云儿”、“快乐啊”两节舞蹈。她们本来打算唱“小小离家乡”，敦容因为音调太惨了，所以要她们唱“快乐啊”一节，要仗“快乐啊，红的花、白的花”的调子，增加一些欢乐的因素。朴素无华的文清、眉目姣好的文简和天真烂漫、满堆着笑容的文昭齐口连声地唱：“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啊！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啊！五千年古国要抬头啊！锄头底下有自由啊！锄头锄头来革命啊！”这样的歌词在当时是很通行的。

送别会以后，便计划怎样去崇川了。敦容有个朋友丁皓琰，住在济川曹家堡，是崇川商办初中的教师。方舟打算把天中送去，由丁皓琰带到崇川。这一天方舟清晨起来，由敦容陪同，带着天中去曹家堡。出城以后，过了桑木桥、焦家堡、萧家榨，离丁先生家只剩了五六里。天是微微的阴着，没有风，没有太阳，有时来了这么一点点小雨，三五十个雨珠儿打在草帽上，在七八月间只觉得有些凉爽。最后到了，在大树后面矮矮的一座屋里，他们把孩子托给丁先生。方舟把学费、膳费完全交出以后，把零用钱也存在他那里，让孩子慢慢地向他领用。同时又把给孩子的一点体己钱也告诉了，好让丁先

生照察着。此外还谈了许多闲话。过后，因为方舟等还要赶天黑前进城，所以在又一次托付以后，仍旧乘车回城。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望着天中所住的书房，真有些空怯怯地。其余的孩子，除了文清稍微有些局促以外，大家都和平常一样。

崇川的商办初中所以有名，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升学率高。对于升学率，当时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当作唯一的标准，这都是由于压榨学生而取得的。特别是商办初中，他们的毕业生投考高中，五十名中差不多有四十五名以上都能考取，这个学校便成为有名的学校。这样高的升学率，是怎样取得的呢？那个学校经常是初一三班，到学年终结时，三班经过淘汰，到二年级只剩得两班一百人了。于是加紧督课，再行淘汰，又去掉五十名，到三年级只办一班，督课更是加紧了，因此升学率特别高，成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倘使我们把那些逐年淘汰的孩子一齐算进，实际上是一百五十人中升学的只有四十五名，是百分之三十。那百分之七十的孩子都作为废品，交给社会，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录取升学的学生也都是弯腰曲背、近视缓步的早熟的孩子。旧社会是怎样地毒害人民，崇川商办初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年年底，敦容到家以后不久，天中也回家了。第二天接到通知，他已经被淘汰了。方舟、敦容都很着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被铺行李都还搁在校里，为什么不能早说一句，也免得再派人到崇川去取回！天中在家里，当然免不了受到埋怨，但是事已至此，只有请人补习，再考济川初中了。他在求学方面走了不少弯路，直到抗战胜利，敦容回家以后，才找到一条直路。

一九三五年秋后，按照当时计算年龄的方法，是敦容四十岁的生日。方舟事先打电报到武昌，要他到汉口去接。她带同文简乘长江轮船去了。同行的还有刘家的一位女客，也带着女孩，是到汉口中华书局去探望她丈夫的。大家一路同行，并不寂寞，两个女孩都在八九岁的光景，索性把铺位当作戏台，唱起戏来。三天以后到达汉口，恰好敦容和刘先生都来接了，一路没有困难。

前面不是说过戴凝之吗？他和敦容住在教师宿舍里，但是在家眷宿舍里，也租了一楼一底的房屋，并雇有厨师。听到方舟来了，赶忙让出给方舟们住下。厨师李伯勋做事也还殷勤。因此，方舟感到很舒适，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田伯通请她们一家吃饭，同时也介绍了他的夫人林叔华。叔华是一位封建官僚的女儿，能写一些文章，一手瘦金体的书法，倒是非常秀劲的。伯通和敦容是从小同学了，常来看他们，但是方舟总觉得他有些官气。在大学里官气是常有的，直到很久以后，才把这一股气息扫除。

除伯通外，还有一位丁锡和，也是济川人，他娶了一位很漂亮的女人，住在珞珈山顶上。锡和听说方舟来了，很高兴，约方舟夫妇和文简去吃晚饭。那一天从傍晚起就是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敦容再三敦促方舟收拾一下同去，但是怎样去呢？山路又滑，自己住在山下，还得爬高坡，才找到环山马路，过了马路，又要爬高坡。女人究竟是女人，不愿意搞得太狼狈。敦容只得冒着大雨，浑身淋漓地赶到丁家。那一位漂亮太太，化了妆，花枝招展地准备迎接锡和的同乡，不想却等了一个空，感到非常扫兴，但是也无可如何了，好在锡和、敦容高高兴兴地吃了这一顿丰富的晚餐。

在这一个月内，中国却发生了两件大事。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已想吞并中国了，一九三一年占领东三省，造成“九·一八”事件，次年进攻上海，造成“一·二八”事件。这时他们又想进攻关内了，十一月间由汉好殷汝耕出

面，在通州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冀东的局面一打开，日本军国主义者就进来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冀东事件。通州离北京很近，殷汝耕家眷住在北京城内，他每早乘汽车到通州，晚上还乘汽车回家，因此他的冀东自治政府，至少是得到当时北京负责当局默许的。

其次是经济顾问英国人李兹罗斯策略的实现。他主张完全停止硬货的使用，市面只通用纸币，称为法币。这样就定下国民党政府大量使用纸币、吸纳现金的调子。无论国民党政府是否决心抗战，在经济方面应否采用必要的手段，这种不换纸币的大量使用，已为币值的不断低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后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盘据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大大地剥削人民，积累了他们的私人财富。

这两件大事看在方舟、敦容的眼里，他们看到情况不断地恶化，总得为自己作出一定的准备。尤其是凝之，他是学经济的，更是一再提醒敦容。不过敦容总还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因为在大政方面，和工农的关系搞得很糟，主要还倚仗着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连知识分子也被逼得无路可走，国民党政府就不能继续存在了。可是他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估计过高了，他们最后竟走上大量发行纸币、不断贬值的道路，终于造成货币的大崩溃，而在这崩溃声中，国民党政府也同归于尽。

在这一个月里，方舟和敦容商定，在济川和人搭伙，开一个小铺子，万一货币崩溃的时候，至少手上还有一些物资，不致于毫无办法。其次是计划买地新建一所宅子，作为日后子女安身的场所。

这个月是他们夫妇间的蜜月，因为没有闲杂事件的打扰，敦容除了每周六小时功课以外，可以整天陪着方舟，方舟也因为有了厨师，自己连灶台也不去了。这样，夫妇之间，可以两张藤椅接连对坐三四小时。敦容在《古意》二十首里曾说：

安得一邱壑，相与忘名姓，
不饥亦不寒，晤对成啸咏。

现在居然实现了。一个月的时间很快，终于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那时长江船除了中国的招商局以外，还有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大古、怡和两家，总称为三公司，经常有船来往，票价比较贵一些，另外有几家小公司，船不多，票价却便宜多了。这次方舟回去，敦容和她们搭的宁绍公司一条船，船上非常舒适，除了三餐以外，还供给一顿点心。私人公司当然不会做亏本生意的，太古、怡和是帝国主义者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为什么招商局的船价定得那么贵呢？原来那时中国的官僚主义插进一只手，搞得机构庞大，人员复杂，贪污腐化，最后都压到人民头上。

船过了南京，刮起六级的东北大风，看来是无法靠拢柴墟了。船上宣布柴墟的客人一律在镇江下船。划子来的时候，真真是惊涛骇浪，敦容一边招呼方舟，一边把文筒搂在怀里。好在文筒看到父母在自己的身边，没有被风涛骇哭。到镇江的第二天，风平浪静，他们搭船由龙岸回到济川。到家以后，第二天敦容仍回武汉去了。

方舟到家以后，主要是和几个亲友接洽，不久就搞了一所恒大和杂货店。这座店除贩卖南北货物以外，还有烛坊、皂坊，制造洋蜡、肥皂，供应市场。在抗战中对于家庭的周转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是准备建筑新宅的事，那时李家的亲戚曹可兮有一块宅基，坐落在文明桥侧。他因为另外买了一所现成的宅子，准备把这所宅基出让，价钱稍

为贵一些。因为是在城内，贵一些原也是意中的，方舟主张先把宅基买下来。年假的时候，敦容回家，把手续都办齐了。至于如何建筑，一时还没有决定。

一九三六年，凝之的新宅建筑好了。五开间一进带厢，非常宽广的庭院，感到十分舒适。原来济川人家建宅常常需要一两年，他是包给海陵一位木工栾金魁办的，只化费了三个月，大体上都还过得去。凝之向敦容再三推荐栾金魁这一位土工程师，并且把自己所订的契约、草图和全部工料账目交给敦容作为参考。

敦容和方舟计算以后，决定接受凝之的办法。因为孩子多，日后需要大，把规模扩大了一些，他们准备造五开间两进，一排厢屋，另外安排两间灶屋一口井。房子一时还不需要这许多，但是因为除了孩子，人手太少，心慌得很，不得不安排让出一些厢屋，租房客作伴。契约订好以后，由栾金魁开出需用的砖瓦木石以及石灰纸脚等一笔细账，决定在三七年六月初开工，此后敦容从武汉回家，担负起照料一切的责任。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开工的那一天，请了周润甫先生来主持。这位老先生也怪，六十多岁了，在敦容上小学的时候教过课，以后又教过方舟，对于这两个学生他一向是有些偏爱的，自己也建筑过一座新宅子，有施工的一套经验，家里又闲着没事，所以高高兴兴地来了。

开工之前，要接洽砖料木材。砖瓦还容易，就是木料为难，好在海陵栾家是开木行的，方舟一边到海陵去定了一些木料，然后再由希之舅舅派人陪同到三江营去买货。这是淮南东路的木料吞吐港，幸亏希之在那里是比较有声望的，所以经他介绍，一切都还顺手，可是方舟是够辛苦的了。待到敦容到家，木料已经到了，砖瓦还需要陆续起运，这个点货清查的责任便落在敦容头上了。为了让女儿女婿照顾建筑的事，李奶奶来了，主要是处理家务。孩子们也是各负责任，天中是常在工地的，文清也去，那时照顾小弟小妹的事就由文简负责，都做得很合式。敦容和文昭说：“倘使两个姊姊都去了，那么家里的事就由你负责照顾了，你得招呼一下天随、文和。”按照那时的算法，文昭才算七岁呢，胖乎乎的，比较忠厚些，她回答说：“我不会照应天随、文和，也用不到他们照应我。”这便引起大家的哄笑。不过文简去工地的时间不多，所以还不一定要动员这个胖娃娃。

敦容到家的时候，正在打墙脚呢，因为这是一块生地，所以打墙脚的事特别重要，沟要开得深，要打梅花桩。尤其石柱下，更是吃紧，非把四周整个夯实，再加碎砖乱瓦重夯不可。因此收买碎砖乱瓦，也成了一个任务，这件事由一位亲戚承担下来。

在瓦工打墙脚的当中，木工便进行刨料拉锯的工作。工地上三五十人，成天地忙碌着，倒也非常有趣。方舟是一个当家作主的人，看到天气热了，常常搞两三担西瓜送来。看到大家伙食不够标准，有时竟送来三四十斤猪肉。包工尽管包工，但是作为当家人，她总觉得应当让每个人都过得高高兴兴的。

桩已打好，木料也做好，抗战的炮声响了。问题提出来了：是继续下去呢，还是半途而废呢？问题很清楚，半途而废，必然是前功尽弃，一切的砖瓦木石，没法收拾，也必然要散失，势必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方舟决定还是继续下去。

新宅正屋上梁的那一天，听到炮声隆隆，是敌人进攻江阴的那一天，八月十三，台风的边缘扫到淮南，宅子西边的竹篱吹倒了，也就在这时候，决定全面抗战。银行通知，各家存款每月只能提取百分之五，这在经费上造成

不利的局势。不过事前方舟、敦容都有一些估计。方舟的哥哥济成，最近刚建好新宅；敦容呢，他还记得父亲曾和他谈起，他建筑灶披的时候，瓦木工人曾告诉他三十元就够用了，其结果化了六十元还不止，只有典卖衣服，把灶披撑起来。济川人把瓦木工人称为半料匠，这不是贬低他们，而是说他们常常估计不足，以致造成不少的困难。

到了九月下半月，敦容因为开学，到武汉去了，好在从江阴向上，轮船通行，没有多大的困难。新宅的结构，已经大体完成，目前仍须完成的是装修工作和开井、填土这一类的事，一切都由方舟承担下来。中秋节的时候，她通知恒大和送来了四十斤月饼，每个工作人员各送一斤，共同欢庆这个民间的节日。

房子快要完工了，敦容的朋友，在商会工作的冒淡如透露一个消息，说是有人从中破坏，准备让军队进驻。按照惯例，军队是住在庙观寺院的，现在庙观寺院都空荡荡的，凭什么要住民房呢？道理说不清楚，房子空着总不是办法。好在新宅子离越街典居的房子不远，当晚方舟和瓦木工人一商量，每人犒劳一元，由他们在夜里帮同搬家。第二天，地方上的工作人员领同军队领导来看宅子的时候，全宅已经住得满满的，他们也就嗒然而去了。

当然宅子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最主要的是要开井，周润老说井底要用水杨木，才不致朽烂，这位老先生派人送来了。开井的那一天，按照地方的规矩，铁匠、石匠、木匠、箍桶匠、瓦匠，五匠俱全，由铁匠首座，以下按序顺列，瓦匠作为主人，坐在下首。吃过酒席开工，井水直冒，一直高到一二丈以外，这算是找到泉眼了。然后安放井底，再把先经箍好的井砖一层一层地吊下去。待到井砖叠好，盖上石板，再在井口搁上井栏，这算是大功告成了。井栏一圈六个字，是当地的书法家杨静山写的：“水清冽，尔明洁”。六字两句，在任何一个字上都可以断句，这是敦容的创作。

到武汉去，是敦容应有的责任，但是在这个战争的时代，抛开室家儿女，烽火连天，正有说不尽的痛苦，他有这样的一首六言诗：

醉看十亩清阴，愁对一江春水。

镜中人物百年，梦里家乡万里。

痛苦煎熬着他的内心，但是他还得尽他应有的责任。

战火一天比一天更凶横了，无情的敌寇，竟派遣飞机去轰炸济川这一个不设防的小县。房子快要完工了，敌机因为地方上一些防御设备也没有，低到从树梢上飞过，工人连忙爬到河坎底下，清楚地看到敌弹在飞过屋顶时下坠，幸而趁着飞行的惯力坠落在西鞠家巷一家门楼下，把门楼炸平了，没有伤人。经过这一次的惊险，瓦木工人匆匆结束，同回海陵。幸好县署一位科长崇川人严先生住来了，家中还不至于全然孤立。

这一年秋天，华中大学也只能勉强上了两个月课。大场失陷以后，敌人越过罗店、南翔，直扑苏嘉线。这是当时前哨的一道国防线，国民党曾经把它宣传得如何周密，和马其诺防线一样，敌人是无从进攻的。但是华中大学的教师们估计，敌人逼近以后，军士决不肯到国防线的碉堡里去，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水泥板，多半是在木板上涂上一层薄薄的水泥，根本不起什么防御作用的。后来果然如此，敌人进逼时，军队就溃散了，公开的声明是钥匙拴在一个军官身上，由于这个军官不在场，无法进入坑道，因此苏嘉线就算失守了。这也不稀奇，他们说，这是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后来希特勒向法国进攻时，马其诺防线不是同样地陷落了吗？

苏嘉线放弃以后，敌人向苏州、常州和镇江进攻，蒋介石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宣布自己准备死守南京。慷慨激昂。一位唐将军毅然地站起来说：“总座系着全国人民的希望，要担负起保障全国的责任，似乎不必株守一隅。唐某虽不才，但是服膺佛教，早已置死生于度外，倘蒙总座委任，保守南京，至少可以坚持六个月。”这一场演讲，颇能激动人心。在一场掌声中，蒋介石决定坐镇武汉，把保守南京的重任交给唐将军。在他接任的当中，敌人是熟读过中国战史的，他们按照历史的惯例，从芜湖包抄过来，不到三天，唐将军已经由淮西退往武汉了。当时盛传，德国公使曾在人前说起：“啊，这位唐将军是我的哥哥呀！”听众愕然不解，德国公使说：“我叫陶德曼，他叫逃得快，我们是亲弟兄呀！”

蒋介石住在武昌督军衙门里，一筹莫展，成天地在那里摔凳子砸碗，拳打脚踢。从淮西到鄂北，一条大道，没有一团武装整齐的队伍。幸亏敌人实力不充，不敢下重注，只是由着冈村宁次们这一批战犯在南京城里作入城式的表演。那部下更忙于杀人竞赛，据说南京城里就屠杀了三十万人以上，至于沪宁线一带的凶残屠杀，更是不计其数了。

华中大学的课业久已停顿了，全校只是喊喊喳喳，像死了王的蜂窝一样，没有一点办法，开课固然办不通，停课又不敢作主，平日提着皮包上山下山的人物，这时都是一筹莫展。图书馆和实验室叮叮当地忙着装箱，但是装箱又到哪里去呢？大家都很茫然。

敦容的书籍已经寄出了，但是心绪并没有因此安顿下来。怎么办呢？课已停顿了，一时谈不到复课，但是一时也谈不到迁校。自己真是如坐针毡。只身以外，还有一个家，有母亲，有妻，有子女六人，长江船全部停顿了，要想和十年前一样，步行回家，可是兵火连天，一身不保，何况从武汉到济川，共有一二千里，步行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只有等待寒假期近，由粤汉铁路，转道香港，由香港到上海，再行设法回家。这一次旅行真不简单，仅仅粤汉铁路就耽搁了五六天，车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就这样捱到广州转坐轮船到港，换船到上海时，已经寒冬腊月了。在上海一打听，还好，济川没有沦陷。由于江阴航道已经堵塞，只能乘船先到新港，再换小车直到济川。路过李家集时，他拢到宋伯纯那里，伯纯留他坐下，饭后再走，到家已经不早了。方舟久已惦记敦容，但是消息不通，一时也想不到办法，现在总算重新见面了。时局的艰苦，使她心挂两头，好在又搅到一处了。

敦容的归来

时局的艰苦，使人受到不小的锻炼，各乡镇又开始组织起游击队。蔡家巷的一仗，就打得非常痛快。敌人一个分队，骑着自行车，从公路上来了。游击队正在埋伏着，由蔡新元为首，号令一下，一次排枪，把敌人打倒了两个。那个分队长下车，和蔡新元肉搏起来。新元一个猛子，抱住敌人不放，就地翻滚，由队员一枪把他打死，其余的敌人都跑了。这里就把三个敌尸送城报功，县长吩咐挂到城门示众。

事情本来可以结束，却带来一阵虚惊，说是敌人要进攻了。这时敦容、方舟带着孩子到三里庙金家去过了一宿，一家七八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外边的骡子，在墙上不断地蹬踢，搅得方舟不能安枕。所好一场虚惊过后，大家再行入城。

原来在外地求学的学生这时都失学在家了，大家总想办起一个学校来。但是作为一个学校，必须经过备案、批准等一套手续，现在省政府也不知在哪里，怎么办呢？有的人便想起和上海的一座私立中学联系，作为该校的分校。将来学生毕业时，一样地可以升学。私立学校多少总有些学店的味道，好在要求不高，按人交出一元，即可作为正式学生。他们约敦容参加，敦容本来无可无不可，现在即提出一个条件：只要华大开学，自己保留进退的自由。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他就在这所中学分校担任起教课来，课余时间，经常参加家内的耕作。

方舟一边种田，一边作庭园的布置。新宅西边靠着大路，大门朝南，沿墙一排悬铃木，再前面是一排榉树，一排杨柳。由大门向东还是榉树，杨柳更多了，沿河边共是两排，靠东墙还有一些合欢、桂花之类。绕到宅北，沿宅是一排梧桐，靠篱笆是一排杨树。在杨树和梧桐之间是一方菜圃，有码头直通大河。树是新栽的，总共一二百株。宅内厅屋前面是一株桂花，一株石榴，夹拥着一株红薇。由厅屋往小厅是一道花墙，上面是砖额“师友琅邪”四字，额下是一道圆门。靠花墙一边是棕树，另一边是朱藤，准备在长成后扎成藤架。进了圆门，是美人芭蕉。厅屋后面是堂屋，西边是一株丁香，东边是一株香橼。香橼以东是花坛，种着天竹、金银花、牡丹、芍药之类。这些树木，一大半是在建筑完成时由朋友们送来的，经过培育，长得新鲜茂盛。虽然没有什么名花异草，总算可以怡情悦性了。就中方舟最爱的是红薇，所以后来当她的孙女出世时，她就给孩子取了这个名字。

严先生由于地方的不平静，县长又换了人，所以回崇川去了。接下来的是一位常奶奶，她的儿子在上海教书，女儿大了，也不打算许人，留在自己身边。她爱的是菊花，种了三五十盆，每天搬出搬进。在她的影响下，方舟也种了一二十盆，感到相当的兴趣。不过她的主要精力还化在后面的一亩八分地。这里她种了麦子，收成亩产三四百斤，在当时已经算是高产的了。收过麦子，再种高粱，产量虽然不高，但是在地里时间短，大量的高粱萁，再配上这二百棵树的枯枝落叶，也就够灶头好几个月的用度。她也曾沿河边移栽芦苇，不过第一年长得不好，后来也就放弃了。

敦容在家的时间，文清已经读完小学六年级，就要进初中了。敦容给她补课，教法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所在。他要文清读书，但是限定每天只准读半天。天随这个虚年七岁的孩子，秋天就要读小学一年级了，敦容也在教他，但是限定每天只准搞一小时，认识几个字，抄写抄写。其余的时间要他们去

玩。好在地方大，她们姊弟活动的范围宽，并不感到厌倦。天中、文简、文昭，分别在中、小学读书，敦容很少督促。他总觉得孩子们会按照自己的要求成长，过分的督促是没有好处的。只有文和，这个女儿还小呢，没有上学，她在家里会自作主张，有时又因为方舟照顾哥哥姊姊太多了一些，感到有些委屈。不过小孩子的委屈情绪不会持久的，过了一阵，她又去歌唱了。

九月间，方舟又添了一个孩子，取名天任，因为是一个男孩，所以尽管子女很多，也还没有引起厌倦。

敦容和方舟，有时相对坐着两小时，一些不感觉厌倦。都是中年人了，早年许多幻想久已应当消除了。但是在默然对坐之中，正掀起另一种幻想：是不是就这样永远默坐相对下去呢？这个问题他们不敢对自己提出。但是他们的这一种相互间的关系，聪明的旁观者会看得出来的。后来有一次任季嫚曾对敦容说：“你呀，应当说夫妇之间的关系，好比读一幅名画。”因此敦容曾经想起给自己的书斋题上“读画斋”的榜书，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想法，却没有这样做。

萦回在敦容脑海的，是华中大学现在怎样了。他虽然离开学校，但这是作为假期离校，在学校复课以后，那他还得要去的。可是他没有接到任何信息，只知道湖北和安徽之间敌人又在蠢蠢欲动了。半年以前，谣传屈服的消息，但是敌人宣布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这才使蒋介石横了一条心，又准备抵抗了。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有守着岗位的责任。敦容也想试一试能不能找一条出门的道路。他跟恒大和办货的店员同到上海试一下。那时湖南、湖北虽然没有放弃，铁路由于兵车的拥挤，已经不很畅通了，但是由越南去，是没有多大困难的。长江里由上海到新港是有轮船的，但不是三公司，也不是什么宁绍、三北之类，而是一种野期船，公司的名称也随时调换，大约是上海的一群浪人，挂着西班牙、葡萄牙这一类国家的旗号。只要有船，大家也不管这些了。

在到上海去的当中，敦容遇到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原来从新港到上海的船票不足一元，大家各占了一个铺位，但是到张黄港，却上来了一二百头猪，每头猪的运费是四元，这一来，船上只有请客家让位了。在这种情况下，敦容和一班舱客收拾一下，把铺位让出，由猪只登位。这实在太离奇了，但是在这种野期公司的指挥下，也只好照办。

那时上海的租界还没有收回，情况和以前差不多，南市和闸北区已经出现了汉奸政府，是由一个姓苏的人出面的，称为大道政府。这个政府也有一面旗帜，在黄布上面缀着一个太极图。黄浦江上，除了敌人的和帝国主义者的船只以外，什么船都挂上这一个黄布太极图。恒大和办货的人办妥以后，敦容跟着他们回家，还好，在归途上没有遇到给猪让位的事。

到家以后，他总在想，现在保卫大武汉的呼声已经传出来了。学校大致总在计划搬家吧，但是搬到哪里呢？大后方比较安定的是四川省，地方比甘肃、云南要富庶一些，但是也容不了这许多大学啊。那时听说北大、清华、南开到云南去，办了一个西南联合大学；北师大、燕大到城固去，办了一所西北大学。那么华中大学怎么办呢？会不会和别的什么学校合并或仍独立一校呢？

关于这所学校的传说，正在不断地散出：有人说现已他调的原任校长王世杰曾经提议把华大的员工缩减到二百人，抛开学生，逕行入川；也有人说教育部主张全部调到四川，工资一概六折。这一切都有待于证实。敦容的朋

友冒淡如总是主张，有机会去四川时，不妨直去，株守在家乡是没有结果的。敦容也很清楚不要说那所私立学校不能经久，即使继续办下去，一月二十元的工资，无法维持一家九口的生活，何况还有母亲和大哥，自己不能不照顾呢？一切都在他的考虑之中。

十一月的上旬，田伯通由四川乐山发来一封电报。那时邮电的联系都得由上海转，电报到家时，敦容正抱着两个月的天任逗他玩呢。太阳照在晔晔发亮的菊花上，敦容坐在书房里，方舟把电报给他看了。敦容接到这封电报，好像受到一次突然的袭击，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主张来。他看着方舟说：“你说怎么办？”

方舟胸有成竹地说：“事情是这样的，去当然有去的为难，但是不给一个回电也不是办法。我看是先到上海，打一个电报问一声，如若可以不去，那当然不去了。”

“如若那边一定要去，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去了，家里的事还有我呢！”

“你总要估计到战事会一直拖延下去，十年八年都没有一个底。”敦容说。

方舟说：“不会的，我看最多再拖一年半载，总有个解决。

‘九·一八’、‘一·二八’的事，我们不是亲身经历过吗？”

看到方舟这样的坚定，敦容也不便多说了。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心里在筹划着，家庭要顾，学校也要顾。待到行李收拾完毕以后，他看看方舟，方舟总觉得一两年就可以解决，那么且到上海去打一个复电，顺便问讯一下。

这时凝之的哥哥惟甫因为得到上海一个厂家的聘约，也准备到上海。敦容到上海后，立即打电报给伯通，问起是否可以暂缓入川。那时电报来往，总要待两三天，因此心绪定下来，看看惟甫怎么样。哪知惟甫气呼呼地回来了，进了门一屁股坐下，他说：“这个厂的办事处虽在北京路，厂部却在苏州河北，要通过敌人霸占的地方，才到厂部。我未到上海之前，他们已经把通行证搞好了，那么我到厂部工作，出入都得向敌人敬礼，这个事情我不干，还要留几根骨头去见老祖宗呢。”惟甫决意不就这个工作，但是既然和敦容同来，决定待四川复电来后，看到结果再回去。

敦容闲着没事，抽便去看了陈柱，这是他的老同学，在广南当过省立中学校长，敦容在那里教过书的。后来他到上海，在交通大学、大夏大学都教过书，“一·二八”的期间写过不少诗，倒也激昂慷慨。敦容看他的时候，他约敦容出去吃饭，一边谈起华中大学的事。

“四川是个山川灵秀的地方，我倒也想去。”陈柱说。

“那么我再给伯通一个电报，推荐你去，我也省得一行，留在淮南照顾家里。”

“慢一下，”陈柱说，“我暂时还不能去，你先去再说。”

事实上，陈柱那时在上海找到一位女朋友，正搅得火热，急切里走不了。上海的这几座大学，一部分是迁到内地去了，但是在上海都留个底，作为分校，也少不了要给陈柱一个位置，这便为他后来的投靠敌人埋下了一个根。不过最初他自己也不知道。

四川的复电来了，要敦容就去，并且希望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报到。

买下香港的船票，敦容上了船。惟甫送他上船以后，自己仍回济川。他们本来是老同学，这次又在上海共同盘桓了好几天，所以惟甫毅然地把敦容

的家务放在心上，在急难的时候有个照应。

敦容去得更远了

方舟送敦容出门的时候，心里也还镇定，及至他到上海，这才想起战事不一定就能结束，全家的担子落在自己身上，家里七个孩子，小的才两个月，大的虽然十六岁了，还不懂事，没有一件事可以为她分担。婆婆呢，在大先生那里，还得照例按月把赡养费送过去。手里的一点点存款，究竟能维持几时，完全没有一个底。敦容是去远了，虽然他在一月十三赶到乐山，究竟那里的情况如何，信上也谈不清楚。她很后悔，但是已无法挽回了。

这一个冬天，方舟的婆婆由于年龄太大，身体衰弱而去世了。敦容经过重重障碍，才到乐山，当然谈不到回家，所幸衣棺事前久已准备了，因此没有什么困难。由于敌人近在驷渚，济川时时有被敌袭击的可能，灵柩不能久留，一九三九年就埋葬在北门外的戴家庄。

事态的发展，有时和人们的预期相反，这个当然是由于在预料的时候，所掌握的资料不全面，因此估计不能正确。即如纸币的价值问题，在三五年方舟夫妇就估计到必然要贬值，以至出现崩溃的状态，但是一直到三九年，纸币不但没有贬值，而且一度还出现过上涨的趋势。这是由于抗战开始，广大人群向西南转移，纸币也就在西南大面积地铺开，本来拥积在东南一角的，一经全面平铺，反而觉得不是太多，因此，币值多少还在上涨。又如济川的市场，原来估计一定会衰落下去，事实上是反而繁荣了，这是由于江阴的国门既经封闭，原来以柴墟为吞吐港的情况改变了，淮南东路的商人都通过新港，与上海进行交易，因此海陵、济川，尤其是济川，因为是中间歇泊的地点，顿时繁荣起来。

恒大和的作坊，本来是有名的。由于经理对于作坊师傅樊大不满，樊大脱离了，和一两位股东一商量，每人参加资金二百元，开办了小小的肥皂作坊。樊大看到方舟家里尚有空屋，靠近河边，取水便当，因此撺掇方舟，作坊就搞起来。一二年后，由于地方出现了新变化，这个作坊歇业，方舟分得三箱肥皂，搁在床后。

事态是这样的：敌人在蔡新元手里吃过一次亏，便向新元进行袭击，使他服输，同时再派人从中勾结。新元经不起硬软两手，他变节了，成为胡传奎式的人物。三九年底，敌人向济川城进攻。方舟事前打发孩子们到三里庙金家去避难，自己留在家里守着。

在一阵炮轰之后，她从灶屋窗口看到敌人从城墙上爬进，然后再由文明桥、飞虹桥向城中心集合。一个小队猛扑新宅，看到大门紧闭，就在草屋门外猛踢。方舟一边开门，一边默数进宅的敌人，一共五十七人，他们正在宅内搜索，方舟连忙奔到斜对过的杨家，贴在墙上，眼盯着自己的宅子。待到敌人退出以后，她默数还是五十七人，这才奔回家中，把前后门重行关上。大致敌人看到满屋书籍纵横，料想关系不大，因此就退到城中心集中了。

敌人虽然不多，由于城中没有作出防御的准备，因此偌大的济川就此丧失。敌人全部集中到城内东北角的余将军庙，那时已经改作公共体育场。敌人盘据这里，四面开阔，不可能遇到突然的袭击，一面布置岗哨，防守极为严密。同时又由地方上的汉奸地主，出面维持秩序。

蔡新元得到汪伪政府的任命，为城守司令，一边扩充势力，拉起了两个旅，他的番号是第十九师，因此又称为蔡师长。他的兄弟老三，成立一个独立营，由蔡新元直接指挥。蔡新元因为妻子樊氏新死，就在城里挑了一个陆

舜卿作为妻室，他的兄弟挑了一个李铭山，这两位姑娘都是济川城里数一数二的人才。城方上人口顺，称蔡老三为三司令，那樊氏的哥哥樊大称为舅司令，地位突然升高，不是从前的作坊师傅了。

济川的形势完全变了，抗战的力量一时都转入地下。县立的初中搬到乡下范家堡，部分的进步力量也渗入这座学校，不过完全没有公开。文清到范家堡上学，放假的时候回家，沿路带着那里的大烧饼。到家以后看到妈妈方舟和小弟天任，天任已经足一岁，还抱在手里，文清把大烧饼逗他，孩子看到烧饼，忙着从妈妈怀里下地跑过去，他就是这样跨出了第一步。

不久，蔡新元也办起一所中学，称为延令初中。在城的知识分子是尽多的，有的钻头觅缝的来教书了；也有的怕这里清浊不分，不愿意来的，可是经不起蔡新元的一番威吓，又都来了。到这时敦容才想起自己这一番远赴四川，究竟还是有意义的。

由于敦容不在家，厅屋空着，伪军竟把一位什么旅长派来住了。这位旅长是一个光杆旅长，手下只有几十个大刀队，也横七竖八的住在厅屋里。有时他们下乡，据说是捉强盗的，强盗到城，都关在草房里，不时有人看守。方舟听说有强盗关在家里，也不免心颤肉跳。有时她同孩子们去看看，都是六七十岁的老汉，也有女人孩子。

“你们是哪来的，怎么说是强盗啊？”孩子们问。

一位老汉说：“我们这样子是强盗吗？捉我们的人才是强盗呢！”

由于这位旅长搞得不成样子，队伍还没有拉起来，就被撤走了，后来听说还受到一定的处分。

厅屋是被这些人盘据了，厢屋十间，却租给一位大学毕业在外边教书的姓尚的。这位姓尚的毕竟是在大学读过书，所以他一来就在租约上写明每间一元，五年为期。在写的时候一元还能购米一斗，后来币值大跌，每月租金不够买十包火柴。

汪精卫到南京成立政府以后，一边散布伪钞，一边通令：蒋介石发的钞票，二元作为一元。币值不断地下降。到了四四年以后，汪精卫不发军饷了，发来两块印钞票的铜模，由蔡新元自己印刷。这时币值已经跌到和纸价相距无几了，有人竟是把麻袋装满伪币，按斤计算。市面上很少使用纸币，出现物物交换的状态。一般人家通常积存一些物资，到急需时再将物资抛售。

文清初中毕业的时候，惟甫因为自己和亲戚的孩子都在这一年毕业了，地方上又没有高级中学，便在家里办起一座高中补习班来。文清就在那里读书。她知道父亲在四川，因此满心满意地想到四川读大学。到四四年春天，正好家乡有人要往四川，约好结伴同行。那一年敦容已经离开乐山，到重庆的健康大学教书了。在他离开乐山的时候，原想回家，但是他很清楚敌人正盘据在南京，又办起一所什么中央大学，校长就是那个在“一·二八”战役中作过慷慨激昂诗篇的陈柱。敦容深知在敌人布置的情报网下，自己只要跨过十字河，踏上津浦铁路，陈柱一定会在南京等候着，那时自己是和他混在一起呢，还是坚决拒绝呢？混在一起的结果是当上一名汉奸，坚决拒绝那就必然要遭到种种的迫害。这两条路他都不想走，所以还是留在四川。

文清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四年的春初了。她手上捧着妈妈叫她带来的一罐蟹油。也真亏这孩子，在重重困难之中，把方舟的深情厚意带到重庆。敦容对着这个罐头凄然地一笑。他们父女两人，舍不得多吃，让蟹油在罐子里霉了再熬，熬了又霉，拖拖拉拉地吃了一两个月。

随着文清等到川以后，敌人好像一匹垂死的狮子，不顾死亡的威胁，猛扑过来。这时蒋介石的部队就像秋风里的落叶一样，他们从河南溃到湖北，从湖北溃到湖南，然后绕过广西，再向贵州溃退。这一次的大溃败，不但是抗战以来所未有，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局面。在贵州相持了一段时期，才算缓和下来。

文清到达重庆，再由敦容帮同备课，秋后竟考取了医学院。敦容的心境才安定下来。就这样拖拖拉拉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敌人投降的公报发表了。学校里的保卫团四个人一排对空发了十三发排枪，人心的振奋是无从形容的。那个医学院也特别，一年级办在重庆，二年级以上办在成都。在这个喜讯之后，文清到成都去了。

胜利来了，到四川去的人没有一个不在盼望复员。可是复员的困难多了。这么一大堆的人，总共只有这么几条船，一船一船地装，不是几个月办得了的事。谣言来了，方舟听到的是，敦容不想回来了，某人某人已经回来，为什么他没有回来？八成他在四川成了家，不想回来。有人甚至说他在四川已经有了孩子，所以不想回来。方舟听到以后，不想去追问，她对于敦容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正和敦容对她没有任何怀疑一样。

方舟的看法，一直是非常坚决的。早在敦容入川之初，有人劝她设法把一两个孩子送到四川，交给敦容，这样比较稳妥些。方舟说：“万一中途失散了，孩子离开母亲，又找不到父亲，两头落空，那怎么办？”

李奶奶也觉得把两个外孙送到四川去是一个办法，她吩咐方舟说：“还是把他们送去吧！他们也安全，你也少担一些心事。”

“妈妈，我已经想定了。孩子们跟着我，生在一处，死在一处，好在都是我生的，不会亏待他们。现在就是父亲起来和我说，我也是不会变的。”

当然，到了方舟把文清托人带到四川时，文清已经大了，她也约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情形完全不同了。

对于敦容，她是绝对信任的，何况文清刚到四川，要是敦容在那里成了家，有了孩子，文清会不来信吗？

四川的归人

敦容在乐山的时候，由于看到四川的木芙蓉，有这样的两首诗：

见芙蓉却寄

芙蓉新发好花枝，试倩飞鸿欲寄谁？
宝镜香残秋漏冷，戍楼天远报书迟。
可怜瘴雨蛮烟地，又是弓刀甲帐时。
但愿他生重覩面，一生长得伺蛾眉。

木芙蓉歌

江南风急雕玉树，江北魂消无觅处。
秋闺手揽万缕愁，却下瑶阶背琼户。
一迳苔痕印深浅，画堂冷落双飞翦。
萧森洞户太凄清，海棠无力芭蕉卷。
露碧霜清点点寒，啼红怨绿泪阑干。
缄愁欲寄七千里，陇上云封百八盘。
谁知寸步隔天地，烽烟处处归无计。
仙家未许种胡麻，机中空负回文字！
坐对芙蓉唤奈何，拂槛窥镜娇无那。
朝天犹觉慵脂粉，归来笑指醉颜酡。
艳艳皑皑雪映霞，锦团绣簇日欲斜。
但见他乡花朵好，不道洛阳苦忆家！
山外秋寒枝朴，山里云深花覆屋。
可怜锦瑟怨年华，平生不羨长生乐！
万壑千岩魂梦通，双双年少倚香红。
试凭玉枕捶虚空，安能百年住此中。
一生长伴木芙蓉。

敦容的心境是痛苦的，但是现在不同了。诗中说他生覩面，现在是此生覩面；诗中说玉枕捶空，现在是实现在望了。到四川已经八年多，哪能怪他不作急呢？那时有人急于离川、东西太多又无法带，把棉衣都卖了，可是秋风惊寒，船票固然无望，身上也不耐霜寒，只有重行买了棉衣。当然，也有人为了赶到上海发财，乘着木船下去。“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不过究竟要担不少风险。和国民党拉得上关系的，都作为接收大员，搭着飞机下去。按照当时的规定，蒋记的纸币一元要换汪记的纸币二百元。所以手上存着一万元的，早一些到上海，便是二百万元，可以多少堆积一些物资。不过上海的物价，也正以日奔夜赶的速度飞速上涨，不久也就无利可图了。

文清在成都，那时医学院的办法多，所以一九四六年六月间先到家。这时济川正进行解放战争，流弹呼呼地从天空穿过，孩子们把桌子并起来，上面盖上了棉被，侥幸没有出什么事故。方舟总得出出进进，为孩子们准备中饭。她倚着胆子大，也就过去了。待到敦容六月底到南京，他把宿舍安排妥当，随即回家，此时文清已回医学院了。这一个下午，天气本来很热，由于赶路，更觉得热极了。还没有到家，远远地看到方舟正坐在堂屋里，后门开着，迎接离家九年的亲人。敦容到的时候，看到方舟，看到文简、文昭，她

们分别在高中、初中毕业了，还没有作出升学的决定。文和已经虚年十三了，也在准备投考济川初中。天随这个初中生，从梧桐树上跳下来，他笑着说：“我老早就看到父亲了，不是父亲先看到我。”天任已经九岁，可是躲在文简后面，不肯出来。

“躲什么？”文简说：“你不是还向邮递员要过父亲，为什么父亲到了又不出来呢？”

天任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长期以来，邮递员不断把父亲的信带来，那他必然知道父亲在哪里了。邮递员本来是常来送信的，因此也只好安慰他，说是不久以后，一定把他的父亲捎回来。

孩子都见到了，就是没有看到天中。

“不知又到哪里去了，早晚要回来的。”方舟说。

方舟告诉敦容，说恒大和久已闭歇了，天中书没有读好，先在恒大和帮忙，后来恒大和一闭歇，他就没事干，在街上闲逛。

孩子们也谈起天中还是有他的长处的。在三九年一个冬天，天黑了，外婆和文昭早已经就睡，只听有人把大门蹬开，嘴上不清不白的。方舟一听不对头，带着奶妈、天任从篱笆洞里爬出去，天中走在前面。方舟吩咐天中到延佑观去喊人。强盗在房里找文简要钱呢，文简嘴硬，回答说：“你们家里会把许多钱交给孩子吗？”强盗转过身来问李奶奶，正在支吾着，天中已经带了人，闪着灯笼，从外面吆喝来了。这一下强盗才知道形势不对，他们一边招呼退却，一边说“走了风”。

敦容对方舟说：“恒大和闭歇也好。所幸战事已定，我们还是靠教书吃饭。天中的事你看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问的？由你带出去就是啦。”

这时文简、文昭都要到南京去考学校，时间不会待人的，三天以后，敦容带同他们兄妹三个动身。济成的孙子成德，方舟的族弟应璜都要去考，大家搭伴同行。当晚就到。第三天住到建康大学宿舍，应璜因为和一位王家订了亲，自己到王家去了。

且说天中、文简、文昭、成德到了南京，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方向。文简是高中毕业了，因为大学招生还早呢，先行报考市立师范特科，一面投考无锡教育学院，由敦容写信给金匱专科学校的一位马先生，托他照应。这位马先生学名一个辰字，是敦容的老同学，正在办着这所私立学校。他对文简的招呼是很热心的，但是要敦容到无锡去兼课。敦容因为建康大学的工资实在不敷开支，征求校方同意后，接受了这个邀请。文昭天资太差，因此报考一所护士学校，同时准备和成德同考建大附中，两人此外也考了一所师范学校。方向明确以后，各人做好自己的预备工作。天中一时还没有办法，想在同乡的工作单位找一个位置。

经过一个月左右，有些学校也出榜了。无锡教育学校、建大附中都没有考取。成德考取市立师范，文简考取市立师范特科，文昭考取江宁师范，她们是备取生。那时的备取生也奇怪，取是取了，可是要托人招呼，有人招呼的立即补上，否则即使备取第一名，也是无法补上的。她们姊妹总算是补上了。还有建康大学呢？文简去考了。那个学校的规定要考五门，只要有一门零分，就没有希望考取的。文清来的时候，敦容把文简的卷子和她说起，她说数学一些希望也没有，这就是说上不成大学，只有到市立师范特科了。情况已经清楚，敦容抽空回到济川，和方舟一一谈起。方舟本来有些埋怨，觉

得敦容对于家务太不关心了。待到敦容回来以后，也就不再置议。这时，文和已经考取济川初中，和天随同校，天任仍读小学。

大小都安排妥当了，就是天中一些办法也没有。敦容在南京、无锡两地奔波。在回到南京后，天中对父亲说：“自己本来要找工作，但是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可以到无锡去读专科学校？”

敦容说：“到无锡去并不难，不过要经过我的一番考试。成功了，你去买车票，我们一同去。”说着，他拿出一张一千二百字的稿纸交给天中：“给我就今天报上的文章抄一页，要不涂改一字，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

天中接过稿纸，进行抄写，敦容去做自己的工作。过了些时，他回过头来，看到天中正在挖补呢，他连忙说：“这样不行。”

天中很懊丧地说：“那我不想去无锡了。”

敦容说：“也好，我不强勉你去。”

沉闷了些时，天中说：“那我换一张写，可以不可以？”

敦容看到这个二十多岁的孩子上学的决心已经成熟了，他说：“可以，就是多换几张纸也没有关系。”到了第三张纸，果然满足了要求。这一年秋天，天中仍然恢复了学生的生活。

秋末冬初，方舟从济川到无锡来了。因为她关心敦容和孩子们的生活，所以和几位到上海的女工一齐出门。到奔牛车站时火车刚开，她本来可以搭下一班二等车的，因为大家宁愿等待四等车，所以索性再等下趟。天任也同来，由于路上的跋涉，吐了一阵，总算还好。在她们到达无锡时，一切都很顺利。到金匮专校已经十时左右。方舟看到敦容把天中安置在自己房中，知道这里有些督课的意味，心里也安定了。

天任睡了一晚，到第二天确实是开了眼界，从学校的东头跑到西头，楼上楼下，玩了一天。向晚天中正在向父母叙述无锡的情况时，只听到后面呼呼的几声，原来是天任爬在床上，要把电灯吹灭呢！大家哄笑了一阵。

两天以后，敦容再把方舟、天任带到南京去。那时文清、文昭都住在校内，只有文简因为学校没有宿舍，还住在建康大学。好在房间大，没有什么不便。文清等也陆续来了。星期日，大家都到中山陵去，看到秋色满林，苍然入画，方舟感到很满意。后来敦容到无锡去的时候，先把方舟母子送到镇江，由她们自己回家，本来柴墟是一条熟路，没有什么困难。

这一年寒假，大家聚集在济川，过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春节。

方舟结婚时的六间房的宅子，由于抗战中生活的紧张，曾经一度典出，现在也赎回来了。

到一九四七年春后开学，建康大学内部逐步紧张起来。这个学校本来是一个政治反映最强烈的所在，大的方面，有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小的方面，更有派系的斗争。到了夏天，敦容那一系的主任换了，新系主任上台，把旧主任时请来的教师换去了十三四名，敦容也在其内。这时才知道到无锡去，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到底是好的。文简在市立师范特科读了一年，现在毕业了，分配在玄武湖附近的四所村小学。夏季，天随也到南京，考取了建大附中。敦容在搬去无锡的前一天，和天随同到四所村去看文简，见她正在上课呢，说话井井有条，心里也感到安慰。

文简本来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头脑清楚，就是在抗战期间，没有好好读书，功课差，在考大学的时候吃了亏。可是到了市立师范以后，情况完全变了，待人接物，读书教课，都能体现出来。寒假放学，她带同文昭、天随回

家，一路都是有理有条。

次年春季开学，文简正准备去南京的时候，敦容发现她气喘得很厉害，和方舟一商量，让文昭、天随先去，把文简留下治病。

文简看到弟妹们动身了，不久又看到父兄要去无锡，总是恋恋不舍，要大家坐在她房里吃饭，让自己多看一眼。她的病是由一位西医张医师看的，由于知道秋后拍过X光片子，认为心肺正常，总朝伤寒一条路上去想，没有想到竟是肺结核。文简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不断地消瘦下去，泪水不由地滴满衣襟。方舟连忙给敦容、文清写信。文清是读医学院的，连夜把输血的设备送到无锡，由敦容带回应用。到家之后，文简正在那里呓语。她不停地说话，可是一句也听不清。没办法，把纸笔送到手中，写了一阵，可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天任还小，文和已经十四五岁了，她和文简最好，想尽一切办法要帮二姊的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方舟向来是不信神求佛的，可是现在信医求药是没有用了。她在夜晚对天焚香，恭恭敬敬地跪下去。香灭了，一阵风来，香棒棒又燃旺起来。敦容这时也是六神无主，怅然地望着天空，对方舟说：“人的办法已经想尽了，一切只有依赖天了。”

但是天毕竟是无情的，堂前的两株树已经很高大了，一串串的白丁香和千朵万朵雪珠一样的香橼花都盛开着，年青的文简就在这浓香馥郁的春天去世了。方舟哭得泪痕不干，敦容看到心爱的孩子的死亡和方舟的悲痛，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们沉浸在痛苦中，这是第二次了，而这比第一次更沉重，更残酷。天民毕竟还小，没有充分地显示他的才力；可是文简已经是长成了，她有力量，有理想。敦容夫妇满心指望她在经过一番锻炼之后，在家乡办起一所初级中学，那时敦容可以在她那里担任教课的工作，一边看她不断地成长，一边也给予一定的保护。现在一切都落空了。医药无灵，天也无灵，所落得的只是一场人生的幻梦。

这一次的打击太重了，方舟很少忘去这一次的悲哀，直到第二个孙女来了以后，才填补了心上的裂痕。

肺结核病还在威胁这一个受到沉重打击的家庭，文昭又病了。这是一个茁壮的孩子，可是结核菌还是袭击了她。幸亏文清在医学院，总算替文昭找到一张病床。事情也怪，最初文昭好像不在乎这一场病痛，在护士不注意的时候，她竟溜出去到鸡鸣寺看热闹，不过后来竟躺下了。那时使用的药是链霉素，因为从美国输入，什么都被他们卡住了，一瓶链霉素，价值贵到和二百斤米价相等。敦容在无锡把两个月的工资拼凑凑，送到南京，这才打下去十瓶链霉素，由天中把她接回去。刚刚有了一些起色，到秋天开学后，又睡倒了。医学院的大夫们都推手，文清因为自己学医，对于本校教师的诊断，存在着一定的迷信，看看三妹没有希望了，才自己把她送回，交给方舟，说要多给妹妹吃些好的，让她高兴一些。

文昭的病逐渐严重了，由于结核的发展，腹部也胀起来。可是文昭是倔强的，她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她和方舟说：“妈妈，我要活啊。”由于文简的死，方舟已经很痛心了，但是办法在哪里？那时家里新来一位房客，叫严学陵，是在一所医院里当过学徒的，后来自己搞了一所小医院，巴巴结结地在那里对付着。方舟和他谈起，学陵说：“办法是有一个，可是责任我不敢负。”

方舟毅然他说：“我的孩子，责任当然由我负。”

学陵的办法，是先用泻药把腹部的胀势解决，然后再行调理。

这一剂泻药果然厉害，泻了一整天，胀势解决了，可是人却虚弱不堪。早一天文昭还能有些行动，泻过以后，竟然动不得了，躺在床上，说话一些气力也没有，可是她自己明白，第一关已经过去了，一股求生的热情支持着她。时间已经冬初了。一交冬令，济川的许多羊肉铺子开了门，方舟每晚自己去搞些羊肉汤回来，一勺一勺地喂文昭，这个孩子是倔强的，经过一冬的调理，病势退去了一大半，可是走起路来，还是娇怯怯的，和从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孩子大不相同了。

物价还在不断地上涨，票子越出越多，票额也越来越大。解放战争在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这就为蒋家王朝注定了无可避免的败局。一个冬天，李奶奶病倒了，方舟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但是死亡的辣手仍然勒紧了这一位老妇人。在旧历的除夕，敦容去探望时，她坐在藤椅上，两只眼睛瞪着方舟和敦容，一瞬也没有停止。敦容把这事看作是最后的嘱咐，他更加和方舟贴紧了。到了除夕晚间，这位李奶奶去世了。济成本来是不管家务的，他续弦的一位赵氏虽然过门多年了，可也不是一个经理家务的人，里里外外全仗着方舟，方舟也觉得李奶奶只生了她一个，她把一切丧葬事务，全部承担过来。新春头上，敦容和孩子们都去了，就是文昭总还是怯生生的，尽管她是会干家务的，可是由于身体还没有复元，一时插不上手。

敦容在无锡，原来在金匱专科学校，由于物价的上涨，一个学校的工资，竟维持不过来，只得到湖滨大学去兼课。这所大学，是一家资本家办的私立学校，在当时颇有一些声望。校董在上海是纺织公会和面粉公会的头头。

待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校董产生了丢包袱的想法，首先是从工资上想办法，这一个月发两成，那一个月发三成，搅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文教处长为了安走人心起见，在五 年劳动节到校一连作了一场六小时的报告，要求全体教师出来共同维持学校。敦容看到义不容辞，挺身出来担任教授会的常务理事。不久全校师生员工都发动了，由敦容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接下去便是对于学校的检讨，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在这当中，这位校董也出动了，本来教授中他的人就不少，再加上些头面人物，他们召开了教授会，通过了退出联席会议的议案。那天一位负责干部也到校打听，可是一些办法也没有。在这一个回合里，校方赢得了初步的胜利。

对于这一次的胜利，校方是不满足的。七月三十日，校董从上海赶来了，向文教处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条是干脆把这座大学停办，这一条是文教处不能接受的；第二条是由文教处接办，自己全不过问，这一条由于解放之初，文教处的条件有限，接受不了。那还有第三条，由校方自办，文教处全不过问。在这个要挟下，校方就把以前的一些跟着文教处走的人全部解聘。这些人曾去文教处说明情况，由一位程科长出来，和大家谈到各人的前途，由文教处负责解决。慢慢地，大家也就东奔西走，各寻出路敦容想既然文教处负责，自己就在那里等候，以为迟早总有一个解决。如此一直等候了三五个月，结果并没有实现。敦容在担任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校内原有一批追随的人；现在他成了瘟疫性的人物，走到哪里，大家远远让开，惟恐和他接近，惹起校方的不满。本来他是参加食堂的，现想何必惹人麻烦，不如自炊，因此学会了煮饭的本领，这原是每个人应有的起码常识。

一天正在雪花纷飞的当中，方舟从济川来了。她劈头就说：“你发疯了，在这里等什么？且先回家过年，办法总会有的，用不到在这里痴等。”

方舟、敦容从黄田港过江，回到济川，度了春节。这时天中、文清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天中在无锡成了家，有了孩子。文昭在江宁师范本来读的是音乐科，由于生病，不搞音乐了，走上小学教师的岗位。只有天随在高中、天任在初中读书，文和在南京读幼儿师范。

春节以后，敦容到山东山左大学教书，饱看了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金线泉这些名胜。家中只剩得方舟和天任，文昭当时还在济川，不久也调到邗江。

方舟看看家里的人都有了着落，她在幼年时期所向往的社会生活，一向被家庭生活所牵掣，现在有实现的可能了。她发现了自己的愿望，于是以百倍的精力投身进去。对于敦容，对于这一群孩子，她是无限热爱的，但是她更爱为社会工作。在旧时代，有多少有抱负有能力的妇女都被这多情的家庭拖住后腿，使她们不能向前啊！现在这个机会送到她的面前。

柴墟的陈道谨、张达泉这两位家庭妇女，到济川办下一所缝纫社。由于她们对于城内情况不够熟悉，一时不能得手。这时管文教的副县长季煦春和她们谈起，要她们去找方舟。煦春是敦容的高班同学，当初曾以领班生的资格带领敦容这一班的，因此他对于敦容很熟悉，加之他也是柴墟季家的，多少沾一些亲。道谨是希之舅舅的媳妇，达泉也沾了些亲戚关系。地方上虽然已经进入新时代，但是旧社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时还起着作用。她们要方舟担任社长的名义，三个妇女的组织，也有分工制度，她们两位教裁剪的教裁剪，教缝纫的教缝纫；方舟的工作可多了，商承县政府的是她，缮写公文的是她，和各方接洽的是她，搞生活管理的是她，农村来的妇女不识字的居多，教语文、算术的还是她。本来在家庭中，由于她主持了一切，孩子们在背后都奉送妈妈一个“万事通”的外号，现在果然是万事通了。

学缝纫总得有缝纫机，可是社里的规定是要自备的。农村妇女有的一时拿不出这许多钱，她们和方舟谈，方舟说：“这样吧！钱由我设法垫出，在这三个月之中，你们一面学，学就是做生活，做生活的工资积到和缝纫机的价值相等，你们就把缝纫机带回家了。”

这一个办法，使得每一个学生都满意了。可是陈道谨、张达泉这两位师傅也得生活，怎么办呢？方舟说：“这样的，现在每期招生二十五名，每人收费六元，除了房金油火杂支以外，你们两位每位六十元，就将就办着吧。”

“方舟，”她们说：“你的生活呢？”

方舟笑了一笑：“那照旧办理，由敦容负责了。”

“不行，你不要生活费，我们可怎么拿呢？”

结果是方舟按月支二十元，其余的除了正当开支以外，由两位师傅分摊。

学生一共招了三期，后来有许多外出做成衣工，也有的兼学刺绣，派的用场更大了。张达泉还准备到上海学习毛线衫机织，学成以后到济川去推广。就当时估计，只要济川每人制一套中山装，这个缝纫社的工作是做不完的。这样就大大地帮助了农村妇女。在每期毕业时，方舟还邀请地方人士演讲，发毕业证书，场面是很隆重的。

但是阻力却来自当地的成衣工人，他们明知方舟的出场，全是为的大众，因此不找她，却找张达泉、陈道谨。他们说：“你们这一办，影响成衣工人的生活，我们怎么办呢？”问题一直搞到季副县长那里，其结果是由副县长出面，缝纫社停办。煦春和方舟说：“你呢？是不是到济川中学当一名职员？由我通知他们好了。”

方舟感谢副县长的好意，她说：“县长既然找到我，当然应为地方上做一些事，现在缝纫社停办了，不能再费心为我找一个位置。”

方舟总是想为地方做一些事，既然出现了挫折，那就由它去了，自己并不灰心。

夏天到了，敦容由山东回家。这时已经接了上海黄浦大学的聘书，秋后离家近了，对于方舟当然是一种安慰，只是天随却去家更远了。天随在建康大学附中高中部毕业，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都录取了，因为哈工大通知先到，所以决心去哈尔滨，方舟知道那里天气冷，赶忙为天随添置衣被，就差没有给做皮衣，这是因为敦容一向坚持“童子不衣裘”的原则，所以方舟没有放手。三年以后，天随回来一次，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件皮夹克，恰巧方舟在沪，也就便添置了。

黄浦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大学，和山左大学一样，解放以前，敦容是不会去那里教书的。解放以后，都由政府接管，情况便大不一样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两所学校都没有什么读书的气氛，学校虽有名，但是图书馆都很差，外国书固然不多，中国书更少得可怜，给人一种洋人不读书的印象。学校的负责人爱说外国话，说得又不周全，真是有些别扭。

敦容到校两个月后，看到方舟、文昭母女二人坐了一辆三轮车来了。这是出于意外，但是又何尝不在意中。四川之行，一别九年，现在真是不愿久离了。这一次她们在上海耽搁不久，都回去了。第二年，文昭调到邗江工作。

一九五二年春间各校进行思想改造，这是脱胎换骨的开始，九、十月间进行院系大调整。敦容本来估计可能就近调扬州师范学院，那里离家更近了，却没想到调入上海大学。

敦容住定以后，有信到家，方舟随即来沪，房间虽小，倒也住下来了，就是天往一个丢在济川。文和是读幼儿师范的，毕业后分在南京上新河的一所幼儿园，年龄小了一些，事情不好应付。好在文清正在南京一所医院工作，姊妹间多少有些照顾。

一天，方舟陪着敦容，正在门外闲逛的时候，看到本地人卖重阳糕，觉得颇别致。待到回宿舍时，传达室送来一封信，是家中房客诸先生写的，说的是无锡奶妈带来一个婴儿，望方舟即日回济川。原来天中已有一个男孩，这一年却添了一对女孩，方舟是爱红薇的，因此取名大红、小红。她送去了一个奶妈，可是无锡方面对奶妈不满意，因此吩咐她带小红回家。事先没有和方舟说一声，这时突然来家，令人手足无措。

第二天方舟就回去了，到家以后，看看小红，倒还秀气，就是太瘦小了。诸先生本来说定由奶妈带回家寄养的，事情已成定局，就此照办。事实上文筒去世以后，方舟心上总觉得少了一些，却说不出什么。看到小红面庞虽然鼻子以下窄得有些像她母亲，可是鼻子以上却开阔了，很像文筒，眼睛也是亮晶晶的。在天中一房，她和文筒一样，都算是第二个女孩了。就这样左支右搭的，方舟心头的创伤仿佛填平了。方舟的孙男女一共十几个，偏偏爱上小红，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那时济川的粮食公司，正住定方舟家的厅屋，出出进进，倒还热闹。方舟和房客们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何况是国家的粮食公司。

时间是一天一天过去了。有时奶妈把小红抱来看看，倒也胭脂花粉的逗人喜爱，就是重量不够，总说是双胞胎，结构小巧。过了春天，和奶妈同住的一位老汉来了。他说：奶妈经常不在家，把孩子搁在家里，老是哭着，哭

倦了就睡过去。待到奶妈来时，通常是喂一个酥饼，孩子怎能胖得起来呢？方舟一阵心酸，只有把小孩接回来，自己招呼。夏天过了，小红已经整一岁了，还是瘦骨支离。靠着方舟对她的关心，这个孩子才慢慢地茁壮起来。

大爱和小爱

方舟对于子女的成长，一向是关心的，但是由于还有成家立业的一面，不免分了心。解放之初，应付各方，有些忙碌，到一九五四年以后，她经常住在上海大学宿舍。不久，小红也接来了。孩子小，又很胆怯，只要看到邻居的孩子眼睛一瞪或是拳头一伸，便要哭到家里，方舟就得好好抚慰一番。四岁以后，幼儿园办起来，初办的时候，多少还有些在暖房培养花朵的味道。虽然只是日托，除了中餐以外，下午午睡，午睡之后，再是鸡蛋、点心之类，小红也就慢慢结实起来，赶上一般的孩子。

文清这时已结婚了，婚后也生了一对女孩：大爱、小爱。可是孩子十几个月以后，文清夫妇要到北京进修，她把大爱、小爱送到上海来，还是请方舟照应。大致这是当时经常有的情况，由于中间一代的工作、学习都很吃紧，她们通常把孩子送到老人们那里，由老人抚养。大爱、小爱来的时候，已经会勉强走路了，可是经常跌跌撞撞地，还得由阿姨照应。中饭的时候，照例是一大碗肉菜饭，大爱、小爱分坐两边，由阿姨一汤瓢一汤瓢地喂着。这件事很能引起方舟的兴趣。饭吃过以后，孩子们就睡午觉。有时她们不睡，就由阿姨用车子拖出去，一头坐一个，让她们在太阳下面打盹。有些大孩子走过，他们照例指着车上的两个小孩说：“双胞胎、双胞胎。”不知道为什么，小爱对于这个称呼非常反感。她经常鼓着小嘴说：“你才是双胞胎！”小孩对于语言的判断，常常根据发言者的态度作出应有的反应，不一定管到说话的内容。

这两个孩子模样是很难辨别的，这和大红、小红不相同。大红的脸是长脸的，小红则上宽下窄，比较地更像文筒。大爱、小爱就很相同了，可是即使在一两岁的时候，已经发现性格上的差异。大爱比较敦厚一些，反应没有小爱的灵敏，除了在吃东西方面丝毫不肯让步以外，其余就马虎了，不过在受到刺激以后，也可能要动手。小爱却尖酸得多了，反应也快，在吃东西方面，可以让步；可是在说话方面，却是分毫不让。有时小姊妹也要动手，在这里，她常是失败者；在拳头不能取胜的时候，舌头和眼泪都成为她反击的有力武器。

小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睡眠中，要吮吸自己的食指，日积月累，把手指都吸得快要变形了。方舟看看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后索性用一双新袜，把她的两只手绑起来。小爱看到这一对鲜红的小拳头，实在有些可怕，要吮吸吗？手指都看不到，吮吸什么呢？她是会哭的，哭也不解决问题。这样坚持了半个月，她慢慢地忘了这个习惯，手指已经不是什么美味，最后才从袜管里解放出来。

小红每当向晚从幼儿园回来以后，就同大爱、小爱一道玩。她是姊姊了，由于她看过一些越剧，每晚就同大爱、小爱演越剧。她在前面跳，大爱、小爱也就跟着跳。她们唱的是自来腔，跳的当然也是自来舞了。小红总算有一些样子，大爱胖得像一只小象，跟在后面一直在摇摆；小爱更不行，她有些累了，就爬在地上。每天晚上都有这样的一幕，所好演员都不觉单调，方舟和敦容坐在那里看这一场儿童剧。

一年以后，文清进修期满，回到南京岗位上了。她抽空到上海来一趟。她的主张是把孩子交给母亲照管，方舟说是孩子太多，也缠人，是不是可以把一个留在上海，由文清带回去一个。文清认为这样做，两个孩子生活环境

两样了，将来会长成不同类型的两姊妹，眼前的例子就是大红、小红。大红跟着妈妈，总是娇生惯养的；小红跟着方舟，尽管方舟对于这个孙女是爱护周到的，但是要求很严格，孩子多少有一些娇，但究竟说话做事有一定的尺寸，和大红完全不同了。方舟和文清的看法不一致，最后还是由文清把大爱、小爱一道带回南京。

两年之后，大爱因为有病，到奶奶这里休养。在大爱、小爱之间，方舟是偏爱大爱的。那时方舟正在食堂担任出纳的工作，每天，她得把一堆一堆的角票和一堆一堆的饭票菜票清理一下，交给会计收账。大爱来了，她要帮奶奶清点呢，她把一桌子的角票和饭票菜票搅混了，方舟只得重新整理。有时厨师托着一盘大碗小碟子的走出走进，大爱躺在门槛上，搞得厨师无从下脚，直待他承认下午带她去玩，才肯起来让厨师走过去。对于这些情况，方舟只是笑了一笑，大爱照常进行，不会受到任何的呵斥。事实上，除了小红，方舟对于大爱是有些偏心的。

小爱也曾经到这里住过一段时候，方舟是一样地高兴接待这个小孙女的。一天，在她从食堂回家的时候，她准备开饭了，但是上上下下地找不到小爱。方舟焦急得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在床后找到这个孩子，她正在捧着饼干盒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吃点心呢！方舟几乎笑起来。

除了大爱、小爱在她那里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以外，方舟自己的孩子，在一九六五年以前都结婚了。文昭是没有孩子的，天任那时也还没有，其余都有了新生的一代，不过到上海住的时间只有三五天，因此给的印象不深，在方舟的记载里，没有留下深刻的记录。

方舟是爱自己的孩子的，更爱孩子的孩子。对这一辈，她要求不是太严格，不过她的优容也是有限度的，到了过分调皮的时候，也可能进行一些教育。惟有对于文和的孩子特别宽待一些，这是由于文和还和小时一样容易掉眼泪，她不愿意使文和过分难过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代及其后

一九五八年是在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年头。在这个年头，各个岗位上的人都尽了自己的努力。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开花。为了粮食的增产，钢铁的增产，一切都得让路。上海是一个工业基地，那年全国钢产量的目标是一千二百万吨，仅仅上海就是一百二十万吨。除了转炉不断地增产以外，全市展开一个土法炼钢的运动，每一个厂子，每一条马路，甚至每一个庭院里，到处都是土炉，入夜以后，遍地火光照耀，这一年真是一个非常的年头。

学校里除了炼钢以外，更促动每一个人为了文化事业的跃进而付出辛勤的劳动。教师说要著书写出十万字的稿件，在大会上通不过，有人喊着要写二十万。二十万被接受了，有人马上提出三十万、四十万，甚至五十万。每个人都在狂热地工作，要在大跃进中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时公共食堂也在兴办了。每个宿舍的家庭妇女，配合着学校的厨师都办起食堂来。方舟所在的宿舍办成了第一食堂。方舟和其他四位家庭妇女都参加了这个工作。工作是严肃的，每个人都得尽她的力量。可是，除了一位青年妇女外，其余的过了一阵子退却了，方舟却坚持着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她的工作是出纳，那位青年妇女是会计。天还没有大明的时候，方舟就得起来，验收采购员送来的一切：米若干斤，肉若干斤，鱼若干尾，青菜、菠菜、花菜、西红柿、番薯、胡椒各若干斤，豆油是多少，猪油是多少，这一切她都得过秤。是公家的事嘛，一点马虎不得。等她把这一份工作一丝不苟地做完，时间已经九点钟了。她不一定要参加切菜和烹调的工作，但是工作繁重的日子，她也得参加。十点，工作人员照例是可以无偿地吃一两只馒头的，但是方舟坚决不吃。她认定自己是来搞义务工作的，因此不能沾食堂的光。开饭的时候，是一个紧张的局面，是宿舍食堂么，当然有一些孩子要吵吵嚷嚷地来了。可是孩子们究竟是讲道理的，在方舟对他们的劝说下，他们也居然排队就位，秩序井然地凭着饭票、菜票领取饭菜了。

下午休息片刻，方舟就得结算账目，到宿舍食堂总会计那里去报销。她对珠算虽然有一些基础，却久已荒疏，为了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她坚持着学习。通过这一关，在报销方面就没有困难了。她竟做到工作以来，没有错算一分钱、错领一分钱的地步。

报销以后，为时已经不早了，就得准备开晚饭。晚饭一过，她又得清点存货，安排妥当。有时，她还要帮助会计员搞清账目。

在她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工会的负责人和她谈起：三个月后可以领工作证。方舟原来只是准备义务劳动的，并不指望什么工资，但是对于工作证却很关心：既然工作，为什么不发工作证呢？后来工作证不发了，在校刊上发表了一个报导，说是这个宿舍某某五位同志参加了义务工作，把那三位一经尝试随即退出的妇女排在前面，方舟看了以后，只能淡淡地一笑。

一天，敦容为了调换一下口味，晚间搞了一碗面条，可是那天一位教师到食堂要求吃面，天已晚了，买面条也没有买处。方舟回到家里，把面碗端起就跑，口里说一声：“先人后己么！”

方舟从早到晚，在食堂里工作，家务由谁管呢？敦容正为了那五十万字搞得头昏脑胀，本来就不会管家务，现在要管也无暇及此了。方舟就请了一位保姆代管，当然每月平添二三十元工资的支出。

敦容对于方舟的工作是支持的，这一些工资也还能将就应付，一天笑着

对方舟说：“你这出纳员是捐得来的啊。”

“不能这样说，”方舟说，“我这三四十年被小锅小灶磨折了大半世，今年才从小锅小灶里解放出来，花一点钱算得什么？”

“是的，你是从小锅小灶里解放出来，现在却掉到大锅大灶里去，那又怎样呢？”

“不是这样说的，”方舟说，“小锅小灶是为的自己，是为己服务；大锅大灶，是为的大家，是为人民服务。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当然，敦容是支持方舟搞好这个工作的。他常说，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托儿所，一是食堂。文和的求学幼儿师范，方舟的参加食堂工作，都是符合他的愿望的。

方舟在食堂工作，前后三年，从开办之日起，至停办之日止，中间没有间断过。

不能说她在食堂工作期间，完全没有酬报。在大跃进那一年，她曾得到跃进奖金十元。一九五九年，学校部分教师到黄山游览，后此数日，在食堂的义务工作人员，也获得到杭州游览的机会，敦容和同事等从黄山下山后，路过杭州，恰好方舟也在杭州，因此在西湖同游几天，这都是方舟所得的优待。

一九六二年，方舟看到食堂停办了，有了时间，因此回到济川看望亲友。事后乘船回沪，坐的是二等舱，位置是很宽敞的。这时她听到外边争执的声音，天色已经黑了，凭着一线的灯光，她看到一位乡村妇女，正和船上工作人员争吵呢。

这一位妇女三十多岁了，样子还算结实，可是已经临产了，船上工作人员再三要她在船泊江阴时即行登岸。

“我买的上海票，你要我上岸干什么？天已黑了，我又没有到过黄田港，认不得路，你要我到哪里去？”乡村妇女说。

“要你到医院去，没有人照顾，你总不能在船上生产吧。”船员说。

“我知道医院在哪里？怎么个去法？”

船员看看无法强迫妇人下船，便自己到账房去，找管账的人来。

方舟对乡村妇女说：“你在外边要招风的，快些到我这里来，又避风，又安静。”

这位乡村妇女就跟方舟同到二等舱，方舟对她说千万不要上岸，上了岸没有办法的。过了些时，账房的人来了。方舟和他谈起，眼看这位女同志就要生产了，上岸没有照顾，反而要遭危险。虽说船上没有医师，不妨通过广播喇叭，召集乘客中懂得医道的，到二等舱来照顾。她自己曾经生产过七八胎，多少懂得一些，总可以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这一番话，把账房也说通了。新社会果然和旧社会不同，广播喇叭一响，来了一位内科医师，一位看护妇，加上方舟一起，也抵得了一位妇产科医师。情况虽然紧张，大家且安定下来。方舟替这位乡村妇女安排被褥，让她可以安歇。这位乡村妇女的丈夫在上海工作，本来约她早一些去的，她因为工作忙，直待产期临到面前，这才买了船票上船，几乎出了危险。

安定中也还带着紧张。过了约摸两小时，经过不断的呻吟和低号，孩子出世了，是一个男的，乡村妇女露出一丝的微笑。方舟把自己所带的点心给她吃，让她接一接力。医师和看护给方舟一些指示，由方舟负责照料，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舱位中去。

方舟招呼这位乡村妇女好好地睡下来，孩子也包得好好的躺在她身旁，这才想到自己也应当休息了，但是却睡不着，总是想起明天船一靠岸，怎样安排这一位妇人到她丈夫那儿去呢？她是不是能行动，认不认得路？这些问题都提到方舟面前。

天亮了，船已经到了吴淞口外，茫茫的大海，迎着朝霞，发出万道的光彩。过了些时，乡村妇女也醒了。一边看看身旁的小宝贝，一边向着方舟。她觉得这一位陌生人给了自己很大的照应，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能向她提出呢？最后她鼓着勇气对方舟说：“船快要进口了，孩子的爸爸所在的工厂我是知道的，可是怎么个去法呢？万一他不来接，带着孩子赶路，总有些为难的。”

方舟看到她为难的神色，可是既然知道工厂的地址，问题已经解决一大半。她神色怡然地对这位妇人说：“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我的儿子天任本来约好要到码头来接我。从这里去上海大学是一条熟路，不一定要人接，我自己会去的，我让他把你送到工厂，事情就没有困难了。”

约摸两个钟头以后，船已经靠近大达码头，方舟和这位妇人都向着码头上远远看去。

天任远远看到妈妈，高兴地在那里叫唤。正在这个时候，一位青年工人，约摸三十多岁，从旁边插过来，他也在那里向着船上瞧呢。乡村妇女的心差不多要从口里跳出来了，她嚷着：“在这里，我在这里呀。”

这位青年工人在征求码头工人的同意以后，上了船，接过孩子。他们夫妇向方舟道了谢，方舟关照这位妇人要多休息，要避风，因为生产是一件大事，不能轻易忽视的。他们和方舟都忘了互问姓名和地址，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方舟只是做了她在这个环境中必要的照应。

一九六五年四月间，敦容的老同学亢耐安从泰兴寄信来，他说今年是敦容七十岁，要到上海来探望，便中看看上海的劳动节的情况。大约是四月二十六七，他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毛平孺。这一位平孺先生是近邻，已经八十开外了，还很健康。他们的到来，带来了故乡的温暖。毛先生当晚住到他女儿那里去了，耐安就留在敦容家里。

方舟和敦容想起了一件心事：五四年搬出的时候，曾经把旧宅六间和新宅宅后的将近两亩地献给地方，现在已经十年出外了，自己的六个子女都走上工作岗位，结了婚，住在外边，这时谁也不会想起要回济川去。在外边的多半住的是公家的房子，那么和公家已经是一家人了，划不清界线，再把这二十几间房子攥在手里，这又是为的什么。他们和耐安商议，是不是可以由耐安在回家以后，和地方当局接洽一下，索性把这个新的宅子一并献给地方。

“你们是不是还要保留几间房子，作为万一回济川时歇脚的地方呢？”耐安问。

方舟说：“要是回济川去，还愁没有歇脚的地方吗？既然亢先生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地方上给我们留下三间屋，在不在本宅，那倒不拘执。”

“那么敦容兄的书籍呢？在济川，你们这一家的书要算多的。”

“原是为的这件事，”敦容说：“我想连房子带书籍一齐捐献给地方。一百万人口的县份，总还是应当有一座图书馆的。”

“好得很，你们的房子本来轩敞，有这么二十多间，安排一个图书馆，也够将就了。是不是要用一个什么名义，作为纪念的意思？”

“不用了。”敦容说，“把房屋和图书献给公家，总算尽了自己的一份

心，至于什么名义，我看是完全不必了吧。”

耐安对于他们夫妇愿意献出自己唯一的财产，不要任何名义，这样的一刀两断，表示完全赞同。他极力答应回到济川以后，和地方当局接洽，让地方图书馆早日举办，为当地人民服务。

冬天不久就到了，初冬的上海还带有几分温暖。是敦容七十的生日了。在他们结婚以后，方舟对于敦容的生日，一向是非常重要的。三十岁那一年，敦容还在崇川，生日那一天，方舟是赶到济川去，夫妇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这一个日子。四十岁那一年，敦容在武汉，方舟是带着文简去的。五十岁就不同了，那时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济川，相去数千里，无法见面，这是迫于时势，原是无可奈何的了。六十岁那一年，敦容在无锡，方舟从济川赶过去，和天中夫妇一道过的。如今是七十岁了，方舟商议是怎么过呢？当然，他们是不会搞什么排场的，以往不也是如此吗？但是也不能就此不声不响的过去。

方舟提议在那一天到南翔去。南翔是当时最有名的清洁卫生区，镇上有一座古漪园，也很有名，比上海的豫园要开阔得多，

又不像中山公园那样，带着几分洋气，使人感到究竟缺乏中国园林的趣味。

从上海到南翔，有一条直达的汽车路，大约一二小时也就到了。他们夫妇先在街上溜达了一遍，地方虽不大，却是户户澄清，家家整洁，果然名不虚传。有的人家临街安了灶台，这原是当地人的风俗，可是这灶台竟是搞得粉白雪亮，清洁无尘，比上海人家的客厅要光洁得多了。在街道上打了一个转，方舟夫妇折到古漪园。那一天正是小阳春的气候，一阵风过，嗡嗡的蜜蜂飞来，十数位工作妇女正在场地上采摘白菊花呢！有一个荷花池，荷花已经残败了，还有一些残荷在那里。绕池便是假山石，虽然堆得并不高耸，却也错落有致，比苏州的狮子林，显然有个雅俗之分。他们感到这里很空旷，也很清静，当然这和古漪园的地点和创建的时代是有关的。这里人户本来不多，即使上海有些人因为慕名而来，究竟人数是有限的，和上海的中山公园是大不相同了；而完成的时期比较在后，因此也不像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那样的局促。

初冬的时节了，但是这里到底是江南，使人感觉的不是萧飒而是清新的余温，草木发出一些幽静的微香。方舟和敦容都沉醉在这动人的景色里。时光一秒一分地移动，人们三三五五地向着孔圆门进去。迎面是一座大厅，这是食堂。南翔的小笼馒头是有名的，两客馒头送来了，吃过以后，这才开始吃饭，方舟点了虾仁、清蒸鱼和炒腰花，因为这是上海少有的。食客本来不多，因此饭菜都是搞得非常细致。尤其那碗筷的清洁、桌椅的整齐，和这一个卫生模范的南翔镇，更是相得益彰。

午饭以后，方舟和敦容信步走到一个休息室，这里有沙发，有藤椅，日光从西窗里慢慢地透过来，更使人感到透骨的舒适。

“听呀，”方舟指着敦容，要他仔细听着。不知从哪里来一阵钢琴声，配合着一位炉火纯青的女艺人，正在悠悠扬扬地低唱：

忆昔与君初靛面，下车三揖都且妍。
生则同室死同穴，有如皦日矢云天。
自谓身世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

呜呼，此身虽在复何补，到老负君泪如泉。

音调从细腻转向悲惋，敦容有些感触，想过去看看这位艺人的容态。方舟只是要他不动，继续听下去：

夙兴夜寐为室劳，辛苦持家靡有朝。

恃君负君与君别，如何一去风骚骚。

低回但见白日暮，举头不觉青天高。

呜呼，苍天梦梦何足数，性命于我如鸿毛。

狂枫忽起青萍末，呼天号地迄不应。

断枝抵格发狂啸，枯叶飞舞相凭陵。

下照鬼怪无犀角，巧间白黑有苍蝇。

呜呼，弃我如遗无乃忍，缘何毕命青丝绳！

方舟的眼泪正在索回着，那位女艺人也感到呜咽。敦容要去看时，被方舟朝藤椅上一推，他去不了，但是他也是满腔郁塞，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远处的钢琴还在那里呜呜咽咽地奏着。女艺人又在沉痛地歌唱：

大风瀕洞倾天地，余波亦复到穷乡。

摧残谁能知爱惜，别来但觉尘满床。

玳簪珠珥久抛却，罗衫纨扇空满箱。

呜呼，岂知玉骨付飞焰，至今尘土有余香。

君去我留照空屋，仓皇追君恨不速。

先行一步语何亲，强留人间无面目。

可怜痴儿语不休，但愿老父荷天禄。

呜呼，寿宫一闭永无期，倘能再见剖心腹。

钢琴到这里嘎然截断，艺人的歌喉也已经哽不成声了。敦容望着方舟道：“这是本地的故事吧？‘穷乡’想必就是南翔了。”

方舟把手绢折了又折，只是说：“你真是书痴了，读书哪能这样死在句下呢？我看……我看……”她也说不下去了。

看看阳光益发直泻室内，计算从南翔回上海的一趟车也许就要开了，方舟和敦容惘惘地离开古漪园。劳动人民还在那里辛勤地翻晒雪白的菊花。

[附]朱东润主要著作目录

- 《读诗四论》（一九四一年商务印书馆，后经修订改名）
《诗三百篇探故》（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记考索》（一九四三年开明书店）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九四四年开明书店）
《张居正大传》（一九四三年开明书店初版，一九五七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
《陆游传》（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陆游研究》（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梅尧臣传》（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甫叙论》（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文学论集》（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

[附]《李方舟传》人名地名对照

淮南	江苏安徽淮水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淮南西路	安徽淮水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淮南东路	江苏淮水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济川县	泰兴县
邗江	—扬州市东南
柴墟镇	口岸镇
骥渚县	靖江县
李家集	季家市
下河一带	兴化县一带
李月波	邵月波
李诚斋	邹质斋
季奶奶	李奶奶
海陵县	泰州
邗江县	扬州柴墟
季家	口岸李家
李楫	—邹楫
姓宋的店伙	朱伯纯
崇川州	南通州
崇川的翰林公	张謇
奉雉县	如皋县
海陵县	泰州
羊圈镇	姜堰镇
李熙午	邹熙五
李槎	邹槎
李方舟	邹莲舫
升州	南京
李杏伯	邹志祥小名
宋宇清	朱宇清
宋苕沅	朱苕沅
宋野桥	朱野樵
宋敦容	朱东润
广南	广西
宋宜申	朱丽生
舒家巷	苏家巷
崇川师范	南通师范
天民	君达
天中	君遂
文清	清於
东来庵	西来庵
白桥	黄桥
江垛	蒋垛
李家镇	张家桥

曹占奎	邵渐逵
尚建栋	常健东
希之	李熙之
张仁溥	李仁溥
贺箬庵	何箬庵
文简	—秀若
冯心斋	马心斋
华中大学	武汉大学
田伯通	陈通伯
陈长庚	郑东启
文多一	闻一多
冒淡如	梅澹若
亢耐安	耿乃宽
文昭	—惠如
天随	—君道
林叔华	凌叔华
恒大和	恒泰和
曹可兮	邵可哉
宋伯纯	朱伯纯
天任	—君迈
惟甫	—戴为勇
尚姓	—常春涛
建康大学	中央大学
金匮专科学校	无锡国学专门学校
马辰	—冯振
湖滨大学	江南大学
山左大学	齐鲁大学
季煦春	李煦春
黄浦大学	沪江大学
上海大学	复旦大学
诸先生	储珀石
大红	—大薇
小红	—小薇
大爱	大宝
小爱	小宝
毛平孺	茅聘儒

后记

这本书的写定，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后来有人称为“十年浩劫”。其实，十年浩劫的年月是可以算得清的，十年浩劫中人民所受的损失是算不清的。

我是很渺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人。教过十二年中等学校，以后又教过三十几年大学，在大学当过十年系主任，说来也惭愧，实在没有什么成绩。文化大革命来了，要接受再教育。自己没有学好，接受再教育是完全应当的。我除草、种地、拣棉花、打扫茅厕，这都是应当的，没有什么委屈。我背“老三篇”，读毛选，也是应当的。我被打、被斗、站壁角，在酷暑中晒太阳，也是应当的。这倒不是我的谦虚，因为我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受过这样的待遇，我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受得了，我凭什么不能受？

但是问题不仅在此。早晨起来，我们都要请示；晚上收工，我们都要汇报。不仅如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饭，我们都得谢谢，要饱含无限的深情。

还有文艺表演，无论如何打得头肿眼青，在第二天学习时，第一件就得学唱样板戏。会唱的要唱，不会唱的也要唱，当然总有带头的先知先觉——一声令下，大家都唱。唱过了再学习，学习完了再劳动，大半都是粉刷墙壁、清扫茅厕这一类的工作。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倒有些习以为常。是什么思想在那里支持我呢？“革命”的好汉都骂我们是“孔老二”、“孟老三”的孝子贤孙。“孔老二”是见过经传的，这没有什么希奇。为什么是“孟老三”呢？这个我不懂，也没有读到过。倒是老子的《道德经》给了我一些支持的力量。老子说：“夫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可长且久，而况于人乎？”暴风骤雨好像很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不久以后，暴风过了，骤雨停了，天还是照样的天，地还是照样的地，可怕在哪里呢？一切都有一个过去的时候，过去了以后，总会有个正常的现象。

然而这只是我的看法。暴风骤雨要经过多久呢？也许只是一天两天，也许要长一些，有些人实在等不及。我总觉得是不会长的，这一次是不太短了，然而也不过是十年。人不会永远发神经的，在神经暴发的时候，他可以拍桌子，打板凳，骂娘，诮老子；神经过了以后，他会觉得桌子板凳都可惜，娘老子也不一定要诮骂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制止当然制止，万一不能，我们还可以等待。人总有清醒的一天，这一种信任，我们还是以不动摇为好。

这本传记写作的时候，整个民族还处在神经不太正常的时候，亲爱的人死了，我责备自己没有能在事先预防，也没有能在事后解救。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午饭以后，我匆匆地去学校了。从前我是教师，是教人的；这时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是专政对象，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能不去吗？但是我不很理解，我是从小喝元麦稀饭长大的，教过书，没有做过资本家，也没有田，在解放初期，还曾在苏南文教处的领导下，当过一所大学的师生员工联席会议主席，为教师的利益说过一些话，怎么我又做起资产阶级的代理

人、反动学术权威呢？这许多的不懂，当然总会有懂的一天，在雨过天青、风散云开的时候，自然会懂的。我去学习了。学习的三部曲是有人读一段语录，唱一段样板戏，再来一个“敬祝”。经过这三个阶段以后，再斗私批修，系行政总是系里的罪魁祸首。有一搭没一搭的，一直到天黑为止。

在那个星期中，莲舫一直是心神不安的。身体本来不好，又担心我在学习中要遭到无情的处理，心神久已不安了。但是那些最最进步的人，不会放过她的。里弄委员会已经成立了，由一位老工人杨伯伯作为负责人，其实完全由“革命小将”主持一切。他们给莲舫定了罪名，罚她每日清扫宿舍大院。莲舫已六十八岁了，原来就患有高血压，加以长期的担忧和焦虑，健康实在不行了。一柄大竹枝扫把，对她来说太沉重了，她和我说：“实在搨不动了。”那时我们的子女大半分布在各地，膝前只有一个十六岁的孙女。那时不是说要说服城里人把他们大学、高中、初中的学生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这是一个“最高指示”，谁能不下乡呢？孩子已经去了，我又要上班学习，莲舫的衰弱已经到了枯竭的地步。我说：“这样吧，由我向‘革命小将’申请，一天亮由我来扫地，把地扫干净以后，再行到校学习，保证不会误事。”莲舫说：“何苦呢？你自己已经够累了，再加上我这一份，身体吃得消吗？”她是竭力阻挡的。我们相处了四十九年，始终没有多大的分歧，可是这次我要拿出自己的主张。我对“革命小将”说：“能不能由我在上班以前把邹莲舫的工作先行做完，然后上班？保证不会误事。”“革命小将”圆睁两只充满血丝的眼睛，大喝一声，说：“不行，要她自己干！”没奈何，我只得到校上班，读语录，唱样板戏，敬祝。

中午的时候，还好我回来吃饭了。饭后莲舫把我的一件破棉袄收拾收拾，加上护袖。一点钟快到了，我又要去学习，莲舫没有多话，只是向我淡淡地一笑。我们就此永别了。下午，我们还是照样读一段语录，唱一段样板戏，再来一个敬祝，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欢呼之后又开始学习了。一位老教师是班长，话不多，但很沉重。然后由另一位老教师咳嗽一声，清清喉咙，开始读报、读文件。然后是汇报思想，互相批评，特别要对于系行政加重教育。气氛非常沉重，大家都很肃然。天慢慢地黑下来了，还不放，还要学习。学习总是越深越好，越多越好。从一九六六年我们就在半麻木中灌输进去了，而今已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下午六时。

我走出校门的时候，小儿子君迈正在等着。他领我从邯郸路走到国清路，然后回转，由四平路绕到国权路。如此者再回转，再回转，最后回到国年路的宿舍，莲舫没有呼吸了，自经的绳索还在，后来给公安局的人带去了，作为自尽的见证。我的棉袄已经收拾了，上面留着一张字条：“东润：对不起，我先行一步了。钱留在衣袋里。”这张字条也由公安局的人带去。所以她的遗物，除了衣饰零用以外，这最后的一点遗言都没有留下。

为了国家的需要，她办过缝纫组，她办过食堂。她曾经在第一宿舍担任居民小组长，因为缺人负责的关系，她跨过马路，到第二宿舍再兼任一个居民小组长。为了食堂的需要，她一天亮就工作，除了午后略为休息外，又从下午起再一直干到晚上。至于在泰兴办缝纫组的事，那更不必说了。假如办到现在，我们可以做多少工作，为国家赚多少外汇。但是李副县长慑于成衣师傅的压力，他主张停办了。她一句话也不说，连李副县长要为她安排在县立中学工作，她也拒绝了。

在国家需要我从泰兴到四川工作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让我走了。我还

有些留恋，但是她却肯定地让我走了。八年分离之中，她对我是绝对地信任，甚至有人告诉她我在四川重娶已经有了孩子的时候，她只是淡淡地一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在敌人进入泰兴以后，亲戚朋友的往来都相继断绝，她没有分厘毫发的畏惧。除了在大乱的当中，她关心儿女的生存，为他们的安全操心担忧之外，只是行所当行，为所当为，没有丝毫的胆怯。

然而，这样的一位家庭妇女，竟被威逼到自杀的地步。在那种风声鹤唳的时候，原本救死扶伤的医院对这样的妇女是不收留、不抢救的。莲舫的生是为国家和家庭尽了她的责任，莲舫的死是由于应当尽责的医护人员不便尽责而终于死去的。

在莲舫去世的第二天清晨，我在第一宿舍又遇到那位“革命小将”了。小将眼里的血丝更多了，显见他这一天正忙着他的“革命事业”。我说：“莲舫因为身体有病，那柄大扫把实在掙不动，非常劳苦，已经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我曾向‘革命’的负责人请求，由我清早起来代她清扫，没有得到许可，她有病，实在受不了这种劳累，因而自杀了。”

“革命小将”问我：“你和谁说的？”

我睁着眼睛对着这“小将”说：“就是对你说的。”

他无可抵赖，在门房还有一大群人，也无人为他抵赖，他灰溜溜地走了。

莲舫的遗体是送到火葬场的。当时造反小将们是统治者，他们对我的禁令是西不得到大八寺，东不得到五角场，除了这个半径不到数里的地方以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所以莲舫这一去，我们是从此不再见面了。回想当初我去四川的时候，虽然相去数千里，但是熬过了八年抗战的局面，我们还是相见如故。哪知这次从此一别，便是天上人间呢？“革命小将”的威风，是谁能比拟的呢？他们的威风，又是谁给的呢？

进一步的还在后面，在莲舫火葬以后的第二天，小将们又要开批斗会了。人已死了，还要批斗哪一个？要批斗我。十二月的一天下午，在工会大厅召集大会进行批斗。事情已经过去了，来看的人没有什么，只有三二十个小孩趴在小凳上打瞌睡。等着等着，那位杨老工人莫明其妙地来了。他茫然四顾，不知是什么事，只晓得今天又要出场了，他义不容辞，也就出场等吧。小将也来了，最重要的还在后面，就是我的那位专案组长。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读书人，虽然当了系主任的名义，但是十年以来，我懂得系主任的责任是把全系的教师团结在一处，共同探讨，相互促进，以此来争取这个中文系的前进。说好听些是系主任，说老实些是一团泥浆，只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没有太大的不可容忍的矛盾，这个系就能前进。所以这一次的批斗会，特别是在工会开的，不比在系办公室或是教室，中文系的教师一个也没有来。来的是那位专案组长，悠悠忽忽地等待开会。

说起专案组，这也是十年浩劫中的一件新鲜事儿。事实上，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搅成一团乱丝。我对于专案组的出现是抱着热烈的希望的，我认为专案组一出现，首先必定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团体，人数不必太多，但是工作必须做得扎扎实实，把每一个角落都要掀翻，每一件事实都要搞清楚，然后交代出一个青红皂白，是的就是是，非的就是非。该当处分的固然无须喊冤负屈，不该处分的也可以来去明白。

后来才知道不是这回事。我的第一个专案组长是个苏北人，老老实实的

一位年轻的一年级生。他和我谈过一次话。后来听说他不干了。有一次我们晚上从罗店进城，出发前在月光下背靠着背坐着，随便聊聊。后来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个组长有什么当头，不干了。听了以后我非常惊讶，也有些懊惜。我总以为一个老实人当了专案组长，总可以把事实搞清楚，使我不至于受什么不白之冤，也可以从此重见天日，他既然不当了，不是把我的希望从此掐断了吗？我心中确实有些懊惜，但我没有说出来。在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人无论如何笨，他总会学到一点东西。当然，由于本质的关系，你不可能好回谰诈，但至少你可以不作一声，这样人家就对你捉摸不透，无可指摘。因此我只是不说话。那一位也很清楚，要说我这个专案没有问题，他犯不着因此受到连累；要说是有问题，他毕竟还是一个人，是人就不得瞎说。

但是能瞎说的人有的是，他们想着唯有他们是人，别的是专案组的对象，对象就不是人。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寻是生非，唯有他们是人，因为他们可以爬得高，爬得高就看得远，他们能从种子里找出泥巴，没有泥巴，种子怎能发生芽蘖呢？他们能从鸡蛋里找出骨头，没有骨头，鸡怎样能站立起呢？这是“科学”，不是瞎说。

现在莲舫死了，火化了，连骨灰也没有留下。第二天下午，“革命小将”还要找我去开斗争会。斗争就斗争吧，好在我经过许多次，多少有些认识。第一次是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那时的一位“革命小将”很厉害。他最擅长的是揪头术。偏偏我的颈椎不行，揪是揪下来了，不到两分钟，它又竖起来了。这实在没有办法，大约是我们家的祖先没有得到训练，所以头一低下来，用不到多久，它又昂然地竖起来了。苦了这位“小将”，揪了竖，竖了再揪，最后他也感到没有办法了，又想起一个曝晒术。这办法真巧妙，他用不着老是揪。那时正是阳历七月份的天气，酷烈的阳光从文学教研组的西窗直射进来。我身上是一身薄薄的衫裤。这位小将把我拖到文学教研组的阳光下，他吩咐说要晒到学习结束后才能离开。我想一小时只有六十分，一分钟只有六十秒，时间总是有限的。我一边在盛暑的太阳下曝晒，一边却在信口计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这就是一分钟了。一分钟过去，便可以盼望两分钟，以后是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十分钟一过，用不了太久就是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所以一点钟便不是怎样难过。既然一点钟可以过去，还可以两点钟、三点钟。事情终有个尽头的时候，总不会是没有了结的。等到大家一散，我照样也可以散。胆小怯懦，都无济于事，我相信总有个“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时候。

还有一次，那时工人宣传队来了。他们来了不到两个星期，首先来一个五好运动。复旦大学校园里到处贴满了五好工人的招贴。他们唱团结歌，跳忠字舞。他们认为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肯好好地学习，更不用说学以致用了。于是首先要我们背“老三篇”，就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个缺点，背着背着，不期而然的就会把原文里的一两个字移过了。这还了得！但是不知如何这个缺点竟是改不了。七八岁时背《四书》就有这个无法改正的毛病，也不知吃过多少手心。如今老了，七十多岁了，还是如此，一背就出毛病。跟着背还可以蒙混过关，单独背竟是毫无办法。说是粗心，实在不是有意粗心；说是细心，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哪有背书还会错字的道理呢？然而事实如此，没办法，只图个蒙混过关。可是工宣队的耳朵特别灵，听到我读错字，马上就指出来，要我单独

背。大家一道背，还可以有个相互启发的机会，单独背便不要在此妄想了。

工宣队指着我说：“要好好读，好好背，一个字背错了，今天就莫想回家。”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倒笃定了。我的背错一两个字是六七年如一日，今天必然还会错，所以这一天傍晚我的心情就特别地安定起来。靠着落山的太阳读，傍着楼旁的电灯读，读呀读呀，实在不能保证没有错换的字。工宣队到底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不能不吃晚饭，更不能不睡觉，哪有陪着我，等着我读到一字不错的耐心。最后一挥手，他们去了，我也回家了。

这都是已往的事了。现在的问题是莲舫已死的事。莲舫的被逼自杀，是应当由司法机关提出控诉追究责任的事，但是我不能请求这样做。是我胆怯不敢提出吗？我是有些胆怯，然而不是不敢提出。即使我胆大，当时也没有胆大的律师为我提出控诉。没有律师，还有检察官，他们按月接受人民所给的工资，完全有责任过问这样的事。事实上，这时候的公安、司法机关是由军队军管了，管不到了。

既然法院和检察院的官员管不了，“革命小将”就要执行他们的任务了。上面说到，在莲舫的遗体火化以后的第二天，专案组在复旦大学工会的门厅里召集了批判会。那天到会的人实在不多，多半是小孩和老弱的阿姨们。各人手里有拿着玩具的，有拿着针线鞋底底的。专案组长好像什么都背得出，他批判了我这一样、那一样，甚至连我在六二年出版的《陆游传》也批判了，说是为蒋介石窜犯大陆出谋划策。我在沉痛之中不免一笑。专案组长指着我说：“你还笑呢！”我说：“《陆游传》不是五八年你们在跃进大会上要我写的吗？”他说：“那又为什么在六二年印出呢？”我说：“哪一年印出是上海中华书局主管的事，我哪里管得了？”他说：“你不是中华书局的后台老板吗？”我这个后台老板又是哪一年封的呢？这才使我更明了专案组是怎么一回事，彻底清查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彻底诬赖。诬赖还说是有理，逼死了人还说是理所当然。

这时的第一宿舍更热闹了，飞天盖地的是红牌牌，据说这是增加革命气氛，诸如“造反有理”、“资产阶级必须低头认罪”、“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这些话有些只是表达了一个好的愿望。在第一宿舍的一角，还保留着一张条桌，上面贴了大字报，罗列了邹莲舫的无数罪状，诸如办缝纫社是自发势力，办食堂是垄断营业之类，这一切都用红纸大字标出。最有意思的是用朱红大纸标出“铁案如山”四字，还在旁边写清，第一宿舍梦想翻案的大有人在。这个提法倒是有趣的，他们对我的小孙女说：“这个梦想翻案的人就是你祖父。”他们总以为说对了，其实我真正不想翻案，因为这些案子都是写在纸上的，不是有根有据的东西，风一吹，还不知到哪里去找，我是没有精力去推翻了。说是铁案，就算是铁案；说是纸案，可能还不如纸案那样的有分量。

一九六八年过去了，还有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九年过去了，还有一九七〇年。时光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还是反动学术权威，孩子又下放到乡间去接受再教育了。办教育我也参加了五十年了，不论是托儿班、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研究院之类，总还有个毕业的期限，可是中国办的是无产阶级新教育，没有个毕业的期限。所好教师不受工资，学生不出学费。既不出学费，也不用毕业，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这个“升平盛世”过去了，于是有人要说话了。莫要说这个话是容易说的，没有的事。十年了，十亿人口的大国都不说话了，

只有“旗手”说话，只有“文革小组”说话，只有“革命小将”说话。就是“小将”说话也不容易，因为他今天是“小将”，明天一变，就是“小爬虫”，被人“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不说最妙。

一九七八年，许许多多不见天日的人重见天日了，许许多多的冤案、错案、假案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是“真革命”了，许许多多“右派”是“左派”了，许许多多不是共产党员的人经过审查和考核，被接受为“共产党员”了。

天下变了，然而这一切，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

